

# 美國史研究通訊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8 第 1 期

总第 119 期

主 编：梁茂信

副 主 编：张勇安 谢国荣 欧阳贞诚

责任编辑：梁春艳 陈冰琪



## 目 录

### 研究会工作

- 新年献词：2018 年，我们与你同在！ /3
- 第十七届中国美国史年会理事长致辞 /6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7
- “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纪实 /12
- “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纪要 /20
- “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纪实 /34

### 美国纪行

- 2018 年 AHA 年会参会小记 李 晶 /47
- 美国历史学会第 132 届年会侧记：以“移民”为视阈 王佳欣 /52
- 变革时代的历史学人：2018 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侧记 徐 天 /58

### 学界动态

- 梁茂信教授入选 2017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65
- 22 项“美国研究”课题获得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65
-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纪要 /67
-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应邀赴上海大学做学术讲座 /82
- 世界史与比较文明：世界人文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 /83
-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做客厦门大学历史系 /84
- 张杨教授、张勇安教授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学 /86

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做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87

“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92

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应邀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学 /96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顺利召开 /97

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做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大讲堂 /104

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应邀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做讲座 /104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做客北京大学 /105

武汉大学举办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系列讲座 /108

首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举行 /112

## 新书推荐

《大衰退与美国联邦财政改革》 李超民 /117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涩泽尚子 /118

《美国与 1954 年危地马拉政变》 舒建中 /118

《美国与 1973 年智利政变》 王爱娟 /119

《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约翰·马克·法拉格 /119

《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 付成双 /120

《美国西部牛仔研究》 周 钢 /120

《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 1》 罗伯特·A. 卡洛 /121

《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 埃里克·杰·多林 /122

《海洋上的美国霸权》 布鲁斯·卡明思 /122

《陷入泥淖：美国越南战争政策的演变（1961—1968）》 李连广 /123

《美国边疆、地域与西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史学思想初论》

王邵励 /124

《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 赫德里克·史密斯 /124

《美国秩序的根基》 拉塞尔·柯克 /125

## 学术书评

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评《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期的中美竞争》 牛 军 /129

阿米塔·阿查亚：构建一个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对《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的思考 罗圣荣 杨 飞 /139

工具理性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冷战决策模式的批判——《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评介 葛腾飞 /152

评康罗伊-克鲁兹《基督教帝国主义》 孙宏哲 /162

## 会议信息

第二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征稿启事 /167

第八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 /169

第一届京津冀世界史青年学者论坛会议（第1号通知） /171

“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征文公告 /173

“美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暨纪念历史学家丁则民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175

## 编后记

编后记 /179





## 研究会工作







## 新年献词：2018 年，我们与你同在！

时光流转，岁月沉淀。徜徉知识的海洋，尚不知流年易逝，芳华翩跹的光阴下淡却了读书人长吁短叹的情怀。过去的 2017 年，平凡而短暂，365 天前的跨年仿佛如昨。擦肩而过的是过往，不期而遇的是希望。面对现实，有人奔向阳光，有人黯然销魂；有人迎难而上，有人选择逃避。然而，年轻的我们，就像这年轻的共和国，远未到“佛系”的年纪。犹记得：“1978 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会议，建议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党委也提出此建议。”四十年弹指一挥，意气风发的那一辈学人吹响了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号角。这艘远航的帆船从 1978 年行至 2018 年，美国史的文字从纸上油墨变成了微信公众号的图文并茂，唏嘘时代变幻，感恩一直有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们、美国史研究会微信公众号的读者们，新年好！

1978 年出生的人，如今已届不惑，他们或许尝遍了人间冷暖，体会了生活不易。他们原来是初出茅庐的“青马”，现在是各行各业的中坚。一代人的芳华正在逝去，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边是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一边是回不去的乡愁。在追求正义和秩序的道路上，我们离岸越远，看得越清。人们开始厌烦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无病呻吟，也不喜教条式的喋喋不休。或许是麻木，或许是理性，多数人习惯了观望。对于一个个反转的故事，麻木的人幸灾乐祸，理性的人哀矜勿喜。美国史学人用自己的学术判断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现实关怀甚或“叛逆”。在美国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中，我们有年富力强的佼佼者，有正在崭露锋芒的年轻人，有含苞待放的莘莘学子。新词旧曲歌不同，学人南北同一声：不忘初心，促进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继续前行。

2017 年初春，北方雪水潺潺，南方柳条抽枝。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再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掀起了一场“学术风暴”。这些学校的学生有幸“面授机宜”，聆听教诲，沐浴学术春风；更多的人则通过美国史研究会微信公众号了解动态，共享信息，感受大家风采。6 月至 7 月，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合作开展的暑期研讨会如期举办。年轻学人分别在东北师范大学参加“美国家庭社会史”研习营、在陕西

师范大学参加“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营、在上海大学参加“美国医疗社会史”研习营的学习交流。“树铮铮南开之脊梁”，9月，一百五十余人齐聚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纪念著名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开拓者之一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先辈，奖掖后学。谢国荣、牛可分别斩获首届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著作奖和最佳青年论文奖，高国荣、付成双、张勇安、董瑜、刘义勇、王禹荣获提名奖。10月，“长三角”美国史交流研讨会在安徽师范大学成功升级为“长三角”美国史论坛。真可谓“群星璀璨、大家云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一年，我们看到美国史学者孜孜不倦的身影，李剑鸣、王旭、梁茂信、王晓德、王希、王立新、王心扬、徐国琦、戴超武、韩宇、徐再荣、黄贤全、潘迎春、高国荣、张勇安等在各地高校开展讲学交流活动，为师生带去前沿动态和学术见解。

过去的一年亦是收获的一年，美国史学者获得近二十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批好书逐渐进入学术视野，王晓德所著《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杨祥银所著《美国现代口述史研究》、翟帆所著《二十世纪美国毒品政策演变》、郭巧华所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历史研究》、焦姣所译《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以及徐国琦先生的随笔集《边缘人偶记》等，以专业的文笔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美国历史和社会的丰富场景。还有许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和译著大量涌现，带给美国史学界的学术营养更不在话下。而从华庆昭、张友伦、杨令侠等先生的纪念性文字里，我们不仅看到“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情怀，更体味到至真至亲、有温度的人文情怀。这一年，《美国史研究通讯》也实现了华丽升级，我们用装帧精美的封面告诉人们：我们一直在追求更好！

我们翻开新著闻到纸张和油印的气味，享受一种特殊的视觉和嗅觉混合的书香味道。我们点开链接看到文字和图片的奇妙组合，在指尖与眼睛之间划向历史的深处。2017年，阅读始终相伴。我们曾经抱怨70后太忙而疏于阅读，我们曾经怀疑80后迷惘而消极阅读，我们曾经鄙视90后沉迷手游而遗忘阅读。现在，抱怨、怀疑和鄙视在“阅读推广”中渐渐消失。虽然现实逼仄使得有些情况并未好转，但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向“高墙”之下聚集，用一本本书当他们的垫脚石，越过“高墙”去看外面的世界。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工作地点回到家里的时候，当我们在物欲横流里倍感无奈的时候，当我们唏嘘感叹咒骂时光太短的时候，不妨大声地念一念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那句：“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却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这一年，仍有很多人对地产大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以为意，甚至各种冷嘲热讽。人们对这位老人家的政治风格的评价正在经历“看不懂”到“略看懂”到“美国政治也就如此”的转变。纵观世界各国，民族国家的界限日益清晰；强人政治正在取代民主政治，西方民主和代议制度遭受怀疑并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叙利亚战火未熄，朝鲜半岛局势令人揪心。“通俄门”事件看两党闹剧，“耶路撒冷风波”赏他一记耳光。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下定结论说特朗普无能，不只为时尚早，还荒诞不经。特朗普反对文山会海、繁文缛节，也不乏可爱之处。有人恨他不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有人笑他倚重推特办公，有人讽刺他的“老人院政治”，有人诅咒他的“禁穆令”，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美国总统名留史册。而此岸的我们，在看彼岸的笑话时，是否更应该冷静而理智地想一想“美国优先”的内涵？

正如人们感慨：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坏事情更多，只是信息透明度提高了，传播的速度更快了。杭州的一把火一夜之间点燃了国人心中的怒火；接二连三的虐童事件使人们屡屡反思人性的泯灭；远在万里的伊朗干戈转瞬间就成了互联网上的热搜。这个大数据时代，信息爆炸的威力巨大，它们提供了大量需要我们历史学人细辨的真伪。做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历史学人一直是时代的基本要求。因此，美国史研究会微信公众号责任重大，在新媒体成为重要的知识窗口的今天，我们无法埋头只顾研究，不问窗外时事。每个人都应该与这个时代共脉搏，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关注弱势和贫穷，关爱老人和孩子。2018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美国史研究微信公众号与你同在！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激荡四十年，致敬四十年。展望201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四十年。我们铭记这些“四十年”，而勇往直前，是对过去最好的纪念。2018年，我们与你同在！

(秘书处供稿)

## 第十七届中国美国史年会理事长致辞

理事长 梁茂信

尊敬的陈恒副校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同学：

早上好！今天是一个好日子，6 月份的上海，晴空万里，气温清爽，是一个适合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时机。上海师范大学把年会安排在这个时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仁和学生聚集一堂，交流学习心得，聆听学界高见，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今年年会的召开，离不开上海师范大学和历史学院领导与师生的支持。早在两年前，我们与剑鸣、王旭教授在一起进行学术活动时，聊起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一次美国史年会的事情，陈恒副校长当时担任院长，一口答应，表示积极支持。过去的两年间，在学院的支持下，在李文硕等多位老师的努力下，第十七届年会终于顺利召开。对于在此次会议筹办期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与传媒学院的领导和所有付出心血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近年来展示出一种强劲的势头，不仅申获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而且还有我会前会长王旭教授等人的加盟，青年学者李文硕和蔡萌博士等一起，壮大了上海师范大学美国史特别是城市史的研究力量，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上海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越办越好，也希望上海师范大学越办越好。

各位老师，今年是 2018 年，也是距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立快 40 周年的日子。过去 40 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选题、资料、学术创新以及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任何有兴趣的人，如果将 20 世纪 80 年代与 2010 年以后这几年的美国史研究的论文进行对比都会发现，两者之间可谓天壤之别。说明我们几代人的努力没有白费。美国革命史、政治史、城市史、移民史、环境史、美国对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当然，与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与美国学界的研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就需要我们同心同德，积极努力，不断交流，特别是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以提高我们的水平。因此，我提议大家利用这次机会，充分交流，共同探索中国美国历史研究的美好明天。我个人代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预祝这一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大家在享受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的同时，为今后中国美国史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2016—2018 年)

秘书长 张勇安

各位会员：

我代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向大会汇报 2016 年 8 月第十六届年会至今的研究会工作，请审议并提出意见。

## 一、学术交流与合作

### (一) 主办第十六届年会、筹备第十七届年会

2016 年 8 月 19—21 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多维视阈中的美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专家学者、博硕士研究生近 150 人参加了会议。

第十六届年会上，梁茂信教授当选我会理事长，增选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为副理事长。我会秘书处由厦门大学迁址上海大学，由张勇安教授兼任秘书长。提前卸任的理事长王旭教授、去年到任的原副理事长王玮教授、原常务理事胡国成研究员和孔庆山教授当选我会顾问。常务理事、外事委员会等都进行了相应调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我会领导和厦门大学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协力帮助下，我会秘书处已在 2017 年内顺利完成迁址工作，并在原有工作人员的基础上，聘请了新的工作人员，秘书处规模有所扩大。目前，新秘书处工作已步入正轨，微信公号、通讯和网站顺利运营。

会后，理事会决定第十七届年会由上海师范大学承办。在我会梁茂信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陈恒副校长以及秘书处的共同努力之下，特别是上海师范大学李文硕老师等诸位同仁的具体推进之下，年会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 (二) 联合主办长三角地区美国史会议

2016 年 11 月 18—20 日，我会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主持召开“第三届长三角地区美国史交流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40

多所高校的 50 多位学者在此切磋交流学问,共商区域学术合作与发展事宜。这次会议也商定“长三角地区美国史交流研讨会”更名为“长三角地区美国史论坛”。

2017 年 10 月 28—30 日,我会与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第四届长三角地区美国史论坛”,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暨南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光明日报社、《史学月刊》编辑部、《美国研究》编辑部等 60 余所高校、科研、出版机构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此次盛会。

### (三) 联合主办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2017 年恰逢我国世界史学术奠基人、我会创始人之一杨生茂先生诞辰百年,我会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并由天津《历史教学》社协办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9 月 23—24 日在南开大学举行。海内外 100 多位学者出席会议,中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共同纪念杨先生。

### (四) 协助完成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评选工作

首届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颁奖仪式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在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举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国荣教授的《民权运动的前奏——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获最佳著作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史学月刊》2010 年第 1 期)获最佳论文奖。

### (五) 深化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合作

2017 年,我会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进入新一轮合作。每年继续选派三名会员赴美访学,同时夏季研讨班改在三所高校以不同的主题分别进行:6 月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营、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美国家庭社会史”研习营、7 月上海大学主办“美国医疗社会史”研习营。

来华授课的分别是莱斯大学的内森·J. 西蒂诺(Nathan J. Citino)教授、哈佛大学的南希·科特(Nancy Cott)教授和杜克大学的玛格丽特·汉弗莱斯(Margaret Humphreys)教授,参加三个研习营的高校青年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累计共 85 人。从学员反馈看,三所高校分专题讲授,内容集中,课堂互动充分,学员吸收效果甚好。有鉴于此,2018 年,我们将继续推进现有的合

作模式和研讨班举办方式，完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合作机制。

## 二、日常工作

### （一）创办并运营官方微信公号

我会微信公号“美国史研究”受理事会领导，秘书处负责运营。目前，微信公号订阅用户已超过 1.1 万人，成为具有稳定影响力的微信公号。微信公号以团队运营为基础模式，江西师范大学团队、上海大学团队、南京大学团队、北京大学团队、南开大学团队、东北师范大学团队、武汉大学团队分别负责每天的推送内容。微信公号不仅是研究会的对外宣传窗口，也成为发布中国美国史研究动态和信息的权威平台。作为新媒体，微信公号比传统网站更好地将各单位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达到了及时分享各地各校信息的效果。这里要特别感谢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老师、中山大学史宏飞老师、南京大学王睿恒、南开大学董瑜老师、上海大学吴浩老师、武汉大学杜华老师以及以北京大学焦姣博士、东北师大王佳欣博士为代表的近 50 名硕博生、本科生。

### （二）新的《美国史研究通讯》步入正轨

《美国史研究通讯》是我会发布研究动态和会员信息的重要平台，已坚持多年。2016 年年会后，秘书处规模有所扩大，信息来源扩大的同时也对通讯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讯》编撰工作主要由上海大学吴浩老师带领的团队与东北师大欧阳贞诚老师带领的团队共同负责。

### （三）我会网站的改版工作

美国史研究会网站是由秘书处运营对外传播学会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秘书处已经与厦门时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三年运营合同，全新的美国史研究会网站即将上线。这里要特别感谢厦门大学的高艳杰老师协调推进。

### （四）缅怀我会资深会员

我会顾问、前理事长黄绍湘研究员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在京逝世，秘书处组织开展了缅怀工作，在我会网站开设纪念专栏。

我会前理事、资深会员万松玉教授于 2016 年 8 月逝世，长期支持研究会工作，曾承办第六届年会。秘书处向万松玉先生家属及河南大学致唁函慰问。

### （五）顺利完成会员信息更新登记

自 2003 年研究会重新统计会员信息后，已过去十余年，部分会员信息已发生变更，为了更加高效地为广大会员提供服务，我会向全体会员发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信息登记表》，此项工作已于年内完成，在此基础上完

成了会员通讯录的整理。

#### （六）完成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的多项工作

在厦门大学李莉老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孟庆龙老师、高国荣老师、陆晓芳老师、上海大学吴浩老师等共同努力之下，秘书处已顺利完成的工作包括两次民政部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新任研究会负责人的备案工作，三证合一的办理，财务问题整改报告的上报等。截止目前，我会已连续三年年检结果为“合格”；梁茂信、张勇安、原祖杰等新任研究会负责人已完成民政部要求审核备案工作；原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交回了民政部，办理并启用了新登记证书；先后两次提交了财务问题整改报告。正在办理的工作包括新秘书处迁址备案，研究会财务账户转户上海等。

### 三、财务情况和倡议

自 2016 年，我会两度收到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下发的财务改进建议书，通知我会存在活动资金不足问题（截止 2016 年底活动资金仅为 95,130.24 元），已不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成立条件（活动经费需保证 10 万元）。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财务问题，是因为自 2015 年上级主管单位停止了 8,700 元年度拨款，而单纯依靠年均约 4,000 元的会费收入不足以负担每年 1 万元左右的业务活动支出。

多年来，厦门与上海秘书处各位老师尽可能地节省经费，不少年份研究会实际报销金额压低至 8,000 元以下，由于 2015 年以前还有每年 8,700 元的世界史所拨款，因此研究会账户总额实际一直在增长，自 2006 至 2016 年十年间，账户总额由 66,144.41 元增至 95,130.24 元。这一成果的取得，实为不易。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会原理事长王旭老师、原秘书长、现副理事长韩宇老师以及李莉老师。

自 2016 年秘书处收到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活动资金改进意见书以来，为保证研究会账户余额不减，秘书处所有老师都停止了研究会财务的正常报账。且为保证研究会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梁茂信老师、李莉老师、张勇安老师等个人垫支费用已超 2 万元（这些费用主要用于：2015—2017 年年检审计费共 4,000 元，《通讯》编辑、印制和快递每期约 5,000 元，另 1 万多元的网站改版以及空间使用费）。

为保证研究会账户余额不减，经 6 月 8 日晚理事会讨论，现正式向会议大会提出调整会费标准的议案。现行《会费收纳标准》（教授每年 40 元，副教授每年 30 元）是 2002 年 10 月第十届年会通过的，施行超过 15 年，已不



适应近年来业务的开展。新会费标准调整为：教授每年 200 元，副教授每年 100 元，讲师 50 元。此外，秘书处将设立收取会费专用支付宝账号，每年随年会及研究会资助的大型会议通知发送“会费缴纳通知”，会议期间发放“会费收据”。

发起会员捐赠倡议。秘书处将于每年 12 月初定期发送“捐赠倡议书”。凡是缴纳 1,000 元以上捐赠费者，会由研究会出具捐赠证明书。除直接现金捐赠外，也鼓励开展多才多艺的会员个人书画等拍卖活动进行捐赠。尝试吸收会员单位，收取会员单位会费、捐赠费。尝试将国内美国史主要研究机构、相关学术单位或企业发展为单位会员，并通过法人代表上报主管机关批准。

报告完毕，提请大家审议。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会员对研究会秘书处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也预祝年会圆满成功！

## “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纪实

2018年6月4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主办，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的“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顺利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青年教师、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研习营。

### （一）研习营首日开营活动

研习营首日，即6月4日的上午举行了本次研习营的开幕仪式、浙大教师演讲等相关活动。

#### 1. 开幕式

研习营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杨教授主持。张杨教授向参与此次研习营的老师与同学致欢迎辞，并介绍了此次研习营的主讲人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的基本情况以及参与此次研习营活动的刘国柱教授、姜振飞副教授、国懿老师。随后，研习营主讲人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致辞，向学员自我介绍，并与学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 2. 浙大教师演讲

研习营首日上午的演讲由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姜振飞副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的国懿老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挑战修昔底德比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在演讲中，国懿老师回顾了中美两国外交的历史，总结了德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继而阐述了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国懿老师认为，中国亟需对美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需要借鉴德国崛起时的经验与教训，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中国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即可以批评西方发达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但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要粉饰美国，应尽量客观看待美国；要多从自身利益上寻找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中美关系既要解决底线问题，也要解决上限问题，要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关系很难有本质性的变化，应先把减少误判、减少误会、理性面对争端做好。

随后张杨教授进行了题为“冷战中的学术与学人”的演讲。演讲中，张杨教授揭示了“冷战共识”时期部分美国学者在学术专业伦理与公民社会责

任两种角色间的徘徊，以及将学术研究纳入美国文化冷战活动中的努力。继而以此为切入点，介绍了战后美国亚洲基金会对亚洲中国学建立的影响。张杨教授指出：战后亚洲基金会通过建立实体、投入资金、议程安排等方式影响亚洲的中国学发展，同时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然而，由于亚洲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亚洲学者与美国学者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背景不同，亚洲学者对美国资金的抵制颇为激烈。因此，尽管亚洲中国学的创建与发展的确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并未沿着美国设定好的道路行进。

主持人姜振飞副教授分别在两场报告结束后进行了点评，与会营员亦积极进行了提问。

## （二）课程安排与纪实

本次研习营的时间为6月4日至6月8日，为期五天。在这期间，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主讲人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将围绕美国文化外交的主题带领学员进行七次研讨课，按日程安排的先后分别为：

- 1、文化外交、帝国主义、全球化与美国实力（6月4日下午）
- 2、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19世纪（6月5日上午）
- 3、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19世纪（6月6日上午）
- 4、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20世纪（6月6日下午）
- 5、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世界眼中的美国（6月7日上午）
- 6、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美国眼中的世界（6月7日下午）
- 7、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20世纪（6月8日上午）

### 01

本次研习营的第一讲于6月4日下午开始，题为“文化外交、帝国主义、全球化与美国实力”。在本讲中，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首先对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宗教组织、商业与全球化等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术语和概念以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主要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在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的带领下，学员们阅读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门罗宣言、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等美国外交史上的经典文献，并就这些文献所反映的美国外交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史做了快速的梳理与回顾，加深了对它的认识。之后，本讲的内容又回到了美国对外关系中所包

含的主题上，并展开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包括对美国外交中存在的公民与政府目标、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以及对美国形象的自我想象的差异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讲的最后，主讲人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对研习营接下来的讲授内容与形式做出了安排：随后的讲座将以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着每一讲的主题，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将进行讲解并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同时，学员们也将被分为不同的讨论小组，分组展示每人的研究计划并相互提问、开展讨论。

## 02

6月5日上午进行了本次研习营的第二次讨论课，主题为“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19世纪”。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重点讲述了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起源、美部会对传教地的选择和传教士在传教地的活动内容。

在本次讨论课中，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起源。起初，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传教运动主要是由英国传教团体向当地人进行。但美国独立革命打破了这一传统，独立后的美国各州开始向当地人传教。英国和美国在传教工作上也进行了跨大西洋的合作。1810年干草堆集会后，美国新教传教运动走向海外。参与干草堆集会的成员立志成为海外传教士，并迅速成立了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ABCFM，在华称美部会）。1812年，美国第一次向海外传教，并选择缅甸作为第一个传教地。1810至1840年间，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在不断发展，这时的传教活动同文明和文化紧密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各新教教派都成立了传教组织。美国内战时期，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有所减缓，但并未停止。此时，奴隶制问题也导致了美国教会和传教团体的分化。内战结束后，美国海外传教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更多的教派组织成立了传教委员会，并成立了女性传教委员会。19世纪晚期，美国的神学变化带来了传教运动的改变。美国各传教组织重新考虑了他们的传教方法及传教目的，特别是有关文明建设和世俗的工作。

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还分析了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对传教地的选择。她指出，美国传教士并非选择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传教地，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有该地区的人口数量、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皈依的可能性。他们还确立了异教等级（hierarchy of heathenism），对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人民进行排

序，以最终确定最适宜传福音的地点。比如，当1812年美国选择缅甸作为第一个传教地时，就是考虑到缅甸的文明程度和人口数量。

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也讲述了传教士在传教地的活动。她提到，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语言问题。最初，传教士通常只用英语传教，而且传教的形式通常是小型集会。她强调，在传教地，教育是传教士最初关注的焦点。他们建立的校区类型主要有普通学校、英语语言学校、地方学校和寄宿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建立大学。她还指出，同宗教相关的活动，也是传教士的一大活动目标，如翻译圣书等。除此以外，他们还关注医疗。他们接受医疗训练来帮助家人，也尽可能向公众提供服务。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回忆录、历史记录等内容，这些产物扩展了美国人民的世界视野。

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还特别关注了传教运动中的女性。她认为，在美国海外传教运动中，女性既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一种象征。她们的突出作用是，可以接触到男性接触不到的群体，向她们传福音。她提到，从1819—1838年，超过160名女性申请成为传教士，她们大都未婚，也无结婚的打算。

总之，本节内容安排得十分合宜。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借助地图和图片，帮助研习营成员更好地理解美国新教的海外传教运动。研习营成员也就传教地的选择及女性为何要出国传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03

6月6日上午举行了本次研习营的第三讲，主题围绕着人道主义与美国19世纪的外交展开。

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首先便强调了印刷媒体在推动人道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得益于印刷媒体，大量对于人群苦难和悲剧的描绘及报道成为可能，印刷媒体成功建构了需要帮助和救助的对象的形象，同时为资金和物资的募集提供了有效的渠道。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二者角色的确立，为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了某种前提。

接着，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以美国援助希腊革命和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为例，阐释19世纪美国对外人道主义活动的基本模式和基本问题。

19世纪20年代对希腊革命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道主义活动样本。援助希腊革命的动机既关涉美国人对与希腊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化两种文化的不同认知和想象，也与美国人对于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历史

记忆和浪漫想象密不可分，此外美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背景。而美国政府、国内女性团体、在奥斯曼帝国的美国传教士等群体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和关注点不尽相同。这也最终导致了美国对希腊革命的援助并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军事行动，而是采取了私人性质的入道主义活动的方式。

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的主要目标，则是为了解决国内迟迟难以解决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20年代关于奴隶制的辩论和废奴运动，加上英国在塞拉利昂的殖民试验，以及美国人认为应该以“善行”回馈和补偿非洲的思想，促使美国实施利比里亚殖民计划。但同时这一被部分美国人视为入道主义的计划在国內也不乏争议。

在本讲中，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还从跨大西洋废奴运动、美国社会进步主义、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这三方面来说明传教活动向入道主义活动转变的背景，尝试为美国入道主义活动勾勒思想和观念的背景及源头。在她看来，19世纪以至其后美国的入道主义活动，是和大西洋两岸的对话及美国对欧洲社会改革经验的学习分不开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美国入道主义外交的女性主义视角，后者对世界其他文化和宗教的温和态度、反种族主义、关于身体的道德观以及在国际上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活动，也是以该组织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团体实施入道主义活动的重要思想动因。

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和学员们结合上述讲授内容，对阅读材料中的19世纪90年代的四个人道主义案例——对俄国、亚美尼亚、印度和古巴的人道主义援助——展开分析和讨论，着重对推动各个人道主义援助的动机进行分析和比较，也就这些人道主义活动模式和旧有模式之间的异同展开了辨析。

## 04

6月6日下午第四讲的主题关注的是20世纪的入道主义与美国外交，着重探讨了美国红十字会与和平队两个对外援助机构的性质和活动。

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首先指出19和20世纪之交历史的特殊性。她以“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和《基督教先驱报》（*Christian Herald*）对当时美国角色的勾画为例，说明了20世纪之始美国获得和统治新的海外殖民地，其在对外政策上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同一时间点上，“入道主义”在语义上成了一个超越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普世性概念，但美国的入道主义活动仍与政治、宗教和种族相互纠葛。

美国红十字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组织创立于1881年，到一战结束时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海外救助组织，同时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其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它在20世纪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比如1905年的新章程规定美国红字会对美国陆军部负责，在其18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总统有权任命其中6位。另一个特点，是红十字会对救助对象的确定和对救助资源的科学合理分配。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多幅红十字会在一战时期的海报，大家围绕其中的图像和文字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和宣传策略展开了讨论。不难看出，美国借助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行动，还试图塑造自己作为世界拯救者的形象。学员们还进一步讨论了红十字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1961年建立的和平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尽管作为和平队使命的执行机构的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得到强调，但其资金由联邦政府财政提供，还是为其打上了深刻的美国政府的烙印。和平队活动的重点，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这些方面的特点也带来了对和平队的猜忌和质疑。

在讨论和发言中，采用了先让学员分小组讨论，以便整理出思路并汇总观点，再由大家自由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部分学员还就自己当前进行的研究或准备研究的计划和大家做了分享。

## 05

6月7日上午进行了研习营的第五次课程，主题为“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世界眼中的美国”。在早上的讨论中，主讲嘉宾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聚焦“对外贸易与文化艺术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通过讲解美国独立之初的对外贸易个案（“中国皇后”号与18世纪末的中美贸易），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引出了“中立贸易”与“航海自由”这两个对美国早期远洋贸易影响最大的基本原则。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认为，远洋贸易在美国早期外交中十分重要。众多随船出洋的海员（sailor）事实上成为了对外展示美国形象的第一批“使者”，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和传教士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些海员同时也是“黑脸歌舞团”（blackface minstrel，20世纪20年代白人扮成黑人的滑稽表演）的表演者，在向外部世界传播美国大众娱乐文化的同时也散播了美国白人的种族偏见，不自觉中承担着引导外国民众认识美国的“向导”（tour guide）作用。同时这种美国文化向外传播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在地化”（localization）的过程。比如，黑脸歌舞表演也融入到了日本的歌舞文化中，结合日本传统乐器的演奏，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黑脸歌舞团。但一个不

可忽视的事实是，此时的美国海员同日后成熟且组织严谨的“文化宣传人员”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的文化传播行为与方式较为随意，并且主要以个人经验为依据，这就引出以下问题，即早期美国海员能否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兜售”自己的祖国？美国政府对海员的这类行为持怎样的看法？海员为何会在贸易港口同本国传教士产生摩擦？因此，从海员这一微观视角对美国早期文化外交形式进行阐述，当属可资研究的案例。此外，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还以 P. T. Barnum、T. D. Rice 以及 Fisk Jubilee Singers 为例，介绍了 19 世纪中后期以音乐家、旅行者为主的美国“文化使者”在国外（主要在欧洲大陆）游历时的文化传播行为。

## 06

6 月 7 日下午进行了研习营的第六讲，主题为“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美国眼中的世界”。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和与会学者首先以美国社会中的“世界主义的家庭生活”（Cosmopolitan Domesticity）为题，讨论了美国家庭生活中室内设计的“国际化”导向，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殖民主义与文化认知问题。对此，有学员提出在 19 世纪晚期的美国家庭生活中，看似包罗万象的家居饰品不仅表达出美国民众认识世界的兴趣，其中来自于被殖民部落的各种传统工艺品更是白人种族与文化优越感的体现。这一观点在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和各位学员中激起了关于“例外论”与“天定命运”的讨论。之后，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以芝加哥与圣路易斯两座美国城市为例，通过 1892 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1893 年的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在芝加哥举办）和 1904 年路易斯安那博览会（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的举办，对美国民众如何认知世界及这种认知的变化进行了阐释。特别是美国占据菲律宾之后，以中国、日本与菲律宾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逐渐上升，而这通过历届博览会的布展情况即可直观看出。

最后，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以与会学员的研究方向为主要依据，召开专题研讨会，四位学员分别作了“种族与美国对外关系”、“英美特殊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及“美国反恐机制的演变”等主题演讲。大家各抒己见，在探讨中共同进步，在思考中激扬学术。

## 07

本次研习营的最后一讲于 6 月 8 日上午进行，主题为“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20 世纪”。在上午的授课中，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围



绕“20 世纪美国外交与对外宣教”的主题从以下 4 个方面展开讲述，分别是“20 世纪早期对外宣教的转变”“波士顿的世界”（1911 年波士顿对外宣教博览会）“传教士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二战及冷战时期的对外宣教和美国政府”。这 4 部分内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让学员更加清楚地了解了 20 世纪美国传教士对外宣教的转变，对外宣教与美国官方外交的关系，对外宣教对美国国内社会与民众的影响，以及传教士在二战乃至冷战期间对美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小组讨论环节，学员们先后热烈讨论了 1918—1930 年间美国在菲律宾宣教时所提出的“妇女为妇女宣教”的概念，以及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危地马拉前总统里奥斯·蒙特（Rios Montt）的支持如何影响到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最后，两位学员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计划，并回答了相关提问。

### （三）结业仪式

6 月 8 日下午，研习营成员在龙井村隆重举行了结业仪式，大家围坐在一起品茗畅谈，共同回忆短暂而充实的研习营生活，在张杨教授的主持下，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副教授和刘国柱教授向各位学员颁发了研习营结业证书，并合影留念。至此，研习营圆满划上句号。

（王帅，浙江大学）

## “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 研习营纪要

2018 年 6 月 11 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和“美国历史学家学会”（OAH）联合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顺利开营。本次研习营的主讲学者茱莉·格林（Julie Greene）教授系由 OAH 遴选推荐，现任教于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 30 余位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此次研习营。

### 一

研习营开幕式在 11 日上午举行，由原祖杰教授主持。原教授首先对格林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衷心祝愿各位学员能在为期五天的学习交流中不断进益。接下来，原教授代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向格林教授赠送了精美的蜀锦。格林教授随后向每位营员分发了她不远万里带来的明信片和小礼物。在格林教授作自我介绍之后，各学员也逐一进行了自我介绍，简要说明了各自的研究兴趣以及对此次研习营的期待。

在上午的讲授环节中，格林教授首先对此次研习营主题的时代背景做了精要概括。内战后，快速的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局面。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了彻底变革。在催生出新的工作制度、新的劳动分工和管理方式的同时，工业资本主义也带来了一个规模更大、存在时间更持久的无产阶级。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悬殊、政治经济腐败以及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成为时代的病患。尤为重要的是，新的资本主义秩序似乎威胁着美国民主的核心价值。工业化时代劳动者们普遍持有的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思想，与奠定美国之基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一思想认为美国社会的根本是一批诚实的、朴素的、经济独立的生产者。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缺乏经济独立性和社会流动性的无产阶级，使得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由于经济独立的生产者是美

国民主的支柱力量，因而一旦生产者的独立地位受到威胁，美国的民主和整个社会秩序也可能面临危机。

在对快速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和危机进行介绍后，格林教授按时间顺序对学员们讲述了本次研习营将主要探讨的五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新秩序，关注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大动荡，企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新的大众社会，以及对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批评。其二为劳工阶级对新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反应，包括当时主要的劳工组织发动的劳工运动，以及为改变现状进行的其他抗争与奋斗。其三为农民和白人中产阶级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努力，重点关注“进步主义运动”在社会控制和社会正义这两个经常互相矛盾的目标之间的处境。其四为移民和“移民问题”，探讨移民们受到主流社会排斥的原因，及其对美国社会面貌乃至政治体制的改变。最后一个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工业化历史，借助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野，在新维度下重新观照美国工业化的历史。

在正式进入第一个主题之前，格林针对“美国工业化”这一研究领域，梳理了 20 世纪以来美国学术史的脉络及近年兴起的史学新方法，主要经历了五个重大变化。第一个发展在于从世纪初强调经济冲突和城、乡紧张关系的进步派史学家到二战后对工业化成果持赞颂态度的共识派史学家（Consensus Historians）。二战后，受 E.P.汤普森（E.P. Thompson）和戴夫·蒙哥马利（Dave Montgomery）等史学名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度兴起。上世纪 60 年代后，伴随民权运动的发展，涌现了一批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新左派历史学家。1980 年代后，史学界出现了更强调语言和文化符号的“文化转向”。在新的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历史学家研究美国工业化历史的方式有许多重大创新，例如从现代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探究资本主义的“新”历史；以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思考工人阶级的历史；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的《拔根者》（*The Uprooted*）和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的《移植者》（*The Transplantation*）为移民史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此外，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弱化了民族国家的固定边界，强调美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联系。

11 日下午，格林教授正式进入研习营的第一个主题，即转变中的工业资本主义。她讲道，内战后的技术进步使得商品在更大距离上的流通成为可能，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与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是工业化的主要表现。但快速的

经济增长也并非完全没有挑战，内战后的美国每十年都面临着一次经济萧条或衰退。以流水线（assembly lines）为特征的福特制（Fordism）和提倡科学管理的泰勒制（Taylorism），使得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伴随着大规模生产而来的是大众消费（其标志是百货商店和流动展示柜的发明）、分配和大众娱乐（格林教授以“康尼岛”为例生动地讲述了过山车和电影的兴起，以及它们对美国工业化的意义）。为进一步提高效率，企业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合并运动催生了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与强盗大亨们（Robber Barons）的出现。总之，工业化的发展使得极少数人掌握了社会的大多数财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带来了新的社会焦虑。

工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引来了不同群体对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批评，并尝试寻求解决之道。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其 1879 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提议，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应该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分享，主张通过对土地征税，即所谓的“单一税”（single tax），使之成为可能。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出版于 1888 年的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憧憬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解决现实问题。镀金时代，工人、农民和禁酒主义者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但也从未能实现持久的变革，它们的影响力还不足以令主要政党认为有必要做出回应。到了 20 世纪早期，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进步主义时代”，事情发生了变化。职业分布广泛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加入批判新资本主义秩序的阵营，主要政党被迫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总统成为了一个比以往更重要的权力来源。复兴的社会党制定了强有力的改革议程，并提出了后来被民主党和共和党经常借鉴的具体想法。到 1905 年左右，人们普遍认为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解决社会弊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研习营第一日，格林教授分别从学术史和具体史实的角度，对“转变中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讲述。19 世纪晚期，迅速而激烈的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扩大了无产阶级的体量，也催生了新的劳动分工和管理方式。工业化如此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分配、消费和娱乐。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挑战，具体来讲就是波动更大的经济局面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这些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以及中产阶层和对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有力批评。

（任姝欢，四川大学）

## 二

2018年6月12日，研习营进入第二讲，主题为“劳动与工人阶级的反抗”。本讲主要关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在快速工业化带来新的社会情况下，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化及其抗争行动。

格林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工业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工厂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劳工和管理人员的大量需求，因而中产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得以迅速扩大。在镀金时代，美国 2/3 的人口都属于领薪族（wage earners）。越来越多的未婚女性出现在各种服务行业，虽然她们仍面临着传统习见的批评，但女性也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庭。与此同时，工人中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约占工人总数的 1/3。在镀金时代，大部分黑人仍被束缚在南方的白人农场中。

与工人数量的激增相伴随的，是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与共和理念密切相关的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生产者主义的主要理念是：社会繁荣依靠那些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比如自耕农和工人。这些理应得到荣誉和尊重的劳动者，在镀金时代却陷入悲惨的境况：农民债务缠身，被铁路公司和银行压迫；工人工资低廉，地位低下，生活和工作环境都极其艰苦。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的人，社会的“寄生虫”——银行家、工厂主、投机商等——却窃取了本属于劳动者的果实，剥削和压迫劳动者。在生产者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反抗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动力。

为了改变社会不公正现象，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美国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1877 年铁路大罢工是一个重要节点，虽然这场范围、规模都十分可观的罢工在资本家和政府的联合攻势下最终失败，但这也让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意识到，只有更好地将劳工组织起来才能与资本家和政府相抗衡。随后不久，一系列大型工会相继成立，比如当时最为著名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和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格林教授强调了“劳工骑士团”和“劳联”在成员构成和宗旨目标上的差异。劳工骑士团对于成员的要求非常包容，不仅接纳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还包括移民以及女性，试图尽可能广泛地联合工人阶级。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劳工骑士团强烈抵制华人，他们支持 1885 年发生在怀俄明州石泉（Rock Springs）的屠杀华人劳工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种族骚乱事件之

一。与劳工骑士团截然不同，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一个更为保守的组织，它主要接纳那些属于工人阶级上层的熟练工人（skilled workers），其主要的目标也是为这些群体争取权益，他们对组织移民、女性或黑人劳工不感兴趣。

随着“劳工骑士团”和“劳联”等大型工会的崛起，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也成为工人暴动最为激烈的时期。著名的如 1886 年 5 月 1 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的总罢工，以及随后在芝加哥发生的干草市场（Haymarket）暴乱、1892 年霍姆斯特德炼钢厂罢工（Homestead Strike）以及 1894 年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Boycott）。这些运动揭示了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并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但 1900 年前后，随着经济萧条与雇主的反击，大部分劳工组织遭到扼杀：“劳工骑士团”名存实亡，美国劳工联合会则在萨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的渐进改革主张下逐渐走向保守。

在下午的课程中，格林教授接续上午镀金时代的时间脉络，介绍了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工人阶级及工人组织和运动的情况。1900 年后，随着海外扩张以及行业垄断，美国的经济逐渐好转，而机器的自动化和泰勒制（科学管理）的普及，使得从前熟练工人逐渐被非熟练工取代。这些新形势重塑了美国的工人阶级：移民继续大规模涌入；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继续上升，特别是已婚女性的比例有了大幅提升；南方黑人从土地中解放后大量进入工厂。也就是说，1900 年以后，工人阶级不再由白人男性熟练劳工所组成，工人群体变得更加庞大也愈加多样。

在工会方面，美国劳工联合会继续壮大并主宰着工人组织，但它的反华倾向并未改变。领导人冈珀斯持极端的反亚裔移民态度，他为此著有名为《肉与大米：美国男子气概与亚洲苦力文化的对决》（*Meat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vs. Asiatic Coolieism*）一书。冈珀斯认为，华人劳工吃苦耐劳的“苦力”（coolie）文化大大降低了工人的价值，这会让美国的白人工人过上奴隶般的艰苦生活。虽然某些方面十分保守，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目标是废除限制工人运动的禁令（injunction），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目标又是激进的。

出于对劳联的不满，1905 年，一群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建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他们拥有比劳联更为宏伟的目标，提出要团结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多的工人，用罢工等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这让“产联”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激进的组织之一，影响了世界上许多激进主义分子，其中就包括俄国的列宁。除此之外，“产联”还是利用艺术、媒体等方式进行大众宣传的先驱，格林教授展示了大量相关的海报、

音乐。在这个时期，美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同样反对资本主义，但不如“产联”那么激进，它们大多希望通过党派政治等温和手段进行改革，而且内部成分复杂，其中的左、右派分别有着不同的目标。

进步主义时代的工人运动与镀金时代有所不同，数量激增的移民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力，并表现出激进的特征。由于不被“劳联”支持，这些移民劳工通常自己组织起来，1912年的劳伦斯纺织厂罢工（Lawrence Strike）有来自40个国家的工人参与，类似的还有纽约服装行业罢工（NY Garment Strikes）以及抗议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Triangle Fire）的联合运动。但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工人运动的轨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的工业马达再次提速。特别是美国参战后，许多白人男性加入军队，这就给移民、非裔美国人、女性等非白人男性的工人以巨大的机会，不过当时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也限制了显得激进的工人运动。1919年，美国民众对激进主义的恐惧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恐慌，当年的联合大罢工遭遇挫败，许多工人激进分子遭到逮捕，后来又发生了如“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以及“萨科-万泽蒂案”（Sacco and Vanzetti Case）等事件，美国日趋保守的气氛让工人运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

最后，格林教授总结道，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不断壮大的工人们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和组织方式来抗议新的资本主义秩序。然而，工会从来没有成功地团结大多数工人，即使是像“劳工骑士团”或“美国铁路工会”（ARU）这样的包容性组织也排除了一些工人，只有“产联”真正致力于实现包容。工人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些成就，工资得到了提高，工作、生活环境有所改善，工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社会的保守化，这些成就大多遭到了逆转。

（熊健余，四川大学）

### 三

2018年6月13日，研习营进入第三讲，主题为“为濒危民主寻求解决之道”。本讲关注的群体为工业化时代的农民与中产阶级，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探究“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和“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的发展脉络。

镀金时代，美国在享受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弊病，如环境恶化、政治腐败、社会贫困的加剧等。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农业发展首先受到冲击。经济大萧条直接影响到美国农民生活，国家货币短缺造成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债务持续增加，商品运输成本不减反增，土地价格下跌、银行拒绝放贷等问题使得美国农民的处境十分艰难。

迫于种种压力，19 世纪后期，美国农民组织起来，掀起了一场平民党运动，以此对抗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腐败。1870 年代，美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Alliance）在得克萨斯州成立，农民们建立了高效的买卖合作社，试图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美国农民联盟的势力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尤其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联盟规模庞大，不少女性也参与其中。然而联盟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一方面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排斥非裔美国人，另一方面该组织没有成功解决底层工人的需求，未能与工人阶级形成坚固的联盟。

“农民联盟”的买卖合作社机制并没能帮助农民解决经济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采取政治行动。1892 年，平民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成立，颁布著名的《奥马哈纲领》（*Omaha Platform*）。该纲领体现了生产者主义观念，主张温和的社会改革。平民党人的不满主要针对东海岸利益集团、银行家和铁路商人，这些群体对经济的垄断控制造成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尤其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扩大行政权力来平衡利益团体的力量，使得经济稳步发展并趋于公平。他们还主张采取累进所得税、自由铸造银币等政策，并要求政府持有铁路、电话及电报等行业的公共所有权。

1896 年，针对农民呼吁放开银币供应量的问题，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发表著名演说《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这篇演说发起了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反对现有的金本位，要求政府增加货币供给。通过这篇精彩绝伦的演讲，布赖恩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尤其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

1896 年总统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大选之一。以布赖恩为代表的民主党支持平民党运动，他们极力拥护农场主经济利益，渴望回归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的美国社会，南部、中西部农村和洛基山脉地区成为布赖恩的选票基础。以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针锋相对，力挺金本位。麦金莱认为“自由铸银”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不仅不利于市场发展，还将使得本已萧条的经济雪上加霜。他将工商金融阶层和广大城市工人阶级的利益联合起来，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拥护者。



在大选中，麦金莱赢得美国东北部、中西部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等广大工业地区的支持，最终获得了 1896 年大选的胜利。布赖恩失败后，平民党运动迅速走向衰落，但运动的影响力仍在持续，部分经济政治主张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得以延续，平民党运动也被视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前奏。

平民党运动偃旗息鼓后，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并未得以解决，各个社会阶层广泛参与到社会改革运动的洪流中。与平民党运动不同的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主力。进步派主张积极进行社会改革，推进美国现代化，他们重视利用教育和知识来改善社会，反对政治、经济腐败和道德腐化，强调政府的积极干预。进步派的努力在地方、州和国家层面均有体现，改革涉及的问题覆盖社会方方面面。这一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均支持社会改革，但在两党内部仍有相对保守的一翼，党内也出现过分歧和争议。

进步主义时代，社会改革的主题是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和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这两大目标。在推进社会正义的运动中，美国白人女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899 年，简·亚当斯（Jane Addams）、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和约瑟芬·洛厄尔（Josephine Lowell）等人建立了全国消费者联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该机构试图借助消费者的力量逼迫雇主为工人提供更为人道的工作条件，具体主张有：反对雇佣童工，维护工人权利，要求建立最低工资法，限制女性工作时长等。“睦邻运动”也是进步派实践社会正义的表现之一。1889 年，简·亚当斯和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建立美国第一个睦邻组织：赫尔之家（Hull House），该机构以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汤因比中心（Toynbee Hall）为原型，向城市贫民提供社会服务和教育。到 1890 年代末，全美已经拥有 400 多家睦邻组织，他们服务的对象除了当地居民外，还包括大量移民和非裔美国人。

对于许多社会改革者来说，如何改善美国社会的道德败坏现象是他们极为关心的话题，于是“社会控制”成为进步派关注的又一焦点。进步主义时代，酗酒被看作道德败坏的表现，社会各个阶层掀起了一场禁酒运动。1919 年，美国通过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禁酒法案》，禁止酒精饮料的酿制、转运和销售。此外，政府还采取了禁止卖淫，制定流浪者法规和监狱纪律等措施。相较于社会正义，社会控制更加具有强制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主义运动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改革者聚焦的是白人利益，而对于黑人的悲惨处境却漠然视之。实际上，许

多进步主义改革者仍持有种族主义观念。在美国南部，一些进步派甚至支持修改宪法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利。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工具如人头税、文化水平测试、“全白人初选”等手段，黑人最终丧失了选举权。另一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等观念深深影响美国社会，这些思想为种族优越提供了理论基础。1896 年美国发生“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最高法院以 7:1 的多数裁决使得美国确立了种族“隔离的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这也标志着南部重建后许多南部州的隔离法得以合法化。直到 19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才清楚认识到种族隔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

总的来说，格林教授认为进步主义运动在诸多方面取得成果。进步派人士成功推进政府扩大干预，保障社会正义，赋予普通公民更大的政治权力。但与欧洲政府相比，美国政府所做的努力十分有限。进步主义运动的进步性也由于改革者目标的松散和矛盾而大打折扣。当日下午，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和王禹老师与学员们进行了密切互动，原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概况，随后对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学员们就此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积极分享学术见解。

（陶芊，四川大学）

## 四

2018 年 6 月 14 日，研习营进入第四讲，主题为“包容与排斥：工业化、世界经济与美国移民”。本讲关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社会既吸引又排斥移民的条件和原因，探究新移民对美国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改变。

从复杂而矛盾的美国移民史来看，美国既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也是一个排外的国家。一方面，美国依靠移民定居美国、建设国家，移民构成美国历史的中心。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极具“仇外心理”（xenophobia），他们反对和限制移民，并以偏见、种族主义和暴力对付某些种族的移民。1609 至 1830 年，大部分移民作为奴隶或契约奴被强制带到美国，其中约有 10% 的英国人，此外还包括非洲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所以美国在建国时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是美国吸引移民的主要原因。随着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家庭很难维持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在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比家庭自制要便宜得多，但这需要现金。因此，许多农民开始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或是让其子女进入工业区赚钱。美国的快速工业化提供的大量商

品和工作、挣钱机会，既推动了本土的城市化进程，也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19 世纪移民是一种全球现象和战略运动。当移民获得其所期待的经济利益或美国遭遇经济困境时，许多人便会离开。例如 1907 年美国遭受经济衰退的打击，离开美国的人数就多于移入人数。

建国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出现在 1830—1880 年间，即所谓的“旧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北欧和西欧，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中国人在 1840 年代末淘金热期间抵达美国，并立即受到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攻击。1880—1920 年，第二次移民浪潮中有 1840 万移民进入美国，即所谓的“新移民”，其中多数来自东欧或南欧，包括许多天主教徒或犹太人。移民使美国城市人口呈爆炸性增长，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

在美国的工业化时代，来自欧洲的新移民主要有两类。一是农民背景的劳工，他们多来自东欧或南欧。由于工业化的扩展、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和农业的商业化，这些农民期望到美国寻求更大的机会和财富。二是东欧犹太人，他们熟悉城市生活，也更具政治性和世俗性。因其在俄罗斯帝国受到严重歧视，遭受大屠杀和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而移民美国。新移民以多种方式塑造美国历史，推动美国城市迅速发展，但也产生了人口拥挤、卫生和安全问题。

总之，格林教授认为工业化时代大量欧洲移民是美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以创造性的方式不断改变和适应着美国。移民引发并参与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但他们始终生活在一个边缘和艰难的环境中。正如斯拉夫移民所说：“我们民族的人并不住在美国，他们生活在美国的底层。”格林教授向大家分享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影片《移民》（*The immigration (1917)*），形象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美国移民的生活。

下午的课程中，教授主要讲授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对亚洲移民的排斥，尤其是中国苦力（coolie）在美国的生活。从 1849 年加州淘金开始到 1924 年，进入美国和夏威夷的亚洲移民数量约为 100 万。亚洲移民中中国（43 万）和日本（38 万）的人数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菲律宾人（15 万人），朝鲜人和南亚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尽管亚洲移民人数总体上比欧洲人少得多，但其对美国影响却是巨大的。

1840 年代末华人大规模移民美国，有“拉力”和“推力”两方面因素。“拉力”方面，华人被美国“金山”的巨大财富吸引，高薪承诺吸引着无数希望迅速致富的人们。“推力”方面，国内自然灾害（如广东的洪水和饥荒）、内乱（太平天国革命）和外患（鸦片战争）交加，物质的匮乏和社会动荡也促使人们向外寻求出路。随着奴隶制在世界各地的废除（如英国的加勒比地

区), 种植者希冀寻找便宜且易于控制的劳动力, 华人劳工便是不错的选择。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中, 华人为主要的雇佣工, 他们所要求的报酬比白人工人低, 且工作勤恳。在管理者的大力督促下, 铁路建设比预期更快。但华工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和危险, 死亡率极高。

1870 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导致白人人工工资下跌, 失业率大幅上升, 反华情绪急剧高涨。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华运动尤为激烈, 还成立了由丹尼斯·基尔尼(Denis Kearney)领导的“工人党”(the Workingmen's Party), 其主要口号是“中国人必须离开!”反华情绪在整个美国蔓延, 如 1880 年的丹佛反华暴乱。1882 年, 美国正式出台《排华法案》, 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 并禁止任何中国移民成为入籍公民。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势将特定民族或种族群体排除在外, 并一直持续到 1943 年。格林教授认为, 《排华法案》开创了一个更加严密控制的年代, 由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追踪、监视、处理和登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这就使得有关移民的行政部门大规模扩张。

为了使学员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种族移民在获得美国公民权方面的历程, 格林教授以中国移民“黄金德(Wong Kim Ark)案”与印度移民“辛德(Thind)案”为例, 与学员们进行了深入探讨。1868 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 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是与生俱来的公民, 但这是否适用于仍然被排除在入籍权之外的中国人? 黄金德于 1873 年出生在旧金山, 父母是华裔, 并在加州长大。《排华法案》规定中国人不能成为公民。那么, 黄金德是否应该被认为是与其华裔父母相同的不受美国管辖的人? 或者, 因为他出生在美国, 他就应该得到公民资格吗? 最终, 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印度人除外)都是公民。在辛德案中, 辛德是一位出生在印度的高加索人, 于 1913 年来到美国,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在二战期间服役, 有理由申请入籍。法院承认根据科学, 辛德是高加索人, 因此是白人, 但法官的结论是“普通人清楚地知道存在明显的差异。”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辛德的理由, 宣布他不具备公民身份。格林教授指出, 以上两案表明美国当局在对种族的认定上并无严格的原则, 其判断完全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中心主义的, 科学和法律都用来为这一种族主义观念服务。

格林教授总结说, 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一些移民受欢迎, 另一些则遭到诽谤和排斥。来自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艺术等方面。他们和长期处于奴役地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一起, 真正建设了美国。亚洲移民, 尤其是中国移民, 扮演了远超出其

人口比例的重要角色。作为种族主义移民法的第一个受害者，中国移民的经历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移民官僚机构，他们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努力奋斗，并因为他们对美国的改变而获益（如黄金德）。

（黄欢欢，四川大学）

## 五

2018年6月15日，“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进入最后一讲，主题为“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全球化”。本讲主要关注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野给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带来的新理解。

格林教授首先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史研究中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转向。跨国史关注跨越国界的人员、商品、文化和资本等的流动，并且关注美国力量如何作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全球史则关注全球动态如何塑造历史，促成了对美国 and 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理解。虽然美国宣称其独特性和例外论，但事实上美国一直被全球动态所塑造，并且也试图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这种对外扩张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激进。美国的帝国政策提供了一种建立在技术、工业和经济基础上的新的帝国形式，同时也带来了在劳工、移民和种族管理上的新政策。

格林教授以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Daniel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Progressive Age*）一书为例，将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放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中。该书以大西洋共同体为蓝图，讲述了大西洋两岸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和竞争。美国的社会改革在与欧洲，包括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广泛对话之中被塑造。罗杰斯将美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与同期欧洲社会政治辩论结合起来，认为美国参与并向欧洲学习的意愿极大促进了美国的社会改革。

紧接着，格林教授梳理了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历程及其经济动力。19世纪是美国在北美洲本土扩张的时期。1898年西班牙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对外扩张的新阶段。从波多黎各、古巴到夏威夷、关岛、菲律宾都被置于美帝国控制之下。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力量，以它先进的科学技术、新的劳工管理策略和现代公司的发明，塑造着美国的帝国主义。工业文明的福音掩盖着美国帝国主义的野心。

美国全球力量的上升带来了人口迁移的新模式，以及在移民、劳工与种族问题上的新政策。移民是美国帝国主义逻辑的核心。招募劳工并驱使他们

“迁徙”成为中心策略，这被视为保证生产率和纪律性的必要。与传统的欧洲帝国不同，美国的帝国政策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变化性，灵活性和机动性是其支配和管理劳工的工具。这种新的帝国政策塑造了一种 20 世纪的新帝国。虽然很多新近的研究关注商品和流通，或者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但事实上控制劳工是创造美国帝国的关键。格林教授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菲律宾的事迹为例说明了美国的新帝国政策。

在下午的课程中，格林教授以自己的著作，《运河建设者：从巴拿马运河构建美国帝国》（*The Canal Builders: 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一书为例，深入解读了全球化视野下的劳工史。巴拿马运河以其壮观成为美国力量的象征，先进的科技固然重要，但使之真正付诸实现的是那些运河建设者们。格林教授的研究关注这些面临危险、疾病、高死亡率的运河建设者，他们的斗争促使政府不断改变劳工政策。

运河项目涉及到全球劳工。运河官员认为巴拿马人工作不够努力，拒绝巴拿马人承担大部分工作，而从不同的国家招募劳工来到巴拿马。一些劳工来自美国、北欧、南欧，而绝大多数是来自牙买加、巴巴多斯岛等地的加勒比黑人。在运河建设时期，大约 150,000—200,000 的加勒比人来到巴拿马地峡，他们最初是从事挖河道的不熟练工人，但很快被训练成作为机械师、木匠、铁匠的熟练工人。

管理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工体系成为对帝国的挑战。美国政府设立了庞大的警察机关、劳工监视机构，驱逐那些被认为“对运河建设无用”的工人。最重要举措是实行种族隔离的薪酬制度（silver and gold system）。熟练白人劳工是领取金制美元硬币的“金饷工”，薪资丰厚，对他们来说运河区的生活像是乌托邦；黑人劳工则是领取银质比索的“银饷工”，薪资微薄，居住在没有窗户的杂物间，面临着事故、疾病和高伤亡率的威胁。当他们感到黑人并不足够努力工作时，政府开始引入西班牙人。他们认为西班牙人是半白人（semi-white men），能够工作得更好。但西班牙人不满被排除在白人旅馆和餐厅之外，开始组织无政府主义运动表达抗议，并参与罢工和骚乱。

美国在巴拿马等地的扩张，塑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政府角色、种族和阶级，以及公民身份的理解。社会主义作家阿瑟·布拉德（Arthur Bullard）认为运河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接近社会主义。政府组织所有事情，没有利益目的，没有贪欲。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倡导的单一税和没有私人财产的梦想在巴拿马实现了。罗斯福总统在视察巴拿马运河时发表的演讲，改变了公众对运河项目的看法，并宣传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和文明的礼物。美国

需要证明运河区情况良好、财政上有效率，因而转向了进步主义改革家的方法。巴拿马运河区成为了进步主义的实验室。

格林教授总结道，巴拿马运河项目提供了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美国劳工、移民和政治史的方式。面临庞大劳工系统的挑战，美国借鉴了国内的种族和劳工管理政策，然而政府发现要不断改革政策才使工作更有效率。运河区因而成为了进步主义改革和劳工管理观念的实验室。

不知不觉，历时五天的研习营活动已近尾声。格林教授充实的讲授内容和富有启发的引导，使营员们获益匪浅。原祖杰教授和格林教授发表了闭幕讲话，祝愿营员们能在今后的学习科研中不断探索，不断进步。最后，格林教授为每位营员颁发结业证书并合影留念，本次研习营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陈婉，四川大学）

## “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纪实

2018年6月25日上午8时，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振华楼顺利开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娜塔利娅·莫丽娜（Natalia Molina）应邀前往武汉大学，担任为期五日研习营的主讲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仿吾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教授，主持本次研习营的开营仪式。梁茂信教授首先热情地欢迎了莫丽娜教授的到来，而后又以自身经历鼓励与会青年学者和莘莘学子，需同国外学者保持密切交流、关注国内外研究动态，以此精进学术研究，最后梁茂信教授对学界新生力量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与祝福。

### （一）种族与公民权

开营仪式结束后，莫丽娜教授于6月25日上午开始了研习营的首次授课。课程伊始，莫丽娜教授首先呈现了一幅来自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图中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身旁满脸惊恐的小女孩，一旁附有“欢迎来到美国”的字样。而后，教授细致地讲解了杂志封面的缘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于6月16日声称，在4月19日至5月31日期间，有大约2000名儿童与父母强行分离，被迫前往大型“托管”中心（Mass detention center），其中逾百名儿童的年龄不超过4岁，而这些家庭分裂、骨肉分离的原因在于他们乃是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恰逢特朗普政府不断收紧移民政策之时，伊万卡·特朗普却在社交网络中分享了一张她怀抱爱子、异常温馨的图片。这张其乐融融的图片，与众多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现实之间鲜明的对比，挑动着美国民众的神经，由此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莫丽娜教授指出，有关公民权（citizenship）问题的争议，以及移民困守拘留中心的事例，都并非美国历史上孤立的个例，不同种族群体间的历史乃是相互关联（relational）而非孤立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



出于对美日战时敌对关系的考量，将约 10 万名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迁往拘留营内集中看管，此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创伤，亦是一段羞耻的记忆（shy memory）。如今这些被视作“非法”（illegal）的孩子们，以及彼时被困于拘留营内的日裔美国人，他们皆被视作“非美国人”。而这一概念的界定与公民权息息相关。莫丽娜教授谈到，当我们探讨公民权问题之时，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总是“司法意义上的”（juridical）公民权，然而在遥远的过去，又该如何界定何人才属“公民”。因此，对公民权的探讨不应止步于此，还需重视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公民权。在美国，公民是美国国体（American body）与政体（American polity）的组成部分，若某人不被视作是公民，则将被永远边缘化；而今这些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儿童，他们不被社会接纳且缺乏足够家庭关爱的情况下，极易在社会中沉沦并日益堕落。教授认为，一些人值得被给予公民权，但如今他们的权力正在被剥夺。

除公民权问题外，“种族塑成”（race making）、“种族脚本”（race scripts）与“关联性”（relational）亦是莫丽娜教授在课程之初重点阐释的概念。教授认为，“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而“种族塑成”则是囊括话语（discourse）、形象（images）及实际政策（actual policies）在内的框架结构（structure）。谈及种族的塑成，“映入眼帘”的是文化、思想（ideas）、形象、话语及语言（language），但同时种族塑成亦是结构（structure）、政策（policy）与法律（law）。在上述事例中，被分隔的墨西哥家庭与日裔美国人虽身处不同时空却彼此影响，“种族脚本”（race scripts）在相似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背景下反复演绎，因而不同种族群体间的历史乃是交错相连，这便是“关联性”（relational）的内涵所在。而莫丽娜教授的研究重心，以及她在接下来课程中意欲讲授的是不同种族群体间的关联性，探究种族塑成的不同阶段，它们如何形成结构，又何以成为文化。

随后，莫丽娜教授在回答与会学员的提问，明确后几日的课程安排之后，开始转向探讨美国奴隶制的起源。长期以来，黑人被视作美国奴隶制首当其冲乃至唯一的受害者，然而教授谈到，美国奴隶制可追溯至 1619 年永久殖民地建立后不久，欧洲殖民者在首批黑人到达前，便已强迫美洲土著在种植园中劳作；与此同时，种植园中仍有部分白人契约奴，因此黑人并非唯一的被奴役群体。而后伴随殖民体系的成熟完善，以及种植园农业经济规模的扩大，来自非洲的黑人劳工被源源不断地输往美洲，自由人与奴隶的永久边界由此形成稳固。肤色成为自由与否的唯一准则。“白人成为自由的代名词，非白人则与奴隶制相生相伴”。

由奴隶制所引出的重要问题是，应当如何定义种族。莫丽娜教授认为，“种族”是社会建构的概念。以对墨西哥人的种族界定为例，为占有墨西哥割让的领土，美国于 1848 年将居住在此地的墨西哥人划归白人之列，并给予他们美国公民身份；然而在大萧条时期，墨西哥人与墨西哥裔美国人成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其种族与公民身份饱受争议，美国人口普查时甚至将墨西哥人单列为一个种族。在奴隶制存续之时，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种族的定义亦是纷繁复杂，教授在此主要介绍了两大种族定义原则，其一是以一滴血判定某人属于黑人的“一滴原则”（one-drop rule），其二是联邦政府为限定印第安原住民获取公民身份，而制定的“血缘比例”（blood quantum ratio）原则。

在阐释种族定义的原则后，莫丽娜教授继而对 1705 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颁布的州《奴隶法典》（*Slave Codes*）进行了具体文本分析。法则关于奴隶的条例极为严苛且缺乏人道，其中谈到被带入美国的雇工，若在其母国并非基督教徒，则可被认定为奴隶；而奴隶若反抗其雇主，则将被处死。而后，与会学员在莫丽娜教授的主持下，围绕法则中奴隶不得拥有财产、不得在无白人在场情况下集会、强制宵禁与不可在法庭内用证词反驳白人等具体条例，以及 1850 年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的《印第安人管理与保护法》（*An Ac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dians*）展开讨论并提出疑问，教授分别对“种族脚本”具体内涵、“关系取向”（relational approach）适用范畴、印第安人是否可作为陪审团成员、为何限制印第安人饮酒等问题，以及法典条例中具体条款进行了回答与解读。

（陈郁晗、张守慧，武汉大学）

## （二）“种族脚本”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构建

6 月 26 日的课程，莫丽娜教授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移民的政策的一系列言论引入探讨主题。展示了特朗普在其 Twitter 中提到的所谓“好的移民”“坏的移民”的言论后，莫丽娜教授强烈质疑这种说法：什么是好的移民？什么是坏的移民？她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美国历史上“白人”与“非白人”、“奴隶”与“自由民”、“公民”与“非法移民”的翻版，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观念一样，都是构建出来的。

但是，这种观念是怎样在美国历史上被一步一步构建出来的呢？莫丽娜

教授援引了美国历史上的宪法及其修正案、法案、移民政策、司法审判、政治漫画来对这个历史构建的过程进行了解释。例如，美国宪法实际上默认了奴隶和奴隶制的存在，后来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则废除了奴隶制度。并且，通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从法理上来说，虽然黑人获得了公民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就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实际上，随着奴隶制的废除，“白人至上”的观念又逐渐被发明出来。黑人虽然名列公民，但实际上只是二等公民，依然没有享有平等权利。“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随后被运用于其他移民身上，随着美国政府逐渐收紧了移民政策，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也就应运而生。

为了让学员对美国的种族观念有更加直观的理解，莫丽娜教授播放了一部名为《种族：错觉的力量》（*Race: The Power of an Illusion*）的记录片。这部一共三集的记录片重新审视了我们所谓的“种族”观念到底是什么以及这种种族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集中，通过对包括非裔和亚裔在内的美国人的DNA进行排序和对比，科学家发现，一个人的基因与所谓的其他“种族”的基因实际上无甚差异。这表明，“白人至上”具有生物和遗传学等科学的支持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第二集则试图进一步说明，造成“种族”隔阂的，实际上是人们的带有偏见的信念和信仰。一个宣称对自由有着深刻信仰的国度却是奴隶制的忠实拥趸者，这不能不说令人感到讽刺。也许，这种正是美国这个“白人至上”意识形态泛滥的国家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悖论。最后一集则不仅关注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对“种族”的塑造，还更为深刻地指出，国家的机构、制度同样在制造着“种族神话”。法院的判决、住房政策塑造并巩固了本就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即便是民权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这种种族歧视仍在持续。

不仅如此，莫丽娜教授以自己的研究经历来对美国种族观念的构建进行深入分析。在其著作《适合成为公民吗？》一书中，她强调了公共医疗和卫生是怎样定义族裔的。她以洛杉矶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为例，探究他们与华裔之间的移民经历。进而指出，实际上，从1869年到1920年间，洛杉矶的公共卫生部门对墨西哥移民的认知来自于对华裔与白人的认知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作为一个族裔，是华裔和白人定义了墨西哥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的种族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一书中，她进一步探究了各个种族之间是怎样互相定义的。通过审查与移民有关的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来源，她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即我们对种族的理解是以社会关系的方式构建的。

她的中心理论——种族脚本（Racial Scripts），强调了种族化群体的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相互联系，从而相互影响的方式。种族在美国的创造方式也表明，这些关于种族文字很容易被采用并适用于不同的种族群体。而且，种族脚本还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不断翻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内战以前是“自由民”与“奴隶”，内战之后是“白人”与“非白人”、“公民”与“非法移民”。实际上，这些名词都带着深刻的种族烙印。因此，莫丽娜教授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是一种观念，它通过政策、教会学校、文明政策、法律、审判等诸多方式被发明出来，所谓的美国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构建在种族基础之上的”。

那么，这种种族观念的背后动因是什么？莫丽娜教授认为，大多数人知道托马斯·杰斐逊在 1776 年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句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作为南部州的种植园主，还在隐隐担忧奴隶将来叛乱，会带来一场种族战争（Race War）。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黑人奴隶等复杂的种族历史都可以在经济、土地、权力等范畴中找到解释路径。种植园主对黑人奴隶的经济剥削和人身占有；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为了抢夺土地；墨西哥裔最初大量进入美国，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需要劳工，后来遭到排挤实际上与美国的经济萧条密切相关。但是，这些都被掩盖在冠冕堂皇的观念之下。公民理所应当应该是“白人、男性、拥有财产”，而“非公民”就是那些“无能之人、女性、印第安人和穷人”。颇为吊诡的是，这些观念竟然也被少数族裔接受了，并且制造出了一个“种族等级”的神话。不惟如此，这种种族等级还与女性地位、性别关系、阶级相互勾连，犬牙交错，绘制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种族历史画面。

因此，如何看待和研究美国的种族政治史？莫丽娜教授给出建议。她认为，应该“将种族作为一个联系的概念来理解”（Understanding race as a relational concept）。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理解黑人史和内战史，我们也很难以研究《排华法案》，如果不清楚印第安人的历史，我们也很难以理解今天墨西哥裔美国人的遭遇。因之，种族政治史是一个跨越种族、性别、阶级的领域。而且，通过追踪最新研究进展，莫丽娜教授认为，我们还可将美国的种族政治放入到跨越国界的全球史中去探讨。她认为，保罗·克雷默（Paul A. Kramer）将美国的移民政策放入到跨国视野中，去探讨它与美国的全球霸权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好的研究路径。

（杨崧愉，南开大学）

### （三）“联系路径”视野下的美国排华史

6月27日，“美国种族政治史”暑期研习营进入第三天的学习日程。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娜塔莉娅·莫丽娜运用学术论文、纪录片、报纸新闻、政治漫画等多种材料，与参会学员共同探讨“华裔美国人”的相关问题。

本次课程的阅读材料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贝丝·卢·威廉姆斯（Beth Lew-Williams）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人必须滚：暴力、排外与美国现代亚裔的形成》（*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的第三章与结语部分。在正式进入讲授前，莫丽娜教授首先播放了一部短片作为引言。在该片中，多位亚裔美国人出镜接受采访，表达了自身对在美遭受的种族暴力的强烈不满。莫丽娜教授指出，尽管针对华裔的暴力行动在美国频现，但学界对其关注程度远远不及针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暴力行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1980年代发生的陈果仁（Vincent Chin）案在美国社会中造成强烈反响，但总体来看，像这样广为人们熟知的针对华人的暴力案件并不是很多。造成这种“历史的忽视”的原因有很多，针对种族的暴力活动很少在学校中讲授、模范少数族裔理论（Model Minority）作为传统的研究框架阻碍了深入的研究、遭遇暴力袭扰的华裔因读写能力不足较少留下一手材料等，都应当为这种情况负责。莫丽娜教授认为，面对研究的不足，方法论上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运用联系路径（Relational Way）能够有效认识不同族裔的历史发展中的共同经历，进而避免狭隘的将“种族暴力”视为仅限于黑人等部分种族的行为。

在地方层面（local level），莫丽娜教授以加州的情况为例，描述了地方政府及地方社会的排华情况。她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的“淘金热”（The Gold Rush）吸引大量中国人涌入加州。然而，紧随其后的大萧条使华人的失业率上升，迫于生计，许多人不得不在农场、家庭服务、洗衣服务、餐馆等地打工谋生。旧金山的劳工市场有鲜明的种族界限，中国人只能从事低贱、低工资的工作。随着华裔人数的增长，“黄祸论”（Yellow Peril）的文化观点日益盛行，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行动起来。例如，丹尼斯·卡尼（Denis Kearney）在加州组建工人党（Workingman's Party），呼吁对华人进行驱逐和惩治，并领导了对中国城的洗劫行动。地方政府则动用立法和行政手段，通过限制生存空间、加征税收、禁止通婚等规定对华人的生活进行诸多限制。

在课堂讨论环节，围绕贝丝·卢·威廉姆斯教授的新书，莫丽娜教授与学员从三个问题出发展开交流。首先，关于本书的方法论意义。莫丽娜教授认为，贝丝·卢·威廉姆斯试图运用新的研究透镜（lens）研究旧的问题，采用跨学科的方式，将移民的“地缘政治性”（geopolitics of immigration）凸显出来。作者用“jumping scale”这一术语，将移民视作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第二，关于种族内部的阶级冲突。贝丝·卢·威廉姆斯认为，华人社区并非是一个统一体，商人和工人处在不同的阶层，一方试图稳固自己的现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则在努力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由于二者在利益上存在的差异，因此往往难以达成合作；第三，关于“现代美国公民身份”（Modern American citizenship）与“现代在美外国人”（Modern American alien）的概念问题。贝丝·卢·威廉姆斯指出，“现代美国公民身份”与“现代在美外国人”是同时出现的。随着《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仅黑人和白人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juridical citizenship），除此之外所有的种族都被视为“外国人”。因此，内战表面上是公民身份适用人群的扩大，实际上使“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分明。

（许哲铭，北京大学）

#### （四）“非法移民”观念的历史构建

时间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悄然飞逝，一觉醒来已是研习营的第四天。连日来的酷热稍退，微凉的清风拂过，朝霞轻柔地洒落，静待着新一天日程的开启。

上午 8 时，研讨课程在娜塔利娅·莫丽娜教授与学员们亲切的问候声中准时开始。莫丽娜教授首先对美国时下的外来移民政策及其社会反响进行了简要介绍，借以引入当日的研讨主题——“墨西哥—美国：前往美国的墨西哥移民”（MexAmerica: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S.），随后结合阅读材料就此展开了专题讲授。她尝试透过一系列标志性法令来审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来移民情况，进而勾勒出“非法外来人士”（illegal aliens）观念在美国产生、演化与实践的宏观图景。

莫丽娜教授表示，1924 年出台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是“非法外来人士”观念形成（making）的关键。确切地讲，“现代非法移民”（modern illegal）概念产生于“现代美国公民”（modern American citizenship）概念出

现后不久，特别是在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此项法令的重要性突出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限定了东半球国家准许移民至美国的人口数量；二是将未经授权的入境由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驱逐出境也不再是一种行政程序；三是取消未经审查而入境的诉讼时限（statue of limitations）；四是增添了罚款和监禁等惩罚措施；五是创建了边境巡逻队（Border Patrol）。要而言之，该法令标志着美国边境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由宽松到收紧，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墨西哥出于自身发展的劳动力需求，也试图限制本国人口北上美国。此外，莫丽娜教授还专门辨析了“非法的”（illegal）与“无文件证明的”（undocumented）这两种词语表述的异同，指出在当下的英语语境中，人们多倾向于使用后者，以强调“没有人可以被视作非法的存在”。而针对相比于其他族裔，墨西哥移民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被视为非法外来人士代表的问题，莫丽娜教授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其在美国外来移民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最大。

然而，当时的美国人并不认为外来移民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所以此后不久，美国的外来移民政策便经数项法令的调整再度出现松动。莫丽娜教授指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期才发生转变。1929 年的《登记法》（*The Registry Act*）准许在 1921 年之前未经登记即入境抵美的移民花费 20 美元重新登记，获取合法身份。1935 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保障外来移民家庭的完整性，身处美国的非法欧洲移民被准许暂时前往加拿大，之后再重返美国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1940 年，国会批准以外来移民的贫困（hardship），具体阐释作“严重的经济损害”（serious economic detriment）为由，中止驱逐其出境的命令。但是，所有这些法令都缺少对于外来移民合法身份明晰的判别标准，其身份合法与否完全取决于负责外来移民事务的行政官员，即所谓的“行政裁量权”（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难以保障法令施行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

1965 年的《哈特-塞勒法》（*Hart-Celler Act*）因其双重性特征被莫丽娜教授单独列出予以研讨。此项法令一方面取消了针对东、南欧及亚洲的种族外来移民限令，另一方面却也第一次制定了针对西半球国家的外来移民限令，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非法移民的产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法令制定的初衷本是为了彰显美国的自由精神，增加欧洲移民的数量，以平衡美国东、西半球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却不曾想到结果反而促成了亚洲和墨西哥—中美洲两股外来移民潮。基于上述分析，莫丽娜教授高度评价 1965 年这项移民法的历史地位，称其对理解美国的种族分类与形成、种

族自由主义以及其移民国家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紧接着,莫丽娜教授向学员们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美国政府驱逐墨西哥移民出境的图片以及一张洛杉矶墨西哥移民家庭的照片,由此引出“定锚婴儿”(anchor baby)及美国外来移民家庭亲子离散的话题。莫丽娜教授试图从国会辩论和法院判例着手对此进行研究。目前,她所发现的一份最早的涉及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是1935年的《科尔议案》(Kerr Bill),它立法目的在于为非法外来移民开辟一条成为合法公民的路径。虽然该议案最终没能获批生效,但是莫丽娜教授认为,围绕其不同版本展开的持续了数年的争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有关外来移民的讨论,尤其是在法律层面上开始关注到外来移民儿童的公民身份。继而,就这份议案对其试图归化的目标群体的要求,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good moral character),以及暂停对个体驱逐出境程序的条件,即会对相应个体家庭产生严重后果或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这两项内容来讲,莫丽娜教授又以图片和照片为例展开了具体论述,揭示出相关条款的模糊性和因而易受主观价值判断影响可能造成的不公。

除讲授知识要点外,莫丽娜教授还特别注重对学员们史学思维与方法的培养。她反复强调历史在纵向与横向上均是具有关联性的,提醒大家在研究某种外来移民思想或政策时要关注其起源,呼吁大家将不同族裔的历史,不同维度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她尽力诠释历史的复杂性,主张言行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有关外来移民政策的研究,不仅需要看它说了些什么,还应该看它实际做到了些什么。同时,考虑到部分学员对亚裔和民权等问题比较感兴趣,莫丽娜教授又精心准备了一份相关课题的会议论文征集启事,并鼓励大家在专注自身研究之余多留意其他领域的学术动态,认为了解学界研讨和论著是如何演进的非常重要。

讲授环节以莫丽娜教授列出其从阅读材料中提炼出来,供小组讨论参考的备选问题而告结束。在气氛热烈的茶歇过后,前几之余下的学员遵循每日惯例完成了自我介绍,课程随即进入研讨环节。

在此环节中,学员们先后围绕课前阅读的资料和课上观看的纪录片,分别就经济因素在外来移民问题中的作用、美国人对外来移民态度的转变、墨西哥政府对移民至美国的本国人的态度转变、美国白人和墨西哥移民的不同立场以及政府在民众眼中的负面刻板印象等问题各抒己见。其中,经济和文化因素对美、墨双方外来移民政策的影响是学员们普遍予以关注的焦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部名为《不再有婴儿》(*No More Babies*)的纪录片是莫丽娜教授为了本次研习营,专门从蕾妮·田岛-佩纳(Renee Tajima-Pena)



导演那里求得的独家资源。这位导演长期聚焦移民、种族和性别等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由其参与指导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曾获得 1989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这一次，她将镜头对准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USC Medical Center）产子过程中被实施了绝育手术的拉丁裔妇女。有证据表明，一切都发生在她们毫不知情或遭受胁迫的情况下。针对该事件提起的“马德里加尔诉奎里根”（*Madrigal v. Quilligan*）联邦集体诉讼案最终做出了有利于医生一方的判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医疗体制的改革，使之更加重视病人知情许可（informed consent）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不以英语为母语的病人。

在研讨课程接近尾声之际，莫丽娜教授援引美国学者乔治·利普希茨（George Lipsitz）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身份，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We cannot choose our identities but we can choose our communities.）

（刘璐瑶，南京大学）

## （五）种族视野下的“黑人大移民”

6 月 29 日上午进行了本次研习营的最后一次课程。娜塔利娅·莫丽娜教授先回答了昨日学员们在卡片中提出的部分问题，并介绍了美国学术界相关的著作供学员参考。随后，在莫丽娜教授的引导下，学员们围绕着《囚犯之城》（*City of Inmates*）一书中第六章“为塞缪尔·福克纳谋求正义”（“Justice for Samuel Faulkner”）的内容展开了讨论。莫丽娜教授提醒学员们，在审视这段材料的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关系取向”（relational approach）、“层级跨越”（jumping scale）以及“地缘政治透镜”（geopolitical lens）的研究理论。学员们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多个问题，莫丽娜教授分别从“移民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美国黑人社区的复杂性以及美国警察在种族冲突中的角色等角度进行了解答。

之后，莫丽娜教授向我们详细解读了美国 20 世纪的“大移民”事件（The Great Immigration）。她指出，从 1916—1970 年间，美国约有 600 万黑人从南部迁移到了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城市；这些黑人大多不满于南部地区匮乏的工作机遇和无处不在的种族隔离法，选择离开故土向北部进发，而北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工业经济恰好迎合了这些黑人的经济需求，这推动了南部黑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移民浪潮。黑人移民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中，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要为自身建立一个新的“聚居地”，以积极应对政

治经济上的歧视现象和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北方的白人面对移民黑人，必须坚持既有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站在白人这一边，否则其他白人会对他冷眼相看。为此，移民黑人需要创造一种黑人城市文化，从而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经济影响力。为了进一步加深学员们对黑人移民浪潮的理解，莫丽娜教授展示了雅各布·劳伦斯于 1940—1941 年间创作的 60 余幅刻画黑人大规模移民活动的画作，这些画作当时并没有吸引公众关注黑人问题。黑人移民脱离了南部的“种族隔离”（segregation），在北部城市实现了“种族聚合”（congregation），但他们没能逃离种族冲突。在 20 世纪 50 年代，芝加哥的埃米特·提尔（Emmett Till）和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两位黑人青少年，因为疑似冒犯白人女性，前者被白人毒打致死，后者被白人警察射杀。案件中涉嫌犯罪的白人均被无罪释放，这一事件激起了黑人群体大规模的抗议，并由此推动了“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的兴起。

最后，莫丽娜教授播放了名为《第十三条修正案》（*The 13th*）的纪录片。该纪录片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漏洞说起，为我们描述了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中的既定形象，随后从尼克松政府的“南部战略”（Southern Strategy）到里根政府时期的“毒品战争”（War on Drugs）再到克林顿政府时期进一步强化打击犯罪力度的政策，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对黑人施行“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的社会图景。莫丽娜教授解释道，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原始恐惧起源于奴隶制度，并由此形成了种族歧视；民权运动后，联邦政府不安于黑人群体中存在的激进因子，以打击犯罪为名，以媒体对黑人的夸张报道为辅，将大量黑人投入监狱，由此造成了美国囚犯总数的直线上升。因此，犯罪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在美国，它同样是种族问题。之后，学员们就马尔科姆·X 和马丁·路德·金两位民权领袖的不同主张向教授请教，莫丽娜教授结合相关学术著作进行了回答，学员们积极参与到了课程中的最后一次讨论中，场面一度十分活跃。最终，莫丽娜教授以一句话结束了本次研习营的课程，正如在美国努力争取平等的少数族裔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份，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共同体”。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老师在课程最后感谢了娜塔利娅·莫丽娜教授在研习营期间，认真负责且颇具启发意义的授课，对学员们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随后，娜塔利娅·莫丽娜教授和杜华助理教授向各位学员们颁发了研习营结业证书。至此，武汉大学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的课程部分圆满结束。

（柏莹珉，武汉大学）

美国纪行



## 2018 年 AHA 年会参会小记

李 晶

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AHA）第 132 届年会于 2018 年 1 月 4 日至 7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AHA 是全美最大的历史学专业组织，它服务于美国整个历史学科的史学工作者，旨在推动美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提升历史性思考在大众生活中的地位。会议举行前，笔者收到访学项目合作导师美国著名医疗社会史学家艾伦·克劳特先生发送的会议讯息，他热情邀请笔者与其一同参会。初到美国访学尚不足月，就恰逢此次盛会且举办地正是笔者所在城市，心中不免一阵窃喜，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本次会议延续着往届年会规模盛大的特点。华府凛冽的寒风并没有减少美国学界的参会热情。仅直接参与各类主题讨论的发言者就有 2002 人。据会议注册组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加上各类旁听者，与会人数将达到 3000 人左右。这样的学术会议规模在我国学界是少见的。庞大的会议规模首先归于年会的开放性。会议对与会者的资质要求非常宽松。无论是否为 AHA 会员，任何从事与历史学科相关工作或对历史学感兴趣的人士皆可参加，只是会议注册费用略有不同。在专业性较强的分会研讨（Sessions）中，尽管会议要求除了外籍或其他学科学者，发言者必须为 AHA 会员，但是讨论会面向所有参会者开放，作为听众依然可以在提问环节获得与专业会员平等对话的机会。在 AHA 及其下属协会举办的各类研讨中，除与大会主题相关的学术研讨外，还有关于历史教学、专业学习方法、历史职业规划、公众史学等主题讨论。这些研讨内容吸引着从事学术研究以外的历史教师、高校研究生以及历史兴趣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年会的内容和形式非常丰富，体现着 AHA 服务对象多元化的特点。首先，为专业学者搭建交流平台。本届年会的学术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参加学术分会研讨发言的学者在会议召开前近一年的时间里，便开始自行组织分会小组的讨论主题和参会论文，待大会组委会审核通过后，成为正式的分会主题。这一形式与国内史学会议中，主办单位收集参会论文、拟定分会主题差别较大。AHA 分会主题的确立方式，不仅使学者间的学术联系自会议之前就开始建立，还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研究领域相近的同行展开充分交流。除小组主题研讨外，AHA 自 2006 年开始为部分富有洞

见、主题新颖的学者设置海报展示分会。学者们将参会论文图文相配制成海报，站在海报前与观众直接面对面展开学术对话。这种形式比起略带严肃的分会研讨轻松不少。

其次，为历史教学者提供教学资源与经验的分享会。本届年会涉及此类的工作坊（Workshop）就有 24 个。从事美国基础教育（K-12）的教师构成了参与主体。他们就各自的教学经验，特别是教学中面临的新问题展开了充分探讨。其中一场对话名为“特朗普时代的教学保守主义”令笔者耳目一新。同时，年会为在读研究生设置了专项学习辅导沙龙。如，组织一些历史学者对各自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心得与研究生们进行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为历史专业学生展开就业辅导、搭建招聘平台。这构成了 AHA 年会的另一重要内容。本届年会为学生从事非学术性工作专门开设了培训工作坊，同时邀请联邦政府多个部门的官员介绍招聘流程和职位需求。年会不仅专设就业中心（Job center）为招聘单位和面试者提供基本服务，还举办大型招聘咨询会，由富有职场经验的历史学者为学生提供各种职场咨询服务。

全美主要出版社汇集的年会书展是吸引参会者驻足的又一重要场所。本届会议共有知名出版社、杂志社、数据库等 96 家公司参会。各出版社集中展出了 2017 年出版的新书，参会者可享有 20% 至 50% 不等的折扣，甚至一些出版社还把即将在 2018 年出版的图书赠送给参会者试读。书展旁特意为出版社、杂志社编辑与历史学者提供了洽谈业务的场所。笔者在书展中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见到了本次年会主席加州大学教授泰勒·斯托瓦尔（Tyler Stovall），简短的交谈中他告诉笔者，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籍学者关注 AHA 年会，他期待在今后的年会中听到更多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年会丰富的活动不止于此，会议为参会者精心准备了华府古迹游览，导游皆由当地专业协会的工作者担任。期间，年会还安排了 7 场历史影片盛宴，每场观影后都有相关学者，甚至是该影片导演或制片人与观众直接展开学术对话。

面对精彩纷呈的年会内容，笔者最关注的还是各主题分会的学术研讨。本届年会 AHA 筛选的主题分会及其各下属协会召开的小组研讨多达 598 场。凭一己之力，难以窥探全貌。现通过分析年会中对医疗社会史的研讨，管窥这一领域在美国的研究现状。

社会建构理论仍然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路径。20 世纪 70 年代，当英国医疗社会史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带领其支持者，极力批判“传统”医史一味关注“伟大医生”与“伟大技术”，而对“社会情

境”视而不见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疗社会史学者几乎已经战胜了“传统”。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成为美国学者考量历史上医学知识、临床实践以及疾病、健康模式的主要内容。多数医疗社会史学者将人类历史上的医学卫生活动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本届年会医疗社会史方向的论文依然体现着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具体呈现出三种研究路径：

其一，历史上医学、卫生制度的建立与民族国家构建、政府合法性的确立存在密切关系，同时前者也是理解后者的重要途径。年会中部分美国学者指出，在美国内战前公民的健康与病痛已经超越了身体范畴成为国家福祉的重要符号，身体健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构成了美利坚民族初期的“美国梦”。例如，加州大学的保罗·沃登以 1793 至 1813 年新奥尔良的黄热病疫情为具体案例，考察了疫情中的新奥尔良人对“美国公民”身份认同的变化。诺特丹大学的乔纳森·里德尔通过考察内战前北方的政治著作以及医生、生理学改革者的活动，指出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医学工作者为医学工作赋予了政治内涵，同时也将公民的身体赋予了政治意义。

其二，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面对全新的医学理论和技术所采的对策是如何抉择的。这一研究主题在本届年会集中于种族医学问题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种族开始成为美国医疗社会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不过，目前多数研究较为微观，多关注种族内部具体群体的具体健康问题。本届年会几项较为宏观的研究，尝试为日后类似主题研究提供借鉴。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亚拉·纳瑞丁指出，20 世纪初美国非洲裔医生之所以接受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优生论，正是对非洲裔受到优生论伤害的回应。他们希望借助遗传学理论，通过控制生育、开展公共卫生等手段改善种族基因。

第三，关注病人、大众对疾病、公共卫生措施以及治疗手段回应的影响因素。年会中学者们认为，美国消费者对于疾病和健康的理解受到医学、科学以及资本主义的多重影响。医药公司、生物科学家、医生等利益群体从儿童时代起就对美国消费者的健康观进行了塑造。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辛西娅·康诺利指出，从 1948 年至 1973 年美国社会围绕儿童使用阿司匹林是否有害健康展开激烈争论。期间，社会大众对儿童使用阿司匹林态度的变化，是各利益群体协调妥协的结果。

其次，对新医疗社会史的修正。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社会建构论几乎主导着欧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路径。然而，对社会情境的过分强调，也让历史学者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医学特性。美国著名医疗社会史学者查尔斯·荣森伯格甚至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便发出警告：“不要让社会、经济解释的光辉

遮蔽了医疗科技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本届年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对现代生物医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展开了考察。哈佛大学的伊芙琳·哈蒙德指出，历史上现代生物科学对于认识种族问题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有些生物科学理论被赋予了政治内涵。与此同时，新的种族科学与旧的种族科学对于影响种族发展究竟存在何种差异。这些都是医疗社会史学者关注的内容。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卓·尼尔森考察了历史上借助 DNA 技术修复人体损伤原理来思考修复社会关系的社会项目，指出基因学在今天的种族政治中将发挥复杂、甚至是负面作用。威斯康星大学的琼·藤原认为，21 世纪生物科学对遗传基因与疾病关系的研究似乎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种族概念复活，可能回归思考种族与疾病关系的老路。美国历史学者对现代医学知识的思考，也让笔者再次感到医学知识对于医疗社会史学者考察历史现象的重要性。

再次，跨国视角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兴起。美国医疗社会史学者对于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历史书写可能并不陌生，他们甚至是较早一批从全球史视野观察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者。从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到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著作。然而，在全球史兴起的三十多年里，全球健康史著作并不多见，有限的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疾病史领域。这可能要部分归于全球史的题材范围相对狭小，医疗社会史中许多跨国现象可能仅涉及两个国家或者社会，全球意义并不明显。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跨国史研究逐渐在美国出现，这为医疗社会史学者将考察视野投向民族国家以外的领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本届年会中医疗社会史成果较多地采用了跨国视角。这一视角首先体现在一些外交史与医疗社会史的交叉领域。跨国史的兴起使国家政治以外的许多社会内容被纳入外交史研究，其中就包括公共卫生。分会讨论中学者们对 20 世纪美国与拉美所开展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考察，其中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知识的流通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内容。密歇根大学的乔尔·豪威尔分析了二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对巴西医疗制度化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以及拉美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的奥列佛·弗莱雷对二战后初期美巴两国在科学外交领域的合作展开了研究，指出巴西的精英医学家和物理学家皆受惠于睦邻政策，并在日后成为两国民间外交的主要推动者。毒品药品（Drugs）和酒精一直是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重要内容。美国边境的毒品药品走私活动中，交通运输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走私环节。在跨越国界的网络中，涉及了多国、各种群体的利益。普渡大学的伊莱恩·凯利从历史的角度对毒品跨国走私网络的形成进行了考察。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跨国



史研究在美国医疗社会史领域的兴起，还与目前美国学界对这一研究视角的推动直接相关。本届年会在对会议主题“全球视野下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的解释中明确注明：“大会主题的焦点应是跨国史和全球史中的种族和族群。这并非要取代民族国家，而是要追问在跨越国界的过程中种族认同发生了何种变化，种族的流动性将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边界本身。”

AHA 四天的年会令人收获颇丰，不仅开拓了笔者的学术视野，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在异国他乡见到了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王佳欣博士和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徐天博士，感谢他们的帮助。最后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AHA 年会中大会主席开幕致辞的时段，也安排了其他的学术讨论。书展中我向刚结识不久的 AHA 会员、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在读博士卡莉·斯特里特请教，“难道大会主席就不怕自己发表演说时，台下观众席太过冷清吗？”卡莉随手拿起书摊上的一本图书，用手指向书籍标题上的一个单词，我低头一看是“Freedom”。

（李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 美国历史学会第 132 届年会侧记： 以“移民”为视阈

王佳欣

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AHA）于 2018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7 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以“全球视野下的种族、族裔与民族主义”（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为主题的第 132 届年会，与会人员除了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历史学家和攻读学位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人员、独立学者与社会活动人。可以说，凡是对美国史学发展感兴趣的学人（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都可以注册参会，而其中的海报展示环节，也使得很多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得以受邀参会。其多元化的参会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会议主题与议题设置中“展现全貌、因应现实”的特质。不难想象，当每一个参会者都可以在一份涵盖三百余个议题、一千多场报告的日程单中，定制出独特的学术体验时，他（她）们的研究兴趣则也被精致、巧妙地组合。而此篇侧记即为笔者以美国移民史为主要视阈，对会议做出的一些总结与观察，望助益于读者。

### （一）移民与“全球视野下的种族、族裔与民族主义”

美国移民史学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彼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的一句“当我意图写就美国移民的历史时，才发现移民便是美国的历史”，为移民赋予了国史书写的意义。这样的宣言所奠定的国史叙述框架，虽然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推动了移民史学的发展，却逐渐成为学者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关的省思延伸到了此次会议中。

此次 AHA 年会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种族、族裔与民族主义”。虽然这一主题并不是每场议题的核心，但却为大多数发言所包含。这一方面体现了“种族、族裔与民族主义”作为史学话题的涵盖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现实热点的历史性。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它与“移民”问题的紧密关联。如果将“种族”“族裔”“民族主义”看作一个棱镜相互联结的表面，那么“移民”将毫无疑问成为重要的折射点，任何一束透过棱镜的光，都会折射出移民问题的复杂面相。与此同时，作为跨国关系的天然载体，“移民”一

一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即拓展了“种族”“族裔”“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其全球视野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美国移民史学的近期发展与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的大趋势可说是桴鼓相应的，去中心化的多国、跨国叙事为追溯不同种族、族裔、民族的过往提供了重要的取径。

具体而言，跨国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对移民史学的影响在近三十年间被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各有侧重的概念——“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边境”（borderland）与“散居族裔”（Diaspora）。而此次会议对于美国移民问题的探讨也是在以上三个概念之下展开。此般归纳虽失之简单，却是从侧面反映了AHA年会在主题拟定方面的特点。首先，关注于特定群体的议题，大多由AHA的附属学会发起和组织，为了“统领”对同一群体过往的不同叙述，他们往往会设置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概念，这也为相关的研究者提供了掌握前沿的线索。与之相反，由学者（教授或学生）自组的议题，则更为关注所述命题的集中性，这就使得关注对象往往为多个群体，核心概念也并非必需。但值得注意的是，主题导向性的议题虽然并不聚焦于特定移民群体，但它们在移民问题上往往会贡献出更为细致（在具体研究路径与观点层面）或更为宏观（从广泛意义上的移民群体角度）的学术对话，这在后文中会详细介绍。

在AHA的60余个附属学会中，美国波兰人历史学会（Polish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PAHA）、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CHA）、拉丁美洲历史学会（Conference on Latin American History，以下简称CLAH）对移民问题的关注较为集中，其所组织的会议除了邀请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外，还会邀请来自它国、尤其是移民输出国的历史学家。相关议题的研究对象从波兰裔、犹太裔、爱尔兰裔到拉美裔，甚至囊括了非裔美国人。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反映了移民群体在“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跨太平洋”（Transpacific）、“边境”（Borderland）与“散居”（Diaspora）语境下种族、族裔、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其突出特点是关注个案，聚焦具有特定社会身份、或生活在特定地域的移民及其后代，他（她）们的政治活动与多重身份（边界）之间的张力是为学者研究的重点。

举例而言，议题“界定归属：19、20世纪美墨边境上的种族、族裔、国家归属与异国化（alienation）”中的三篇文章——《不能称作墨西哥人：西班牙故土之争与西班牙主义中种族建构的流变》《褫夺亚利桑那籍：20世纪早期美墨边境的公民身份与身体政治的建构》《“这些陌生、混乱的家伙”：

早期墨西哥移民政策与边境对国家巩固的挑战（1824—1833）》即围绕“边境”这一核心概念探讨了墨西哥移民在迁徙、定居过程中群体身份的变迁。这一变迁，缘于“边境”之地的有形之界。这一界线将跨国界的社会关系嵌入到他（她）们的日常生活中，而种族、族裔身份的无形之界又跨越“边境”之地，影响着更大范围的公民与民族-国家身份的界定。最终，无形之界塑造了新的、有形的边界（籍贯、身体、边境）。

移民史学的“跨国”转向既已形成，相关的反思便被列上日程。以“现代世界的移民与跨国主义”作为议题的圆桌会议，邀请了四位卓有声誉的移民史家，他（她）们以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了移民与跨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南希·格林（Nancy L. Green）教授与德国不莱梅大学的德克·霍尔德（Dirk Hoerder）教授均强调跨国主义的局限性。格林教授从反思移民活动的移动性（mobility）与移民身份的流变性（fluidity）入手，质疑了现今学者对移民自发性（agency）、中间性（in-between-ness）的乐观解读，她认为“这样的侧重会使得跨国行为中的困难、法律限制与挫折被弱化”。

与格林一样，德国不莱梅大学的德克·霍尔德教授同样关注于跨国链条中“实则脆弱”的移民个体。他从“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出发，反对学者在谈论跨国主义之时，“将设定出入境制度的‘国家’（state）与强调文化同质性的‘民族-国家’（nation）合而为一”。他认为此举不仅会导致学者“经验化地谈论移民个体的经济适应与社会融入”，而且也不利于对其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做出动态考察，最终使得决定移民行为的跨国权力框架，无复得见。

相对于对跨国主义局限性的讨论，这场会议的另一主题则意在阐释与拓展跨国主义与现代移民问题的关联。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埃里卡·李（Erika Lee）发表了题为《美国恐外心理（Xenophobia）的跨国维度》一文，一反此前学者将排斥（exclusion）归结为单一国家现象的传统，提出了美国恐外心理的全球建构。

她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相继发生在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地的排华浪潮为例，联系现今在全球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指出了美国恐外心理的历史、现状与他国起源，强调了多国、多中心互动对美国“排外主义”（nativism）的影响。

## （二）“黑白”之外的“隔离”——华人移民历史与美国史学的对话

华裔美国史学虽然最早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末的传教士书写，但它作为美国移民史学的分支，却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张开羽翼。为了驳斥此前主流社会的“偏袒书写”（Partisan Writing），成长、成熟于民权时代的第一、第二代华裔美国史家，在追溯族群历史时，往往依循着“黑种人对白种人”的二元叙事传统，将华人遭受排斥的历史仅仅视为白人对其施加压迫的历史，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异视。20 世纪末，伴随着“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三角互动关系的提出，“黄种人”与“黑种人”之间相互施予的种族化历程，渐为亚裔、非裔两方历史学家所关注。这一趋势在此次会议中虽然并没有完全体现，但是从议题的设置与讨论的实际情况来看，“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将会是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

具而言之。首先，大会中与美国华人移民相关的讨论虽仅有三场，但每一场均有非裔美国史学者列席，不管在发言还是提问环节，两方学者都就同一主题进行着现实中的学术对话；其次，关涉华人移民的论题皆以“隔离”（Separation）为中心，而“隔离”一词，肇始于“隔离但平等”的“黑白”种族关系原则，是长久以来非裔美国人研究的核心话语。如今华裔美国史家将“隔离”作为主题，探讨其隔离于“黑白”种族之外的世界，本身便是在不断与非裔美国史学进行对话的过程。

以议题“歧视与隔离的经济因果新探”为例。此议题的设置是为召集擅长数据搜集与处理的经济史家们，向与会者介绍如何获取准确、系统的数据；探讨这些数据如何改变、补充原有的历史叙述。其中，学者丽莎·库克（Lisa D. Cook）通过建立全新的国家私刑（lynching）数据库，指出了“私刑”在“黑白”种族之外的大比例存在。而与“私刑”相似，“隔离”这一曾仅用于描述非裔美国人历史的特殊概念，也被学者伊丽莎白·卢-威廉姆斯（Elizabeth Lew-Williams）引入对唐人街的研究。她认为，与“黑白”种族间的“隔离”不同，针对于华人的隔离更多是借由“公共卫生条例、恐吓、暴力等非正式、法律外”的手段进行，而这造成了 19 世纪最为严重的居住隔离。借助现行的统计手段，威廉姆斯对唐人街地图、测绘记录、人口记录等进行了综合系统的整理，开创性地扩展了原有的“隔离”概念。

与“生”之隔离相对，议题“19 世纪非裔、阿拉伯裔、迦勒底裔、华裔与犹太裔美国人葬仪中的种族与国家身份”探讨了“死”之隔离。此议题汇聚了各个族裔的“死亡”研究者。他（她）们聚焦于墓地之上的“排斥与接纳”（exclusion and inclusion）；探讨了“死亡作业”（death practice）如何受制与制约着生之规则；讲述了墓地“隔离”如何参与进 19 世纪美国种族、族裔、公民身份的建构。其中，学者钟苏方（Sue Fawn Chung）追溯了从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华裔美国人被区隔的丧葬历史，认为美国种族主义的墓地政策与中国传统风俗，共同参与塑造了华人与美国社会的丧葬隔离。与此同时，北美华人“送骨还乡”的风俗也扩展了“隔离”在空间上的概念，使其具有了“远隔重洋”的意涵。

与钟苏方一样，非裔美国史学者卡米·弗莱彻（Kami Fletcher）也注意到了“死亡”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在其题为《黑人葬仪之权与种族化的葬地边界：坟茔之上构建美国人》的论文中，她利用墓地记录和州、县、教区的法律档案为原始材料，一方面论证了“种族”如何被用来建造死者的墓地边界；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墓地边界如何塑造了生者的公民权利。在其看来，“死”之隔离并不仅仅是“生”之隔离的映像，它变化、延展，甚至创造了现实的区隔。

### （三）后记——对博士生参会的几点建议

作为第一次参加美国学术会议的博士，我并没提交论文参会，也并未做过多的准备，好在一直有其他博士从旁提点，因而积累了一些新鲜的经验，在此与大家分享。

一、语言问题。因为美国的学术会议并不提供论文集，所以只能依赖于在现场听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宣讲论文的学术语言与课堂用语、日常用语是不一样的，它更为规范精致、逻辑紧密，所以最好有所准备。比如，在听报告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报告人的学术背景与观点，对其演讲题目做一些思考。但当然，要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平时多听这一类演讲、报告，练习听力的同时，掌握其中的听记技巧。

二、经费问题。主办方提供的酒店往往比较昂贵，即使参加会议的美国同学也是住在附近的民宿。所以确定参会后，可以提前以较为低廉的价格预订周边的宾馆。当然，往返路费也可以通过提前上网预订来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约。

三、档案问题。美国档案广布各州，会议所在地也会有很多待挖掘的档案资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要自行锁定要查找的档案，并设法与档案管理员联系，提前预约，否则很可能没有时间去查探档案。

四、交流问题。作为一个英语并不流利的学生，我深切感受到比语言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问题意识和意愿。在会议中，为了有效地交流，可以提前与熟悉的学者进行预约，也可以针对学者的发言提问，或是报告结束后与报告人聊上几句。以上三个路径，不妨同时进行，拿出一定的精力，一定的耐心，携带着几个有价值的问题，那么交流即会比较顺畅。

（王佳欣，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 变革时代的历史学人： 2018 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侧记

徐 天

2018 年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 AHA) 年会的会场坐落在华府著名的石溪公园之畔, 距白宫不过十分钟车程。1 月 4 日至 7 日, 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研究生、中小学教师、学术出版商、数据库生产商和雇主。三百余场分组讨论中, 美国史的相关话题占到一半; 在研究断限上, 近现代史是绝对的主流。种族、性别、移民、国家构建等领域极受重视, 与本届年会的主题“全球视野下的种族、族裔和民族主义”形成呼应。

年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招聘。在当下的美国, 找教职之难是众所周知的; 本届年会共有 41 个学术岗位招人, 竞争激烈。作为志愿者, 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求职者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培训时, 主办方不点名地调侃了特朗普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敌意, 暗示今年招聘会雪上加霜的现实, 要求志愿者对应聘者加倍耐心。虽然在实际工作中, 我并没有遇上特别紧急的状况, 但还是能感觉到今年西装革履和精致妆容背后独特的紧张情绪。

华盛顿严峻的政治气氛下, 资政建言的尝试在本次会场中随处可见, 奠定了很多讨论的基调。以移民史为例, 虽然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依然自成一体, 移民制度研究和公民权研究却传递出明显的现实关怀。在一个由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组成的讨论中, 研究者将 1880 年代排华运动与针对黑人的“私刑”(Lynching) 相提并论, 强调了二者在规训意图和后果上的可比性; 另外一场关于“国家监控”的主题讨论, 则探讨了一战后联邦调查局针对加勒比黑人移民建立的监视和遣返体系, 以期重新叩问当代移民局政治监控的源流问题。这些研究直接探寻种族暴力和制度暴力的历史脉络, 具有清晰可辨的现实意义。

在 6 号下午的一场讨论中, 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尝试达到了高峰。这是一场“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对话”, 主题是“移民管控及其抗争: 将当下历史化”。组织者请到了三位移民史专家、一位社工、一位移民律师, 以期达到互通有无的效果。事与愿违的是, 讨论每每出现“鸡同鸭讲”



的时刻：活动家旨在动员听众采取更进取的态度和行动，而历史学家始终关注的是“为谁写作”的问题；虽然观众反响热烈，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组织者“将当下历史化”的努力。这次讨论的笔录将出现在今年《美国族裔史季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的同名特刊里，届时很可能引发不同层次的争论。

主办方对当下政治的思考，还鲜明地体现在 5 号晚上的主席演讲中。本届 AHA 主席泰勒·斯托瓦尔（Tyler E. Stovall）生于法国革命保皇派流亡者在俄亥俄州所建的小城加里波利斯（Gallipolis, Ohio），是研究法国现代史、跨国史和黑人大流迁的专家。他的演讲主题是法国大革命至今自由女神像内涵的变迁。他从跨大西洋的共和主义和种族史讲起，强调纽约自由女神像最初的废奴主义背景，谈及十九世纪末这座塑像肇建之时的性别想象；他邀请听众一起思考白人女神像向女性和少数族裔传递的负面信息，又还原历史语境，提出作为移民归化象征的自由女神像其实是 1924 年移民法案出台之后的文化产物。斯托瓦尔的叙述简洁有力，用扎实的历史研究回应了 2017 年的几大社会话题：种族间的敌意，工作环境中的女权，以及日益严苛的移民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复杂影响。

AHA 对少数族裔和性别的关注固然值得提倡，但这种关注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局限。在我们的对谈中，移民史家大卫·格伯（David A. Gerber）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历史研究把黑人和白人作为美国社会的两极而分化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两个群体在美国史上各自的联合，从而严重地简化了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欧裔美国人”的复杂性。很多研究大而化之地谈论“白人性”（whiteness），仿佛“白人性”是欧裔美国人唯一重要的特征。然而，纵观美国历史，我们可以根据移民时间、族裔、宗教、地域、城乡等因素将欧裔美国人分为不同群体，也能看到群体间在权力和财富上的悬殊差距。历史学家对欧裔美国人的内在复杂性缺乏了解，这一点加大了他们在书写美国政治走向时的困难，因为上述各项因素都足以在不同背景的欧裔美国人中间引发迥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向。2016 年大选和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种种现象所引发的反思乃至困惑，恰恰验证了这部分知识的缺失。

关注边缘群体是很多历史学家的共识，但很少有人想到，一旦被剥夺了学术资源，学者也可能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两场关于学术资源如何分配的讨论，让我了解到互联网时代历史学家、特别是独立学者的困境。4 号上午，来自 H-Net 的玛格丽特·德雷西（Margaret E. DeLacy）在一场学术基金会的论坛上尖锐地指出，高校以外的研究者往往最缺乏学术资源，而基金会的代

表们却没有一人提到针对这个群体的资助问题。德雷西的提问引发了我的思考：高质量的研究往往出自高校，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果？

就此，我采访了独立学者、AHA 研究分部负责人贝基·尼古拉德斯(Becky Nicolaides)。居住在洛杉矶的她曾经接受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连续几年的学术支持，但在 2015 年，该校突然剥夺了当地独立学者的数据库权限，很多人的研究被迫中断。2016 年，尼古拉德斯高票当选 AHA 管理层。她发现，许多高校外学者、中小学教师和政府雇员长期面临着类似的困局，而 AHA 至今还没有系统地直面这个问题。她告诉我，虽然前景并不乐观，但在三年的任期内，她将致力于为独立学者发声，推动美国学术资源的再分配。

6 号清晨，我参与了由尼古拉德斯、德雷西、独立学者组织负责人、ProQuest 销售代表、图书馆学学者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员组成的讨论，发现美国学术界内部的落差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来自研究型图书馆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的伯纳德·莱利(Bernard F. Reilly)指出，互联网在美国相对自由的发展模式深刻动摇了图书馆的能动性和开放性，催生了大公司的信息垄断；昂贵的数据库吸干了高校图书馆的巨额预算和有限的 IP 地址，包括校友在内的高校外围研究者往往成为交易过程中的第一批牺牲品。他建议学术共同体与立法者合作，在法律层面上限制信息垄断。ProQuest 的凯文·诺里斯(Kevin Norris)则争辩说，数据库生产商也有苦衷，《纽约时报》一类的出版业巨头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后者将资料数字化视其主要财源，直接导致成本居高不下。这场讨论生动地展现了美国学术资源大幅商品化后的窘境：销售代表和高校管理者大谈资金问题，图书馆学学者强调政治干预的重要性，独立学者则声音微弱、孤掌难鸣。

根据尼古拉德斯所做的调查，独立学者迫切需要的数据库大都非常基础，包括 JSTOR、ProQuest、Project Muse、Hathi Trust 等等；财力充足公共图书馆固然可以提供一部分资源，但美国各地情况差异巨大，因此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整个学界对独立研究加以扶持才能实现。数据库的生产商们标榜学术自由，但他们直白的商业逻辑却将很多优秀的独立学者拒之门外。当代学术研究已经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独立学者对平等权利的追求，揭示的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下知识垄断问题的新动向。

四天的议程，让我看到了美国史学共同体的不同面相：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学者自身的政治诉求和基本权益也具有同等的讨论价值。与专题性的史学会议不同，AHA 年会具有鲜明的行会性质，因此其论题也远远

超出了学术研究本身，涵盖了历史学事业的各个方面。AHA 不断寻求与其他学科、甚至其他行业的对话，这种尝试有其笨拙的一面，但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和社会功能。

20 世纪的美国史上，每一次大变革都会引发历史学界的转向，继而深刻影响美国史学的发展。刚刚过去的 2017 年，美国历史研究和自由主义阵营的权威性都受到惊人的挑战。美国学界将如何应对这场始料未及的激辩？我们有理由对此拭目以待。

（徐天，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候选人）



## 学界动态



## 梁茂信教授入选2017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据2018年1月5日教育部公布的消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茂信教授入选2017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国家重要的高层次人才计划,有效地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也吸引了一批学术上卓有建树的海外优秀学者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

(秘书处供稿)

## 22项“美国研究”课题获得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项目名称	立项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9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财产观以及典型案例研究	郭巧华	杭州师范大学	重点项目
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研究(1945—2017)	肖华锋	湖南师范大学	重点项目
19世纪末至今中美金融关系研究	张红菊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般项目
内战后美国南部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	吴浩	上海大学	一般项目
美国太平洋商业扩张与太平洋国家身份建构研究(1783—1900)	王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一般项目
南部诸州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塑造研究(1865—2000)	王勇	西南大学	一般项目
跨国视野中的旧金山大地震后中国城重建及其影响研究(1882—1915)	伍斌	东北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美国对德国强租胶州湾的因应政策与影响研究(1897—1900)	袁正邦	中山大学	一般项目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美国后工业社会形成研究 (1945—2000)	石光宇	吉林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战后美国对亚非不结盟国家经济政策研究	姚 昱	华东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20 世纪美国消费“绿色转型”及其规律研究	刘凤环	济南大学	一般项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文化战争研究	江振春	南京审计大学	一般项目
“一带一路”新兴战略支点城市发展路径研究	苏 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一般项目
美国财税改革对美在华高科技企业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	一般项目
早期美国的“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建构研究 (1763—1870)	邵 声	中共中央党校	青年项目
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奴隶制政治演变研究 (1789—1860)	杜 华	武汉大学	青年项目
美国“政党机器”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研究 (1865—1920)	王 禹	四川大学	青年项目
文化冷战与美国对外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战政策研究	白玉平	东北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冷战时期美苏在拉丁美洲的竞争与妥协研究	贺 喜	暨南大学	青年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史学”研究	于留振	重庆大学	青年项目
大西洋贸易与英属新英格兰经济商业化进程研究	王伟宏	西南大学	西部项目
美国军事公共外交机制及启示研究	辛 昕	空军工程大学	西部项目

(江西师范大学团队编辑整理)



##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纪要

**编者按：**2018 年上半年，复旦大学举办了两场美国史读书会，主题分别是“革命后的美国人失去了哪些自由”和“从制度主义路径探索美国革命的起源”，多位硕、博士研究生就《我们失去的自由》（*The Freedoms We Lost: Consent and Resistanc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和《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两书展开讨论，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做了点评与小结。

### （一）革命后的美国人失去了哪些自由

#### 本期书目

书名：*The Freedoms We Lost: Consent and Resistanc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作者：Barbara Clark Smith

出版社：New York: The New Press

出版时间：2010

《我们失去的自由》（*The Freedoms We Lost: Consent and Resistanc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是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Clark Smith）的第一部专著，挑战了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关于“自由”的传统叙事，讲述了美国革命前后普通民众在自由的观念和实践方面的巨大转变，并对美国革命时期精英与民众关系做了独到的诠释，深化了对美国早期“自由”问题的思考。

时间：2018 年 3 月 28 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907 室

主持人：夏刘锋

## 1. 本书作者

芭芭拉·克拉克·史密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政治史部馆员，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18 世纪美国政治史、社会史。

## 2. 各抒己见

夏刘锋（复旦大学博士生）：

这次我们阅读的书目是芭芭拉·史密斯的《我们失去的自由》，我想先从美国革命叙事的范式转换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对本书谈谈看法，然后请大家畅所欲言，发表高见。

从美国革命是否引起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变化的角度来讲，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蒂莫西·布林（Timothy H. Breen）等学者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个体，革命只是完成了反对英帝国的使命，因此革命只是在捍卫他们早已存在的个人自由。但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等史家却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在革命前是不自由的，不同阶层的群体在社会关系上存在明显的依附和顺从关系。随着革命的爆发，美利坚人迎来了一个共和主义时刻（A Republican Moment），进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换言之，美国革命引发了美利坚人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与上述两种主流美国革命叙事不同，芭芭拉·史密斯在《我们失去的自由》一书中提出了惊人的论断。虽然她并不否认美国革命为普通白人男性公民带来以选举权为中心的公民个人自由，但她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普通的白人男性公民（即普通民众）在革命结束时却失去了他们更为珍贵的、自主参与公共政治的传统自由。显然史密斯在这里所讲的自由并非路易·哈茨等学者所强调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而是作为英帝国臣民所享有的自主参与地方公共政治的传统自由。具体来讲，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普通民众有对法律在事后（After the Fact）表达同意的权利，他们可以诉诸陪审团、集体行动等直接的、自主参与公共政治的方式来挑战、纠正乃至废止与公共福祉相违背的法令。在革命初期，普通民众更是将上述传统自由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通过地方协会、社区等社会传统机制，惩戒或驱逐英帝国官员和效忠派，管控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价格，支持并执行纸币政策，在一系列公共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而言之，在革命初期，爱国精英认可并支持普通民众所享有的上述传统自由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整套社会价值观念，因此精英与民众形成了一个反抗英国的强大爱国联盟。但是到革命后期，爱国联盟开始逐渐走向分裂，许多爱国精英开始质疑甚至阻挠爱国民众自主参与公共政治的自由，重新界定爱国主义内涵和革命目标，转而制定并执行一系列有利于富人精英的法令与政策。因此，在史密斯看来，相较于以选举权为中心的公民个人自由，到革命结束时普通民众已经失去了自主参与地方公共政治这一更为重要的传统自由。

另外，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来讲，史密斯综合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吸收了 E. P. 汤普森 (Edward P. Thompson)、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等人的理论和方法，借鉴了新进步主义史家爱德华·康特里曼 (Edward Countryman)、加里·纳什 (Gary B. Nash)、阿尔弗雷德·扬 (Alfred F. Young) 等史家自下而上的民众主义研究视角。她的作品与特里·布顿 (Terry Bouton)、伍迪·霍尔顿 (Woody Holton)、艾伦·泰勒 (Alen Taylor) 等人的作品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新进步主义史家的民众主义研究通常是从经济维度来切入的。而史密斯却另辟蹊径，她转而从以“neighboring”为中心的社会机制、社会价值观念的维度研究普通民众自主参与政治的传统自由，并赋予它重要的意义，这为理解美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然，该书也存在明显缺点，首先史密斯革命叙事的主角局限于自由的白人成年男性，几乎没有涉及妇女、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等群体。从空间上来讲，叙事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各州，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很少涉及中部和南部地区。

#### 王仲达（复旦大学博士生）：

夏刘锋同学刚才对于本书的主要内容介绍得很全面，我想补充谈几点感想。首先我很感佩于芭芭拉·史密斯在美国革命史诠释上的创新性。美国革命史的历史叙事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革命史的写作经过这么多代的范式转换，还能够在众多经典的著作之外另辟蹊径，常讲常新，可见这一主题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史密斯的优点在于她能动用学术史脉络上可以利用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跨学科的方法构建自己的框架和叙事，比如乔治·鲁德、格尔茨的理论，当然，这也是美国学者研究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她的研究虽然在范式上带有民众主义史家的特点，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以往民众主义史家著作中史料相对分散单薄是一个备受诟病的问题，但我觉得本书在

史料层面还是相当充实的。她能够把这样一个相当激进和修正性的诠释框架通过史料组织达到自圆其说、论证完整的效果，也足见功力。但是该书的缺点也相当明显，比如她在材料和论述上主要集中于东北部的的新英格兰地区，带有很强烈的新英格兰中心论色彩，而且她与许多民众主义史家都在写作上有一个共性问题，即存在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将普通民众的政治行动道德化、合理化。不过，挑起争议，语出惊人，正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瑕不掩瑜，这仍是一部值得讨论的优秀著作。

### 孟凡（复旦大学硕士生）：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冲击，在于作者对美国革命历史过程的独特思考。我们以前普遍认为，作为现代“政治”的起点时刻，美国革命带给美利坚公民根本性的政治权利、全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更完善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总之，它摧毁了外在的压制性的政治结构，促使被动态的臣民转变为现代意义上具有自律性的政治行为主体——公民，进而赋予或者重新确认了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更多个人自由。即使是对美国立宪颇多微词的民众主义史家，似乎也不敢否认臣民向公民的身份转化过程中所内蕴的进步意义。然而史密斯却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问题：美国革命后的合众国公民真的比英帝国治下的臣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吗？

从这一问题出发，史密斯开始比较革命前后为民众真切享受的自由的变化的变化。她认为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居民的自由有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第一个就是作为英王臣民的自由；第二个是在地方社区内部投票和选举的自由；第三个则是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表达“事后”意见的自由。然而比照革命前的自由状况，1780年代公民虽然享有更多事前（Before hand）表达同意的权利，却被迫放弃了事后表达意见的权利。在众多歌颂“民族诞生”和“政治独立”的宏大交响乐中，史密斯出人意表地奏响了一曲哀悼自由失落的缱绻挽歌。虽然她在史料的甄选和论证的方式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独特的思考方式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

另外，这本书也引发了我对历史写作的一点想法。我们在关注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时候，不断在给历史做加法，更喜欢关注那些从无到有的新观念、新权利、新价值、新制度……然而却很少关注那些在历史演进中已然消失的东西。在全然进化论的视野中，“消失”行为本身便足以判定其存在的不合理与不合法。但是，当我们用固定的标准和价值去测量流质化的历史本相时，可能会发现，史迹的更迭并未完全消耗和转化掉既存事实，即创造性转化并

非历史发展的单一样态。寻绎那些并未被历史发展整合、吸收而遗失的价值、思想与实践，或许能促使我们重新检视那些看似熟悉的史事，寻访一些因与现代历史思维相牴牾而被抛弃的“失踪者”，进而培养自己鲜明而更贴近历史本相的问题意识，扩展新的、更富活力的知识视野。

**王仲达（复旦大学博士生）：**

刚才说到的“neighboring”，可以译为“友邻”，这倒是引起了我一些发散式的想法。在中国的互联网文化中，“豆瓣”的模式更像一个去中心化的早期殖民地社区，用户根据相近的价值理念结成小组，共同行动，成员地位平等，声气相通；而微博更像是一个后来的联邦，用户围绕在有巨大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周围，精英色彩浓厚。所以我想这种相对松散、去中心的交互方式是不是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偏爱它的一个原因。

**林斌（复旦大学博士生）：**

我认为史密斯最核心的论辩即是对过去作为英国臣民的普通民众实际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追忆，这也是全书的主旨：“失去的自由”。自由之所以失去，在于“合法的”“体制性”的公权力的集中。革命之后，组织严密的政府和看似合理的制度化建设并不能保护人民原初的自主参与政治的权利。史密斯试图描绘出正式的、合法的政治社会出现之前公众参与法律执行、解释的历史画面，人民对政府运行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也是她所理解的传统自由。体系化、结构化的选举并不是万能的，而使得传统自由的核心成分丢失了。她在慨叹，也是回想。

### 3. 学者点评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史密斯对精英与普通民众关系的研究做了一些更为语境化的修正。例如，波琳·梅尔在《从抵抗到革命》一书中，就把精英和民众对立起来，称普通民众在革命中步子迈得太快，而精英领导人则力图遏制这种势头。但史密斯认为，精英和民众在革命前期存在一种合作的关系，只是在1776年革命局势发展后，两者的关系才发生了变化，导致两者的联盟走向解体。这并不是简单地指责精英背叛了民众。可见，她对革命时期精英与民众的关系的看法更加中性。

本书的标题（*The Freedoms We Lost*）很可能借鉴了彼得·拉斯莱特的《我们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一书，只是把完成时变成了过去

式。用这样的标题，就是要把过去陌生化，或者说去熟悉化。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历史写作技巧，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Freedom”的概念问题，史密斯的理解可以说是比较注重语境，关注民众通过协同合作而形成的政治参与和自主行动的权利。显然，不同时代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革命以前，体制性的权力相对弱小，执法人员缺乏相应的强制力，民众可通过共同体和合作等地方机制拥有“事后的”法律执行权。对于殖民地时期的民众来说，自主行动的权利或许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对权利的界定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当前美国社会特别强调和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比如有人选择不结婚，有人选择同性恋，这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我们如果以这种权利定义去理解过去的自由，就会产生偏差。革命之前有革命之前的自由，革命以后自由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不能把这些变化简单地说成是自由的丧失。因此，史密斯在书中哀叹传统自由的丧失，似乎带有太多的主观情感。

第二，殖民地时期是岛屿式社会，人口少，居民分散，政府的强制力很小，官员没有能力做的事，就要靠民众去做。英国直到1829年才有正式的警察，美国有警察制度，更是19世纪50、60年代的事了。于是，殖民地时期执行法律，只能依靠执行者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这就给民众自主执法留下了余地。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看成是自由的应有之义。

第三，究竟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打破一切原有的体制和秩序，并且使这种行动自动地合法化。史密斯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她所提到“失去的自由”，许多是基于1776年前后非常的革命状态而出现的，如果将它们当作历史的常态来理解，就会带来“时代错置”的问题。

第四，在史料运用方面，按理说史密斯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馆员，收集史料应该不是问题，但多处材料却是转引的。我们在中国做研究，转引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转引是有风险的，容易曲解材料的原意，所以要尽量避免转引。

最后，本书的讨论还触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宪政体制下人民是否还有继续革命的权利。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如何通过论题的相关性上下拓展，吸纳各种资源展开讨论。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复旦大学博士生夏刘锋、王仲达整理编辑）

## （二）从制度主义路径探索美国革命的起源

### 本期书目

书名: *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作者: Jack P. Greene

出版社: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 2011

《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是格林教授五十余年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本书主要以英帝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法律关系为线索，在大西洋视野下探索美国革命最终爆发的制度起源。在序言中，格林表达了对当前美国革命史研究的不满，认为学者们对法律、制度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也是他早先著作《边缘与中心》的延续，重新讲述帝国联邦主义的宪制冲突，描绘了革命爆发前殖民地人的法律观念世界。

时间: 2018 年 4 月 25 日

地点: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907 室

主持人: 林斌

### 1. 本书作者

杰克·格林（Jack P. Greene），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北美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和大西洋史的研究。

### 2. 各抒己见

林斌（复旦大学博士生）：

我认为这本书是杰克·格林个人对美国革命史的综合评价。格林从他 20 世纪 50 年代的博士论文开始，到 60 年代发表《追逐权力》（*The Quest for Power*），再到 80 年代，终于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边缘与中心》（*Peripheries and Center*）。这本书其实就是三十年之后，格林对美国革命的起源进行的再

阐释。他在探寻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导致了美国革命。格林不满贝林、伍德等学者用意识形态范式来解释美国革命的起源。他认为在制度以及在政治体系上，辉格派的意识形态不能构成美国革命爆发的充足理由。格林将美国革命置于帝国体系中，梳理了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法律关系。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格林展开了新的叙事。

《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的价值即在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告诉我们，在革命爆发时期，法律并不只是主权者的意志。在英国人看来，英国议会是至上的、最高的，能够为殖民地立法。但是殖民地一方却不认可这样的法律观念。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英国人并没有为殖民地的内部事务立法。这样的政治实践就确立了重要的传统：伦敦政府需要非常审慎地对待殖民地，不能干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他们的立法权只能局限在外部事务，如贸易和经济往来，战争与和平。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英国人并没有去触碰。这里就涉及到核心的法律观念，格林充分消化吸收了里德（John Philip Reid）等诸多法律学者的研究。他在其他的相关论文专著中也一直强调法律的权威是在英国人和殖民地的交往、协商过程确立的。只有在人们实际承认法律权威的条件下，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就是说法律的合法性、正当性并不是建立在英国议会或国王的自我宣称上。

假设一种情况，英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但是如果殖民地居民没有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同意这项法令，没有认可英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权威，那么英国议会单方面的立法就是非法的，仅仅是命令和专断意志，在殖民地居民那里没有实际的效用。关键在于早期英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远距离控制殖民地，中心的权威相当有限。北美殖民地主要依靠各自的立法机构，进行社会管理。

这样就存在两种宪法。第一种宪法即英国统治集团的宪法，他们认为自己建立了议会主权。光荣革命之后，议会至上逐渐成为政治信条，英帝国范围内都需要服从议会法令。但是这种绝对的议会至上在殖民地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承认，仅仅是英国统治集团的认知。18世纪开始英国政府想要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但却遭到不断的抵抗和反对。从印花税法危机开始，英国统治者所认为的议会至上更多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想。英国议会的最高、至上仅是纸面上和名义上的，没有在殖民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而且在英国人和殖民地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也有意拒绝激进地改变帝国宪政关系，不愿直接干涉殖民地内部事务。他们知道这样的行动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英国人



的实际行动也验证了殖民地人士对帝国法律关系的理解，即实用和习俗是宪法的基础。

第二种宪法即各个殖民地自己的议会掌握内部事务的全部立法权、征税权。他们承认英国议会在某些领域拥有立法权，殖民地居民必须服从。但立法权仅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英国人立法权的扩大需要获得殖民地居民的同意，不能单方面行动。这样 1765 年之后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向殖民地征税等一系列措施，就迫使殖民地居民彻底思考英国与殖民地的法律关系。在殖民地居民看来，是英国人破坏了联邦制的帝国体系。格林就认为殖民地的法律论辩是合理的。英国议会宣称的征税权仅仅是权力的意见，是专断的。而英国宪制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英国人的自由一向为殖民地居民称赞，引以为豪。这样的两种宪法就构成了认知上的矛盾，革命也因此爆发。

格林还认为日常实践中英帝国与各殖民地的法律关系是第三种宪法，即帝国宪法。总体而言，格林要求我们关注英国和殖民地关系的演变过程。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这样的观念放在十八世纪的北美是一种时代错乱。当中心的英国议会与边缘的北美殖民地发生宪政冲突时，中心的观点未必就是正确的，边缘也有其反对理由。格林的著作中强调得比较多的就是“协商”，即协商性的权威，帝国和殖民地之间不是单方面的命令式交往，强制性的或压迫性的，而需要在双方妥协和退让中确定权威的合法性。

### 蔡梦竹（复旦大学博士生）：

这本书最明晰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挑战了之前意识形态学派的解释路径。格林认为前辈的学者们过分放大了国家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这些后出的概念对于解释美国革命的缘起的意义，进而遮蔽了在当时的语境中真正值得探究的因素。基于类似的立场，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查尔斯·道格拉斯·克拉克（Jonathan Charles Douglas Clark）曾在《自由的话语 1660—1832》（*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中把宗教视为看待美国革命的核心棱镜之一，引起了学界广泛的争论。回到这本书中，格林向我们呈现了宪法在当时的语境下存在的三个向度：分别是殖民地法（Colonial Law）、中心法（Metropolitan Law）和帝国法（Imperial Law）。彼时，“王在议会”是主权的载体及象征，拥有可以介入殖民地事务的合法权威。然而，殖民地认为地方事务必须交由殖民地议会自己处理。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其实也就是地方法

和中心法的冲突。在这两种观念的分庭抗礼中，殖民地和母国争夺着关于帝国法的解释权，从而点燃了革命的火把。

**林斌（复旦大学博士生）：**

我觉得格林不是否定这些意识形态对革命的影响，而是要追本溯源，找到哪些因素是最根本的，占的权重最大。格林梳理的是骨架类的东西，格林不满的是大家都在谈论意识形态和辉格派的反抗理论，但是实际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忘了。从殖民地的建立到美国革命爆发，英国人的宪政观念和殖民地的法律传统，英国人与殖民地的实际交往，这些在人们热衷于意识形态讨论的过程中丢失了。他抗议的就是这个，我们需要回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权力分配、殖民地的地位，这些是比较实在的制度、机构性的问题。

**夏刘锋（复旦大学博士生）：**

格林不是要完全否定贝林的意识形态的范式，这一用来阐释美国革命起因的经典理论。格林是从法律史，从整个英帝国的框架内，来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这个角度应该是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解释方法，这是他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格林所提到的帝国宪法的多元性，就是刚才说的三种宪法。大西洋两岸对法律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和冲突，产生了争论。在格林看来，这是美国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中心与边缘，也就是殖民地与伦敦，对权威在整个英帝国范围内如何分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持续几十年的争论，有着不同的看法，又产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美国革命的爆发。格林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美国革命的起因，但他在结语的部分提出了具有延展性的问题：关于革命的遗产。权威在帝国范围内如何分配，并没有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结束，美国革命并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应对办法。这个问题一直处于非常模糊的状态。格林把随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纷争与殖民地同英国的冲突做了类比，也是一个权力和权威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在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这样的争论持续不断。

而且，英国的立法权至上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有一个时间节点。书里面一直提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之后立法权产生了很多变化。一个就是权力的地方化，再一个就是议会机制的发展。不仅仅在伦敦，在殖民地也迎来了快速的发展，比如代表制和议会下院的兴起。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格林针对的是意识形态的解释路径。他认为，不是因为当时人怎么想，觉得如何，就有了革命。制度是关键。由于制度的不同，形成了两套体系，这两套体系发生了碰撞，到最后不可调和，就分道扬镳了。格林讲的是这个事，而不是意识形态话语。并不是说，殖民地人来北美追求自由，争取繁荣，不想让伦敦来压迫自己，于是就造反了。他讲的不是这个，重点不在这里。

**王仲达（复旦大学博士生）：**

格林论述的美国革命到 1776 年就戛然而止，后面的事就不写了，也不写制宪这些东西，这些是美国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似乎在他的革命史叙事中，从英国独立出来，革命就成功了。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是因为格林这本书只讲起源，讲起源就不会往下说，再讲就越界了。贝林的书也是这样，也没往下写。1992 年他加了一个增订版，讲了制宪的事。这是由于他编了一个制宪的论文集，觉得制宪时期讨论的话题和 1776 年以前的话语有连续性，于是就在增订版中补充这些内容。讲起源的书大体都是这样。

**林煜堃（复旦大学硕士生）：**

就我个人而言，本书从制度和事件层面上的论证是十分有说服力的，例如有关权威的分配、法律上的认知、以及英国殖民扩张中所遭遇到的难题等方面的讨论。但是，有关双方如何理解宪法内涵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地方令我感到迷惑。作者认为，殖民地之所以最终会从母国独立，是因为双方对同一套宪法有着不同的认知。但其实在更多情况下，主要是殖民地居民一方不断增加、补充对于宪法内涵的理解，而不是宗主国一方。那么这是由于宪法本身是不成文的宪法所导致的，还是这种做法是一个举世皆然的普遍现象？母国通过不断地加强政治管理和政策转变，在殖民地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验，然后将之运用到法律条文和政治实践中。那么，这些单方面的经验总结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这是否造成了所谓的双方的分歧？

**林斌（复旦大学博士生）：**

有一篇论文《不成文法的起源》（“Origins of the Unwritten Law”），讲的就是这个。英国的宪法、根本法不像美国后来那样，是成文的，条条框框列举出来。它更多是一种习俗、习惯，人们的认知，对权威的认可。这就获得了一种法律权威性的意义。格林在全书和其他一系列论文中所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各种权力关系，权威之间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充满张力和冲突，具有模糊性。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摆在那里，大家都认可。英国议会也好，国王也好，都不能以单方面的意见来决定所有事务。你说议会至上，然后大家就认可和同意，这违背了当时通常的宪政实践。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承认、接受你的权威，你的权威才有正当性。这是格林所强调的两种宪政观念的冲突。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格林在这本书里用了四个词，一个是 Constitution，一个是 Law，一个是 Polity，一个是 Government，这四个概念在格林的论述系统当中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指的是什么？相互的关系又是什么？他还用了 Extended Polity 这样的提法。这四个词是关键词，不理解这些概念，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林斌（复旦大学博士生）：**

他用得最多的就是 Extended Republic，即英国的法律、宪政体系怎样向外延伸。殖民地人士援引英国人的权利、法律观念，以争得英国人的身份和权利。但英国议会、伦敦政府仍把他们视为下属，他们需要服从英国权威，是低一等级或野蛮人。这构成了一种认知上的冲突。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四个概念有联系，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有区别。格林用的 Constitution，侧重的是权力结构以及政治运作的惯例和方式。权力结构就是权力在政府内部怎么分配，哪一个分支行使什么样的权力，不同的分支及其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最高权力掌握在谁手里，最高权力又用什么方式来行使，用什么方式行使才是合乎常规的，才是合乎正义的，才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套东西就是 Constitution。可见，格林讲的 Constitution，不是我们后来理解的成文宪法，也不是当时人讲的政府的构成，而是把当时人对 Constitution 的理

解和后人对成文宪法至高性的理解糅合在一起。那么 Law 是什么？Law 就是权力行使的方式，就是通过制定法的形式来体现主权者的意志。所以说 Law 是主权意志的体现，是 Constitution 在实践层面上的标志。Polity 强调的是宪政层面的权力结构，所以我们一般把 Polity 理解为政体，即政府的构成。各个分支如何组成，掌握什么样的权力，不同分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也是 Constitution 的一部分，对应的是其中的权力结构。再就是 Government。它是具体运作的 Polity，就是 Polity in Practice。什么人掌握什么权力，在实际中怎样运用权力，以达到保护居民和维护秩序的目的。这就是 Government。格林在用这一组概念时，相互之间是有交叉的。有时他从 Law 的角度讲，实际上也是在谈 Constitution；有时讨论的是 Government，实际上指的也是 Constitution。

### 3. 小结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大家不妨想一想美国早期史的几大学派，想一想关于革命的起源有哪几种解释路径。帝国学派倾向于认为，殖民地的独立是英帝国管理体制上的失败，是帝国官员不能理解北美的变化，伦敦的举措失当最终导致殖民地与母国分离。这是从帝国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派则强调，英帝国对殖民地实行了严厉的控制和压迫，在政治上把殖民地人视作二等臣民，在经济上实行各种管束，推行《海上贸易条例》《炼铁条例》之类，限制殖民地的发展，这样就引起了殖民地人的不满，于是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意识形态的解释路径有很多分支。贝林等人的共和主义解释是一个分支，另外还有洛克式的解释，对天主教的恐惧，对伟大帝国的向往等等，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革命的起源。另外还有民众主义的解释。这一派学者关注殖民地的普通民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来自帝国权威，而且更直接地来自本地的权威和上层阶级。因此，是殖民地内部的冲突导致他们起来造反；帝国危机只是契机，加速了内部矛盾的爆发。

那么，格林的研究可以归到哪个路径上？他关注的是中心和边缘的互动，是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从宪政理念、宪政实践或宪政理想的分歧来看革命的起源。看来大致可以把他放到帝国学派里面，只不过是新帝国学派。贝林他们强调的是革命者内心的想法，是期待、恐惧、焦虑促使他们起来造反。格林则从制度方面来挖掘革命的起源，也可以说是制度主义路径。

通过这种学术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格林的研究处在什么样的脉络里。格林最大的抱怨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不讲制度，不说宪政，都在讲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不对的。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给约翰·菲利普·里德（John Philip Reid）打抱不平。他甚至觉得史学界的整个研究路子都走偏了，历史学家应该向法学家学习。

可是，为什么制度主义路径会被人忽视呢？这是因为社会史、文化史兴起后，大家对制度史不感兴趣了。这样我们就要把这本书放到更大的学术语境中看待。格林显然是个老派学者，他要对抗时流。他想要强调，自己做这个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几十年学术生涯心血的结晶。他为什么那么抬高里德，是因为里德支持了他的论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思路最早是他提出来的，里德则做了发挥和阐释。

通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就知道这本书在美国革命的学术史中处在什么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读书之法。功夫在诗外，要读好一本书，视野要尽可能开扩一点。

究竟如何看待格林的研究路径呢？格林强调帝国从建立开始就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后来征税作为导火索，引发关于立法权的激烈争论。帝国体制中的权力运作方式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帝国解体。显然，从宪政的角度来考察革命的起源，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思路。殖民地脱离母国独立，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在当时的大西洋世界，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根由肯定不是单一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路径来解释它的由来。从宪政的路径来解释，是很有意义的。格林的这本书确实是他多年研究的总结，他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归拢在一起，用非常清晰的语言讲出来，让人容易看明白。

但是，从任何单一的路径来解释美国革命的起源，总难免有局限性。比如，在社会政治史家看来，美国革命是两场事变，第一场是帝国解体，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新国家；第二场是殖民地内部重新分配权力，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这个命题最早是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提出来的。后来民众主义史家发展了这种二元革命论，而且更加强调内部的革命。于是，革命的起源主要在于殖民地社会内部的强烈分化，是不同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借帝国危机这个契机而全面爆发了。从民众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主义路径也好，宪政解释也好，都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牵涉的是高层政治方面的问题。Constitution, Polity, Government，这些都是和统治者相关的，都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事情。他们或是掌握帝国的权力，或是掌握地方的权力，总之都

是政治精英，都属于权势集团。只有这些人才会考虑宪政体制的运行问题，才会关心谁有权力来立法。普通民众关心的是职业问题，是平等问题，是经济收入和生活安全的问题。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宪政争端就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林的路径不仅带有老派学者的色彩，而且还有精英主义的内涵。他忽略了民众。民众为什么会加入到革命运动当中来？有的学者讲，对美国革命来说，最重要的日子不是1776年7月4日，而是1775年4月19日。殖民地的独立是民众用实际行动来宣布的，而不是杰斐逊用鹅毛笔来宣布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起来行动？是谁号召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意识形态话语还是有作用的。殖民地人的有效宣传不是讲宪政冲突，而是说自由受到了威胁，这就是“权利话语”（Rights Discourse）。这种话语有动员力，普通民众容易听进去。可见，制度主义路径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格林很推崇里德的研究。里德的书我也看过不少，感觉他那种使用材料的方法是很幼稚的。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史学功力，就大量罗列材料，似乎引得多，每一句话都有来历，就有了学问。做学问关键不是罗列材料，而是对材料的解读。里德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主义路径，有机械论的味道。在里德的书里基本上没有人，无论制度也好，观念也好，就像是机器，上了发条，自己在那儿转。这不是历史。不过，看里德的书，能够从中获得很多资料的线索，也能引出不少想法。因此，里德的书尽管无趣，还是值得一读的。

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能简单地采信某一本书的说法，而是要博采众长。但是，博采众长，又不能面面俱到，还是要突出特色。我多年来专注于美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状态，但我并不否认制度主义和宪政冲突的意义。可是，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一本书里，那就毫无意义了。做研究，要力争在某一方面、在某一点上增加人们理解的维度。面面俱到，没有漏洞，让谁也无法挑剔你，那是想也不要想的。

（复旦大学博士生林斌、王仲达整理编辑）

##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应邀赴上海大学做学术讲座

2018 年 4 月 12 日下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立新应邀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文学院 306 室做了一场题为《美国对东亚的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成功与失败: 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主持, 来自世界史、国际关系等专业的众多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王立新教授的讲解以“自由主义大战略”为切入点,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 王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含义以及该战略是如何提出并实施的; 其次, 王教授重点阐述了二战前美国对日本所实行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政策及其走向失败的前因后果, 并分析了美国在二战后转变原有策略改为对日本实行现实主义大战略并获得成功的缘由。

王立新教授通过对日本情况的考察研究, 引入对美国在各个时期对华政策的分析。在此部分, 王教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应地缘政治和自由市场等因素的需要, 对华政策从现实主义战略逐渐转向自由主义战略; 自由主义大战略最终目标是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王教授还指出, 随着美国精英人士对自由主义大战略在中国实施效果的认识、中美在一些领域的摩擦与冲突日益加剧和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民主的退潮等, 美国对中国的策略又从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大战略。关于在现实主义大战略下, 美国将采取何种对华政策的问题, 王教授指出, 从当前中美之间在多领域内的相互合作、紧密联系的现状来看, 美国更可能采取制衡中国的策略, 而非重演冷战。在本次讲座的最后部分, 王立新教授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分析了中日与美关系的异同之处、美国战略转变对中国的影响, 同时对美国究竟追求何种国家目标, 中美能否和平共处等问题也做了深入探讨。

在讲座结束之际, 张勇安教授对本场讲座做了深刻的总结并再次感谢了王教授的精彩讲解, 王立新教授也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良好的互动, 对大家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和论述, 其新颖的研究视角, 给在场的学生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最后, 此次学术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时秀供稿)



## 世界史与比较文明： 世界人文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

2018年4月16日，世界人文学术会议暨第一次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下午，世界人文学术会议第四学术工作坊专题学术研讨会于厦门大学颂恩楼1603室如期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蒲慕州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梁茂信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韩宇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许二斌教授四位嘉宾围绕“World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这一主题，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会议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李莉副教授主持，历史系胡锦涛教授、外文学院马晴虹副教授以及多位研究生出席会议。

蒲慕州教授的报告题目为“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Comparative Study”。蒲教授首先回答了为什么要做比较研究的问题。蒲教授认为，比较思维是获取知识的基础，通过比较研究，可以从其他文化中获取解决旧问题的新思维。关于比较研究的对象，蒲教授指出，研究者首先要选出一个对自己有意义主题，这个主题最好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这个重要意义最好是跨文化的。接着蒲教授又介绍了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包括比较研究方法和综合性比较研究方法。最后，蒲教授以布鲁斯·特里格的 Bruce Trigger: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为例，讲解了如何具体地进行比较研究。

梁茂信教授的报告题目为“The Dilemma of Gun Control and Its Origins in U.S. Political System”。梁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控枪政策困境产生的四个重要原因：宪法条款中的死扣与表现、有限空间内的国会两党博弈、个人主义的司法解释、一体多元化的各州管理与黑市泛滥。进而梁教授认为，严格控枪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反对上层社会的政策，上升到美国的政治制度上，它是多数人的权利，少数人必然付出的代价，美国枪支问题上的困境实际上是其民主制度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其政治制度悖论的最高表现。

韩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Snowbelt and Sunbelt: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U.S. Econom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韩宇教授提出了二战之后美国区域经济变动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一，冰雪带的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是否实现复兴需要更为系统深入的考察，不应轻易下结论。其二，全球化对冰雪带而言是双刃剑，以往研究强调的是国际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其积极

作用不容忽视。其三，美国南部发生了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型，州政府的产业招募活动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许二斌教授的报告题目为“The Business of Mercenary in 1677-1815 Hesse-Cassel”。许教授分别就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的历史背景、形成条件和发展过程，雇佣兵的招募和输出，雇佣兵输出对黑森-卡塞尔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解读。许教授认为，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一段时期，雇佣兵上升为欧洲最主要的军队类型，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事业在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政策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其实行强制性民兵和志愿性正规军（常备军）相结合的军事制度，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坚持只向新教国家提供雇佣兵的原则，并最终对黑森-卡塞尔的中央集权政治改革、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税收水平、社会福利、人口死亡率及就业选择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会后讨论时间里，各位老师分别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气氛热烈，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王立柱、赵静彬供稿）

##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做客厦门大学历史系

4月17日下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茂信教授做客厦门大学历史系，为历史系师生做了题为《无望的困局——美国控枪政策的困境与制度性因素》的学术讲座。

梁茂信教授从宪法条款中的死扣与表现、有限空间内的国会两党博弈、个人主义的司法解释、一体多元化的各州管理与黑市泛滥、多数人的权利少数人的代价五个方面，阐释了美国控枪政策的困境与制度性因素。

梁茂信教授认为，美国控枪难首先源于宪法条款中的死扣。宪法是美国独立革命的产物及其政治价值观的最高体现。其中，持有枪支与公民的其他自由权利，构成了美国宪法的重要内容，深深镶嵌在美国的宪法条款中。如果要在美国取缔枪支，就必须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来废除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但是宪法中还有8条同枪支权利密切相关的其他条款，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做无异于新造一部美国宪法，在美国显然是不现实的。

国会两党的政治博弈也是控枪政策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自建国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 10 多项管制枪支的立法。各项立法均承认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中关于公民持枪权的条款，国会只在生产和流通方面进行管理。但民主党主张加强对枪支的管理，共和党主张放宽对枪支的管理，两党在国会的不断博弈是控枪政策难以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

梁茂信教授进一步指出，个人持枪权利至上的法律解释也是控枪困境产生的原因之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对联邦宪法的最终解释权。由于对宪法文本的不同理解，关于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中持枪的权利属于个人还是集体，一直存有争论。2008 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的判决支持持枪的权利属于个人。2010 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McDonald v. Chicago*）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各州公民享有贮藏和携带枪支的权利，极大地冲击了各州的控枪政策，进一步增加了美国政府和社会控制枪支的难度。

一体多元化的管理与黑市泛滥也是造成控枪难题的重要原因。在联邦二元体制下，州享有部分国家主权，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可以独立制定政策，这也就形成了枪支的多元化管理。在与联邦枪支法律的一致性、枪支管理的宽严程度上，各州都有很大的不同。各州管理的差异往往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加上黑市泛滥，严重阻碍了政府对枪支的管控。

梁茂信教授最后讲道，枪民的阶层分布与美国政治经济资源分配格局中的阶层分布是一致的，因而枪支政治与政策服务的对象，也与其他领域涉及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格局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控枪政策的本质，就是为了维护上层和富有人口的利益。因此，严格控枪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反对上层社会的政策，上升到美国的政治制度上，它是多数人的权利，少数人必然付出的代价。美国枪支问题上的困境实际上是其民主制度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其政治制度悖论的最高表现。

讲座结束后，梁茂信教授还与同学们进行了亲切互动，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予以详细解答。整场讲座，气氛热烈，掌声不断，高潮迭起。

（王立柱供稿）

## 张杨教授、张勇安教授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学

2018 年 5 月 16 日下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张杨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联袂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学,分别从“知识分子与冷战”和“毒品宣传与冷战”两个角度,呈现冷战史研究的新视野。讲座由历史学系顾云深教授主持。

张杨教授在题为《为学术自由还是为“自由”而学术:“冷战共识”下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徘徊与选择》的讲座中,从新发现的费正清批评欧洲汉学领域存在“冷战”的档案谈起,进而引入了在冷战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学术关切与社会责任的主题。

在“冷战共识”的背景下,作为学术伦理一环的“自由”成为冷战宣传的主流话语,与之相对的“共产主义”则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面。面临冷战这一新形势,为保证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先,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杜鲁门政府最终决定资助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于是,“基尔戈-马格努森系列提案”引发美国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激烈争论:政府资助科学研究是否会扩大政府的权力?是否会影响到学术自由?社会科学家自身如何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也困扰着知识分子本身。借助汉斯·摩根森的理论,张杨教授提出了试图影响当权者决策的“知识分子的四分法”,即直接进入政府机构的“屈从者”、提供专家建议的知识分子、预言式的反抗者以及退回象牙塔的知识分子。通过剖析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主席悉尼·胡克与爱因斯坦之争,“巴兰事件”,施坚雅、费正清和诺斯若普等知识分子强求一致的“共识”与忍不住的“关怀”的矛盾等案例,张杨教授指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的评判标准、价值尺度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出现了错位。在冷战现实需要的重要影响下,社会科学重新布局,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在教学和研究中,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受到了更大的重视;而对学术本身来说,兴起了新一轮科学主义思潮和跨学科的冲动。尽管受到冷战和政治的极大冲击,美国的学术批判的传统并未断裂,冷战的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也有所缓解,美国的学术探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张勇安教授以美国财政部下属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在冷战中的对华宣传为个案,做了题为《“以毒品为武器”:哈里·安斯林格与美国对华冷战宣传(1950—1962)》的报告。

毒品（鸦片）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尤其在战争时期需求量极大。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并无毒品问题，而以美国麻醉品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等人代表，在1950—1951年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讨论中，指责中国是主要的毒品生产国、来源国和走私国。这一毫无证据的指责实际上是对苏联代表瓦西里·佐卡洛夫首次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回应。在随后几年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中，安斯林格先后提交了“军事报告”、《施佩尔报告》等文件，不断扩大对华舆论宣传，利用媒体报刊等形式，反复指责“中国的毒品问题”是“毒害自由世界的武器”，从而令“毒品问题”在联合国中取代了“中国代表权问题”，最后上升为冷战两大阵营的争论，台湾、法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站在美国一方；而中国则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张勇安教授认为，从材料来源看，安斯林格所提出的报告来自于派驻世界各地的调查员；这样就使得美国小官僚通过加入反共活动，把联邦麻醉品局这样的小机构的战略价值挖掘出来了。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需要，安斯林格等人的行为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非法毒品生产主要来源的注意力的转移，导致“金三角”地区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毒品交易地区。

两场报告引发了与会师生的强烈兴趣。报告结束后，两位教授就人文学科在冷战期间的兴衰、资金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档案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等问题与听众深入交流了看法。两位教授通过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和视角重新考察冷战史，令人耳目一新，听众从中获益良多。

（刘雨君供稿）

## 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做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2018年5月26日上午，武汉大学长江论坛第五十七讲于振华楼历史学院101报告厅准时开讲。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美洲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晓德应邀做了题为《“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祸福利弊之争》的讲座。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出席并进行了授牌仪式，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讲座内容分为启蒙时期渐成系统的“美洲退化论”“雷纳尔之问”及其回答和结语三个部分。

王晓德教授认为，在讲述“雷纳尔之问”之前需先了解启蒙时期欧洲大陆流行的“美洲退化”的理念。许多研究者将布丰视作“美洲退化论”的首

创者，然而王晓德教授在研究后认为，“美洲退化”的说法并非布丰首创，在其之前便已有许多欧洲学者与探险家提出这一观点。布丰本人从未到达美洲，其对于美洲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主要源于一些访问过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与学者的论述。然而虽然他们的确到访过美洲，但其论述却并非是全然客观的。他们将美洲视作突显欧洲文明的“他者”，因而在考察过程中便也潜移默化地以“有色眼镜”看待美洲，选择性地记录自身的所见所闻。

随后，王晓德教授列举了四位到访过美洲的自然学家的生平及其论述。英国自然学家马克·凯茨比在其出版于1731年的自然史论著中谈到了自身对于印第安人的印象，凯茨比在其间虽较为客观地叙述了印第安人身体健壮、富有耐心与耐力的一面，但仍不可避免地将印第安人与欧洲人进行比较，“野蛮”和“低劣”等词语在著作中频现。西班牙海军军官安东尼奥德·乌略亚与乔治·胡安曾于1735年受命考察南美洲，而后著成两卷本《南美洲航行记》，其中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在经历长期殖民主义、奴隶制与资源开发之后日渐退化，呈现出“胆怯”和“懦弱”的特性；而美洲与欧洲相异的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亦是“美洲退化”的佐证。最后，瑞典植物学家特·卡尔姆在《北美洲游记》一书中，以美洲动物的退化趋势、欧洲移民后裔寿命的缩短与体力的衰退以及女性生育能力下降等“表征”阐述自身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王老师指出，以往欧洲自然学家的笔下的美洲充斥着夸张奇怪的动植物，而学者们写下这些夸张的不实记述的原因则各有不同。一些学者将美洲的“退化”作为向殖民主义讨伐的个案，用以谴责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另一些学者则是有意贬低美洲的形象，以此塑造一个与欧洲相对应的非理性的“他者”形象，来弘扬与突显欧洲自身的理性与优越性。

上述到访过美洲的欧洲学者的论述或多或少对布丰《自然史》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是启蒙时期著名的博物学家，其著作《自然史》奠定了人类学、生物学和动植物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布丰的《自然史》文笔流畅，语言极具美感，其中关于美洲的观点，有许多源自于同时代学者及探险家对于美洲的记述以及殖民者、传教士所写作的报告。布丰虽然并非“美洲退化”的首创者，却将欧洲业已存在的“美洲退化”观念理论化与系统化，而渐成系统的“美洲退化论”又借助其学术声誉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布丰本人是文化优越论与自然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气候、食物与生活方式导致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特性；美洲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促使美洲大陆的动物种类稀少、身型矮小，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印第安人亦“退化”得怯懦胆小、缺乏生气。然而，虽然布丰将印第安人视作退化的“野

蛮人”，但他认为移民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并不会发生“退化”，反而能够凭自身力量改造美洲的恶劣环境。

欧洲人对于“美洲退化”的阐释并没有止步于布丰的《自然史》，德波、罗伯逊等人先后发展完善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荷兰学者科内利乌斯·德波是发展布丰“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他于1768年在柏林出版了《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德波与布丰同样将美洲“退化”归因于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然而德波进一步发展布丰的动物“退化”思想，其认为移民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克里奥人，与印第安人一样会因美洲的自然环境而发生体力与智力上的“退化”。此外，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于1777年出版的《美洲史》，从“退化”角度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描述看似无超出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等人的独到之处，只是以学界认同的名人身份促使了这种理论的广泛扩散，进而影响了许多欧洲人美洲观的形成。

在“雷纳尔之问”及其回答部分，王晓德教授指出，雷纳尔与上述的布丰、德波、罗伯逊，被视作是启蒙时期研究美洲问题的专家，其于177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两年后又在巴黎出版。雷纳尔的思想受布丰与德波“美洲退化论”的影响甚大，其又在布丰与德波的理念基础上，将“退化”对象进一步扩展为北美的美利坚人。然而，雷纳尔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其对“美洲退化论”的阐述最初是为揭示殖民主义的罪恶，但是美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美国革命却使他不慎产生疑问“为何在退化的大陆会爆发美国革命？”雷纳尔本人对此书进行了多达30余次的修订，其名曰进一步“完善”对美洲的认识，其实此举亦从侧面反映了雷纳尔与部分欧洲人，在美国革命后对于美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及至18世纪80年代初，雷纳尔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如果它是福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保持并促进其带来的好处？如果它是祸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弥补其带来的损毁？”这便是所谓的“雷纳尔之问”。为了在学术界征得对这一问题答案的论著，雷纳尔自掏腰包，在里昂研究院设立奖金，对有见识的最佳应征论著予以嘉奖，以便通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化解他在美洲研究上的一些困惑。

“雷纳尔之问”是欧洲存在的“美洲大辩论”的组成部分，彼时在欧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产生极大反响的原因在于启蒙时期的“美洲”，在欧洲知识精英构建自身文明话语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虽

然“雷纳尔之问”在启蒙时期欧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学者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资料业已散佚，王晓德教授在细致爬梳史料之后，目前只发现有八位学者回答了这一问题。

意大利学者约瑟夫·芒德里永是里昂研究院奖金的最早申请人，其于1784年出版了小册子《美洲发现的哲学研究》，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雷纳尔之问”。芒德里永认为，美洲的“发现”是一个十足的错误，其在给美洲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欧洲遭受了伤害。1785年，法国学者让·安烈·布兰出版了《新大陆的胜利》一书，其在总体上肯定美洲“发现”对人类是有益的，认为人类财富的增加是美洲“发现”的结果之一，而欧洲人应当纠正美洲“发现”带来的弊端。同年，法国博物学家朱思坦·吉罗·钱特兰斯出版了《一个瑞士人在美洲不同殖民地的旅游》信件集，其中第32封信明确表明是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

1786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侯爵撰写了一篇应征论文，题为《美国革命对欧洲舆论和立法之影响》。此文主要论述美国独立战争对于人类文明尤其是法国的影响，孔多塞侯爵在文章中将美洲的发现视作人类的“福音”，认为美国革命为人类历史进程带来重大变革。此外，曾作为法国远征军的将军参与美国革命的沙特吕侯爵，亦于1787年完成了应征论文《美洲发现结果对欧洲利弊之论》。沙特吕侯爵批判了“美洲的‘发现’是邪恶的”这一观点，其认为美洲的发现促进欧洲商业进一步扩张，对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1788年，法国学者路易斯·让蒂神父出版了《美洲发现对人类幸福之影响》一书，书的封面赫然醒目地标明此书是为回答“雷纳尔之问”的应征著述。法国学者亨利·卡尔提交了应征文章，题为《关于雷纳尔神父之间的论述》，于1790年发表。卡尔在文中写道，殖民主义是威胁人类文明的“痼疾”，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这种堕落在所有世纪一直是相同的。今天之人在他们的心灵里正如过去人们的心灵一样。制度和法律改变不了人”。从上述之言来看，卡尔显然对美洲“发现”带来之后果持否定态度。最后，第八位“雷纳尔之问”的回答者是一位匿名者，其于1787年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出版了《关于美洲发现等一系列事件的讨论》一书，该书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的“发现”。

从上述欧洲学者撰写的论著来看，他们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是毁誉参半，并未决出胜负高下。事实上，即使“否定”占取上风抑或相反，也远不足以化解美国革命之后很多欧洲人在认识美洲问题上产生的困惑。因而，



里昂研究院的设奖意义不在于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分出胜负高下，对这一问题本身的探究有助于促进欧洲人对美洲认知的深化。

“雷纳尔之问”在欧洲大陆引发的讨论并未随着里昂研究院的截稿时间的到来而停止，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利弊祸福的考问仍在继续。1792年10月，在庆祝哥伦布远航美洲300周年之际，贝尔纳普完成题为《意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论》的文章，意在回答“雷纳尔之问”。1795年，根茨撰写了一篇论述美洲发现之结果影响的论文，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根茨对美洲的“发现”持肯定态度，认为美洲“发现”对人类不仅是一个福音，而且促进了人类的启蒙与幸福，欧洲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丹麦学者于1785年撰写《关于美洲发现对人类更具有破坏性之研究》一文，对美洲的“发现”持明确否定态度，认为其对于人类而言破坏大于收益。其后，哥本哈根大学甚至仿照里昂研究院，于1792年设立奖项，征求对“美洲‘发现’对欧洲人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这一问题的回答。

“雷纳尔之问”引发的讨论持续了许多年，这反映了欧洲人对自身原有美洲观怀疑的逐步加深。伴随着欧洲学界对美洲研究的深入，美国人的逐渐参与及其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欧洲内部对“美洲退化论”持有异议者与美国对这一观点的反驳者遥相呼应，进而促进了欧洲民众更为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美国乃至美洲。

结语部分，王晓德教授总结道，欧洲学界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利弊祸福之争，是欧洲存在的“美洲大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含着对欧洲大国殖民美洲的评价，又暗含着如何能够走出专制主义带给美洲灾难的梦魇，实现启蒙时期思想家提倡的“理性”社会。因此，这场争论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美洲很大程度上成为抨击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中介”，意为借美洲之“题”来发挥对改变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不同看法。

另外，这场争论的客体是美洲，主体是欧洲，意为主体在客体区域内的活动究竟对两个大陆产生的作用如何。争论最初主要是欧洲学者参与，后来亦有少量的美国学者介入进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一个国家，不过基本上是在欧洲学者的圈子内打转，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评价，不管是持“否定”意见者，还是持“肯定”意见者，无不是站在欧洲的角度来观察，“利弊祸福”也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给美洲带来的“祸福”很少引起他们太多的兴趣，他们对美洲的描述显然不是把美洲作为主体，而是置于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之内。

因此，在“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这一问题中，“发现”“福音”与“祸害”皆是主体强加给客体的词汇，其问题本身离不开客体，

但实际上又与客体没有太大关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欧洲学者顺理成章地把欧洲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在其中一览无余。启蒙时代，欧洲人虽高举“理性”与“科学”大旗，向“愚昧”人民与专制制度发起挑战，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欧洲人以本大陆为中心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式。美洲的“野蛮”与“蒙昧”，成为突显欧洲“优越”的一面镜子。欧洲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回答这一问题，势必缺乏客观性。其实，对这一问题具有发言权的应是美洲本土人，他们身临其境，对美洲给自身带来的改变与其中蕴藏的机会都有着深刻的体悟。然而这场争论却缺乏美洲本土人的声音，这无疑为这场争论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尽管如此，主要发生在欧洲学界的关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争论显然具有难以磨灭的深远意义。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便已拉开序幕。雷纳尔在美国革命即将成功之际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在欧洲学界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即使到了当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的介入让争论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正是通过他们的描述，美洲不断地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欧洲人逐渐地走出想象美洲的虚幻图景，对彼岸世界的了解不断加深。对于这种结果，这场争论的持续显然是功不可没。

（武汉大学团队供稿）

## “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8年6月2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多名学者，围绕特朗普现象分为两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 （一）特朗普时代的国内、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达巍教授以《全球化、特朗普现象与中美关系》为题首先发言。他认为，近些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在三个层面遇到瓶颈：第一，美国地理扩张达到顶峰，同时遇到中国、印度巨型国家进入自身主导体系之中，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重新分工；第二，在过去数十年间科学技术

没有重大突破，依靠技术进步消解社会矛盾的希望比较小；第三，制度革新缺乏。美国目前缺乏突破瓶颈的办法，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美国民众最可能获得成功的途径。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美国人还在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上一次制度层面的更新，即奥巴马的当选并不能让美国人满意。达巍认为，特朗普在任内希望制造一些不可预期性，虽然会取得战术优势，但同时也会消耗美国的国家信誉，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美国霸权。长时期以来美国对其他国家提供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世界政治的公共产品，而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令国际社会对此充满忧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以《特朗普现象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退》为题，选取自由国际主义兴衰的角度，从外交方面剖析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及其后的举措。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主流的外交思想，长期主导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它可被视为自由主义原则与国际主义外交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这一套思想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塑造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并在冷战后继续对美国外交发挥作用，在小布什时期形成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但是在伊拉克战争后，自由国际主义开始盛极而衰，接连遭遇重大挫败。自由国际主义的失效和挫败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基础，其表现有：美国相对实力的衰退，削弱了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能力和意愿；民粹主义兴起，其原因包括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移民涌入等自由国际主义的副产品，导致了美国国内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瓦解，越来越多的民众，包括精英和大众不认可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议程。与此同时，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削弱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美国例外论。特朗普上台后，抛弃自由国际主义，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表现有：在经济上从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转向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在安全上强调美国自身实力的壮大，而不是集体合作，奉行杰克逊民族主义，在全球治理实行单边主义，包括退出《巴黎协定》；对继续扮演世界领袖角色三心二意，放弃部分领导责任，同时试图减轻在安全领域的领导负担，希望北约盟国、日本、韩国增加军费开支。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业亮以《“解构行政国”：特朗普保守主义国内政策的目标》为题，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角度阐释特朗普现象。他认为，行政国自进步主义时代开始，总体趋势是在扩张，而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在采取“结构行政国”的措施，大刀阔斧削减行政机构，这与曾经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芬·班农有直接关系。特朗普曾用这样的话阐述其执政理念，“要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国急刹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以《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生态》为题，谈了自身对美国目前政治文化新的认识。刁大明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既可被视为“因”，也可被视为“果”。如果将特朗普作为“果”来看待的话，2016年总统选举是温和自由派执政周期结束的开始。如果将特朗普现象作为“因”的话，实际上可被视为圈外人不断适应华盛顿的过程。

在随后的专家讨论阶段，问题集中于王立新教授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展望问题。王立新在回答中指出，之所以预测自由国际主义会东山再起，是因其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深深植根于美国价值观，虽然目前处于低谷时期，但绝不会从此销声匿迹，时机成熟还会东山再起，再度主导美国外交。刁大明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当然不会消亡，问题是下次再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它的回归充满多种多样的可能。在被听众问及北大西洋安全同盟的前景时，王立新认为，美国和北约之间并不仅仅是安全同盟，它们之间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同盟关系，因此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与纷争都属正常。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在讨论与提问中认为，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这类粗糙的标签所遮蔽的问题，可能比揭示的问题更多，因此需要再细致讨论特朗普反对的是何种全球主义。刘瑜认为，与其说特朗普在反对全球主义，不如说在调试美国政策目标与国家能力之间的距离问题，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起，美国作为一个“帝国”，面临过度扩张问题，因此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开始从全球收缩，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做法。

## （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基础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在《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文化冲突》报告中，从美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视角，讨论特朗普现象作为“果”的右翼民粹主义。她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一种西方世界的整体现象。如果将其视为美国特殊现象，就容易单从美国独特性寻找解释。实际上，2015年—2016年难民潮已经激起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普遍兴起。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北欧国家，同样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可见不平等的加剧不足以解释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全球化的确导致了美国大量工人的失业，但不是引起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主因。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美国并没有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即使是共和党内部，支持全球化的比例也是在提升的，只是提升比例没有民主党那么大。过去四十年间美国贫富差距在加大，但是美国人对贫

富差距的满意度却在缩小，就政治后果而言，看法比现实更重要，这也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也不能解释。

刘瑜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西方文化后现代转型所带来的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特朗普现象背后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现代文化社会在向后现代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来所谓“权利的革命”，权利的主体开始从白人男性向少数族裔、女性、儿童、移民甚至动物扩散，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右翼相对稳定，而左翼在权利革命的刺激下剧烈变动。由于权利革命的推动，实际上左翼变得越来越极端。但是之所以右翼反而会给人更极端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其观点位置而是其观点强度发生强烈变化。右翼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表达一种在历史上看比较温和的立场，而左翼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表达相对激进的变化。之所以右翼态度会变得更加激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围心态，在美国人口代际变化中，年轻一代对共和党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未来不在共和党一边。因此共和党人在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越发失落、焦虑，产生出一种对美好旧时光的“乡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以《由“特朗普现象”引发的对美国媒体的再思考》为题，讨论了媒体在特朗普当选中所扮演的角色。她首先讲述了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与教育家约翰·杜威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论战。李普曼在 1922 年出版著作《公众舆论》，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拟态环境”概念。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和加工，经过改造以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因而容易扭曲事实。拟态环境揭示了民主和舆论的困境，因此李普曼认为媒体应当由受过训练的精英掌握。杜威并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在 1927 年出版《公众及其问题》，坚持大众民主，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展现了对公众依靠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在现代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特朗普的当选展现了新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发展，公众又如何借助新技术影响 2016 年的选举，右翼民众如何利用新媒体对抗精英化左翼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传播各类信息甚至谣言诋毁希拉里，帮助特朗普当选。赵梅认为，中国学者要避免只是紧盯传统自由派媒体，而应当将底层右翼纳入重要的信息参考来源，顾及锈带、中西部劳工阶层的声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以《“无选择困境”：政党政治与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为题，探寻特朗普竞选成功背后的政党制度性因素。王希指出，特朗普以一个自称代表大众利益的局外人，挑战建制派利益，自费竞选美国总统，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其当选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王希创造了“无选择困境”(no-choice dilemma)概念,来描述美国选民在最后选举时面临的难题:无论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并非自己心中合适的总统人选,但是如果不选取其中一位,则面临自我剥夺选举权的困境。如果说无选择困境是偶尔出现的反常现象,它对民主的损害尚可容忍,一旦无选择困境成为常态,并且渗透和表现在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等各层选举中,那么选举的民主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在事实上剥夺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利。美国政治学家列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将这种弊端概括为“双寡头垄断体制”,选举票上固然可以出现两党以外的选举人,但是最终通常获胜者只在两党选举人中间产生。

王希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经历了不断重塑的历程,通过灵活地应对变化牢牢把控美国政治,造成了选举僵化和政党工具化,使得政党的活动围绕成功赢得选举展开。当政治竞争变成放大的工具理性和实践之后,民主政治应有的道德和思想便会荡然无存。这种政党工具化为特朗普进入选举政治提供了入口,他加入共和党,通过违反政治正确吸引大批民众,从而赢得选举。

在学者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就右翼媒体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很难找出一个为右翼民粹代言的媒体,特朗普的推特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刁大明就“无选择困境”提出质疑,认为在州一级层面是有实例证明可以突破两党制的。刘瑜认为,政党两极化的程度远大于社会两极化的程度,共和党之所以坚持反对堕胎问题的立场,和该问题涉及基督教观念中的生命观有关,妥协弹性很小,因此很难做出像移民、同性恋问题上的让步;选举团制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保护小州利益,否则选举战场就集中在纽约、加州这些人口密集区,偏远地区选民的诉求就会被忽视;如果按照美国的长线历史来看,美国出现今天的极化政治很正常,与内战、重建到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相比并没有那么严重,美国在用改革预防革命,以调节矛盾。

(张大鹏供稿)

## 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应邀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 与传播学院讲学

6月7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副主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原祖杰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19世纪美国城市化背景下的道德重建与行为规范》的学术

报告，讲座在文科实验楼光启学术中心举行，由裔昭印教授主持，我院教授刘子奎、梁民愆、陆伟芳也参与了此次讲座。

原祖杰的讲座从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礼仪制度变化的焦虑讲起，认为在美国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也经历了这种焦虑。之后，原祖杰从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城市产生的变化讲起，描述了美国工业化初期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他指出，这种变迁随着内战之后新兴城市的崛起变得更为严重，迫使美国社会需要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范。接着，原祖杰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例，阐释了美国清教徒道德规则在城市化浪潮中的变化，以及美国社会为了重建社会的行为规范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供稿）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顺利召开

2018年6月8—10日，“穿越全球变局：不确定性年代与变化中的美国史研究”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承办。会议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编辑部以及《吉林大学学报》等多家杂志社约160余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会。开幕式上，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莅临大会并致辞，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世界史学科带头人裔昭印教授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和美国史的研究状况。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茂信教授致开幕辞，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张勇安教授做理事会工作报告。开幕式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主持。

此次学术研讨会分大会主题报告与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

大会主题报告由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主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和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分别就环境史的新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史研究等主题发表演讲。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围绕美国形象的建构、冷战与对外关系史、移民与社会史、资本主义史、城市及环境史等研究领域共举行了 20 余场小组讨论。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既有严肃的学术讨论甚至争论,又有平等热烈的交流和对话,体现出美国史研究会优良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美国史学术界同仁对现实的强烈关怀。

## 一

政治与经济是本次美国史年会的重要论题之一,它们不仅拓展了研究内容的深度,而且深切关怀当下的现实问题。

在政治领域的“自我”与“他者”的构建方面,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通过考察美国精英如何发明新的身份叙事重新阐释美欧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叙事来论证建立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重塑自己文化和地缘政治身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新理解美欧关系和提出新的对欧战略。浙江大学张杨教授通过分析美国利用中国学和所谓“毒品”问题开展宣传活动,“院外援华团”成功地抹黑了中国形象,进而操纵了特定时期美国的公众舆论。在政治理念方面,大连理工大学马万利教授试图在对反联邦党人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反联邦党人的思想谱系。上海师范大学蔡萌副教授以 1787 年宪法中两条关于修宪问题的条款——第 5 条和第 7 条为中心,来考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的若干重大问题。武汉大学杜华对殖民地时期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反奴隶制活动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从一个侧面认识奴隶制和种族问题对美国早期历史的影响。政党与选举在美国政治中一直在进行。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通过分析亚伯拉罕·林肯 1832 年的州议会竞选,揭示林肯走上从政之路的因缘。南京审计大学江振春教授以美国 18 岁公民投票权的设定,对《宪法第 26 修正案》进行历史考察。洛阳师范学院杨成良副教授针对美国《全国普选洲际协定》进行解析。北京外国语大学杨钊老师指出 1812 年战争与纽约州政党政治的关系。河南大学代素娟博士分析了克里滕登妥协的本末和失败的原因。

## 二

在外交领域出现新的研究趋势,从“多面的美国外交史”与“中美关系的新思维”到“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与世界”充分体现了本次年会“不确定性



年代与变化中的美国史研究”的主题。冷战史的研究不仅跳出以美国研究为中心转向中国周边，而且提出了研究的新方法。

在超越美国世界的外交领域，上海社科院黄仁伟副院长从民粹主义角度，分析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桑德斯的民粹主义和班农的民粹主义，指出了这三种民粹主义的不同，并且揭示了特朗普民粹主义获得国内支持的主要力量基础和内涵。浙江师范大学赵志辉教授从“博顿草案”的大讨论出发，探讨了美国战后初期亚洲战略重心的初步转移。上海师范大学刘子奎教授梳理了过去与现在的美国出口控制政策，深刻指出这一政策的不断演变的内容和意义。西南大学王勇教授以美国外交战略的三次重大转变为案例，分析了各地区在外交战略转变中的态度，以及外交战略转变的过程。

在中美关系上，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梳理了建交后中美经贸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战略诉求，反映双方战略目标的差异性和经贸关系从双边向国际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四川外国语大学张涛教授不仅纠正了奥尔德里奇研究中有失偏颇之处，也综合展示耶稣会译著进入美国早期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呈现耶稣会影响美国孔子观的作用机制。

在中国周边的冷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教授通过对意识形态、美英关系、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美巴关系等因素的分析，阐述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的演变，分析这种演变的动因，解释美对印政策的实质，以助人们对当今美印关系的认识。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主要利用英、美两国的有关档案资料，就英、美双方对此次危机的反应和政策进行探讨，以揭示这一时期东亚冷战的复杂性。浙江大学程早霞教授以 1949 年劳威尔·托马斯父子西藏旅行广播报道出发，指出这一报道是冷战初期美国政府改变西藏政策的风向标，对日后冷战时期美国西藏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以武器换装备为切入点，探讨了 1969 年至 1976 年美国与缅甸的禁毒装备援助谈判。辽宁师范大学高岳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的中国形象评析出发，指出美国正在从全方位的、立体的视角去了解中国。

冷战史新方法领域，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针对我国学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进行梳理，就我国学界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谈几点思考，期冀对相关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从冷战政治出发，运用国际史的视野和方法，重新审视小石城事件与美国的黑白种族合校。上海大学王庆华副教授梳理冷战前期，说明政府主导下的美国高校是如何应对苏联的

意识形态的扩张的。首都师范大学翟韬老师在目前学术界现有的成果和综述的基础上,介绍该领域最新的学术潮流——超越冷战史,并从美国外交史学史发展嬗变的角度对其进行辨析和评价。

### 三

本次年会不仅聚焦于美国研究的传统问题,且关注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来自各个方向的农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里,面临着共同的环境问题。各位专家学者研究这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充分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移民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详细梳理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波华人移民美国潮及其影响,推进从美利坚民族共同体到所有移民国家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减少摩擦和对抗,促进全球和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魏涛重点考察贝林在移民史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进一步了解移民史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发展趋势。河北大学韩玲指出,从1952年当选国会参议员至整个总统任职期间,肯尼迪一直在致力于推进移民政策改革,其推进改革的一系列活动,突出体现了白宫在战后移民问题上的强大影响力。黑龙江大学马德义副教授认为,从19世纪末迄20世纪初,向海外移民的想法与举动在当时的朝鲜社会是备受排斥的。他进一步分析了百余年前,朝鲜人是在何种因素的推动下背道而进从而移民夏威夷的。长春师范大学杨静以俄裔犹太、意大利女性移民为例,考察该时期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群体在新、旧文化中艰难地融入美国社会的文化适应之路。福建师范大学贺建涛探析19世纪后半期华人向北美移民的高潮时期,北美西部华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相遇及相互交往与认知。东北师范大学李敏博士通过评价大卫·布伦戴奇的《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流亡政治,1789—1998》,来探索美国爱尔兰裔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向度。东北师范大学任慈博士采用跨国主义视角解构1948年到1955年“滞留学生”内在的心理变化。

在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领域,浙江师范大学孙群郎教授从城市的空间发展研究出发,指出城市的空间发展始终存在着聚集与扩散两种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运动,正是这种运动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演变和发展。他认为聚集扩散论不仅更符合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实际,而且对于未来的城市空间发展更加具有指导意义。厦门大学李莉副教授从建设到治理,探讨二战后美国公共

住房政策转型。吉林师范大学石光宇博士考察了种族歧视所带来的族裔聚居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得纽约社会中产生了隔都的现象。

学者们就城市史研究的新问题进行讨论。厦门大学韩宇教授从衰落还是复兴出发,对美国制造业城市发展走势进行了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副教授通过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四个层面分析,指出了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深刻分析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云南师范大学王洋通过对绿带城镇兴起与建设的背景及过程的分析,探讨美国联邦政府参与绿带城镇建设的问题与成效,以及其后来对新城运动兴起的影响。太原师范大学王宇翔首先从理论上概括二战前工业郊区化的推动因素,其次通过个案和统计数据展示二战前美国制造业郊区化的进程,最后从制造业的角度重新思考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关系。山西大学宋晨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通勤铁路危机与联邦政府援助公交共识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张凯成博士通过对波特兰和威拉米特河治理与开发历程的梳理,丰富了城市与环境特别是与河流互动的历史叙述。辽宁大学李涛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金山城市环境改造为切入点,讨论华埠重建受阻及华人在三次危机中的反应。

在环境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国荣研究员以中美两国的相关研究为例,试论农业史和环境史的联系与区别。长春师范大学高科深入考察马瑟时期美国国家公园旅游开发政策的形成与实践,并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看待其必然性与局限性,进而揭示旅游因素对于美国早期国家公园构建的重要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刘向阳在追溯成本-效益分析与美国环境管制结合的历史基础上,重点剖析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环境管制引发的理论争论,并以经济效益评估实践中不同主题的数据计算差异为实例,呈现环境治理中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的缠绕交织。福建师范大学赵万武从整体上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户外运动在美国流行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并分析户外运动爱好者保护理念和行动的内涵与独特性。上海师范大学刘晓卉博士聚焦于华人移民与加州自然及环境的互动,尝试探讨华人在诸多自然、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如何在加州开展农业生产,引起当地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林灿硕士从观念与动机的角度,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动物收集。南开大学刘鹏娇博士系统梳理拉夫运河事件的缘起及其居民抗争进程,分析其对美国环境立法及民众环保观念转变的深远影响。

## 四

本次年会上社会与法律方面的研究是一个亮点，不仅使用了新材料和新主题，而且出现了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就社会生活中的族裔与劳工，性别、家庭与健康和法律与社会出发，拓展了美国史研究的广度。

在少数族裔与劳工领域，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从劳联角度出发，探究其与 19 世纪后期美国熟练工人的阶级认同。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通过对“毛皮边疆中乡村婚姻”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和梳理印白跨种族通婚的来龙去脉，探析种族主义与北美毛皮社会印白通婚习俗的兴衰。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通过对具有大西洋经历的前非洲王子、北美奴隶尤卡扫·格劳尼扫所撰写的《生活叙事》进行评析。首都师范大学于展副教授力图把卡森对学生暴力协调委员会、马丁·路德·金的微观个案研究与他为民权运动总体模式的理论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阐释。鲁东大学周余祥通过研究一战和二战期间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来剖析战时体制下美国联邦政府对劳资关系调控政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美国天主教大学徐天从被忽视的“父爱主义”出发，对尤金·吉诺维斯与当代美国奴隶制史进行研究。鲁东大学罗超通过论述战俘交换、惠茨案与战俘记忆政治化之间的关系，以说明战俘问题及其余波成为阻碍南北和解的一大障碍。武汉大学巩大松博士揭示了黑豹党开展社区济贫的社会背景、自身考量、宣传实践以及社会影响，进一步探讨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本质和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张鹏从印第安人部落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特库塞姆联盟形成的内外原因，以期揭示印第安人部落社会组织结构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内外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鲁东大学王磊珍以乔克托部落为例，探讨了杰克逊时期印第安人的迁移。

在社会性别与健康方面，西安外国语大学李婷讲师从 19 世纪美国女性的传统角色入手，剖析妇女俱乐部诞生与发展的背景，进而揭示妇女俱乐部对 19 世纪美国女性社会地位转变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中山大学曹鸿讲师通过美国为应对“人口危机”带来的威胁出发，探讨了二战后美国的生育政治。南阳师范学院李娟讲师对土地规划、托儿所设施和服务、妇女就业、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与政治管理等内容进行探究，揭示了新城镇对于改变女性生活方式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作用和意义。广州大学梁立佳讲师梳理了印第安人与白人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印第安女苦役”形象、印第

安社会野蛮论及印第安人种低劣论三者间相互作用，构建起 19 世纪美国白人群体脑海中的印第安人观。南开大学王林亚博士探讨了美国在殖民地创立的林业科学促使当地经济生活发生改变，同时迎合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我们一窥美国走向海外扩张时是如何将热带环境管理融入殖民政策之中的。辽宁大学刘博然试图从历史学与宪政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梳理同性恋群体权利意识觉醒与逐渐深化的历史过程和所依托的权利及其宪法保障。南开大学刘黛军硕士从文化的角度——自然疗养观念方面入手，探讨观念与美国肺结核疗养院的关联，以求解释美国肺结核疗养院的兴起和发展缘由。

在法律史研究中，辽宁大学石庆环教授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出发，探析美国 1978 年的《政府道德法案》。他不仅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阐释了该法具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副教授以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宪法观为考察对象，指出了其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陕西师范大学梁红光副教授以 1789 年司法的制定为中心，从国家建构的视角，考察美国建国者构建联邦司法权的思想逻辑。福建师范大学郭巧华副教授从约翰·马歇尔的宪法学理念及其司法修辞，深入剖析美国建国初期政党政治兴起后，以马歇尔为首的最高法院是如何将 18 世纪的法律共识原则与美国民主原则协调，还原联邦最高法院建国初期真实的发展历程。中山大学史宏飞副研究员重新考察科学家的核教育运动，指出科学家并非有意使用“惊吓策略”，核教育活动在事实上也推动了美国公众对原子能文官控制和国际控制的支持。重庆师范大学王生团从镀金时代律师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的案例着手，解释其对“司法达尔文主义”泛滥的影响。扬州大学李丹副教授以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为例，探讨了美国内战前南部限制废奴刊物流通的司法实践。辽宁大学张玥硕士以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设立的积极作用及存在的隐患出发，从而挖掘美国文武关系相对平衡及未来面临危机的根源。

会议通过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报告，并顺利完成了理事会成员的调整。大会闭幕式上，ProQuest 公司和 CINFO-现代信息公司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最新的历史数据库情况。最后大会在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本次会议还进行了理事会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调整。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受聘为研究会顾问，东北师范大学董小川教授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理事；东北师范大学欧阳贞诚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李文硕副教授当选理事，

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副教授被聘为副秘书长。此外，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费的新标准。这次会议是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集中反映了中国学界关于美国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学者将继承前辈学人的优良品德与扎实学风，继往开来，承担起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的责任。

（上海师范大学李文硕副教授供稿）

## 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做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大讲堂

6月11日下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国荣做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大讲堂，举行了题为《冷战与美国黑人民权改革》的讲座。讲座在文苑楼1405会议室举行，由李文硕副教授主持，来自多个学院的硕博士研究生到场聆听。

谢国荣以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件的审理和最终最高法院做出“隔离但平等”原则违反宪法的裁决为切入口，结合当下学术界流行的冷战国际史视野，分析了最高法院做出这一判决的国际背景。谢国荣首先分析了目前中美学术界对民权运动和布朗案的研究，继而介绍了国际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随后在讲座中以这一个案为例，详细解释了如何将国际史的方法运用到国家的内部事务上。传统研究往往关注布朗案判决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思考、黑人民权组织的作用，谢国荣则分析了在冷战美苏对抗的背景下，国际舆论、美国国际形象和与苏联对抗的意识形态需求如何影响了大法官们的判断，使得布朗案以9:0的压倒性优势得出判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供稿）

## 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应邀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做讲座

2018年6月11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来访我所，以《隐蔽行动：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第三种选择》为题在我所“NGO沙龙”进行

讲座。白建才教授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研究”首席专家。

在讲座中，白建才教授从历史档案出发，围绕“隐蔽行动”概念及其战略的由来、冷战期间美国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实施效果与特点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美国隐蔽行动在冷战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白建才教授还就美苏对外行动的对比、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以及当前美国 NGO 的涉华活动等问题与我所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来自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师生也参与了此次沙龙。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供稿）

##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 做客北京大学

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邀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Emily Conroy-Krutz）于2018年6月1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题为《基督教帝国主义——早期美国海外传教历史的再思考》（“Christian Imperialism-Converting the World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希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翟韬副教授应邀进行评议，来自校内外40多名师生听取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康罗伊-克鲁兹首先引入19世纪初美国著名女传教士哈里亚特·纽厄尔（Harriet Newell）的故事，描述她跟随丈夫前往印度传教却于1812年难产之后病逝于法属毛里求斯的经历，由此引出与美国早期海外传教活动相关的一系列思考：美国海外传教活动为何会在19世纪早期兴起？纽厄尔夫妇等新教福音派传教士当时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海外传教士是如何想象和设计传教活动的、他们如何选择传教地点与受众、又如何根据当地情况来调整传教方式以扩大影响和效果？传教士们追求的基督教扩张与他们对新生美国的国际地位的想象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他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什么、向国内传递了什么信息、传递的信息在国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康罗伊-克鲁兹认为，这些问题既是宗教史、教会史中的重要问题，也与我们理解美国式“帝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起源相关；遗憾的是，美国史研究的主流学说普遍将孤立主义认为是19世纪美国对外关系的基调，将帝国主义看成

是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才出现的情况，而宗教史又一直被边缘化，历史学家因而很少将早期传教活动与帝国主义的主题联系起来。康罗伊-克鲁兹指出，海外传教士的目标看似很简单——传播福音，履行基督赋予的使命，将世界各地所有的“异教徒”皈依为基督教徒；然而事实证明，早期共和时代的海外传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性活动，而是一种与国家身份塑造相关的历史进程，在精神与行为方式上与美国后来的“帝国主义”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康罗伊-克鲁兹指出，传教史的材料证明，从殖民地到早期共和时代，新教派别的传教活动一直蓬勃发展，需要被皈依的目标先是国内的印第安人，尔后扩展到海外各地的“异教徒”；海外传教活动的影响之大，从海外传教士的传记销售记录中可见一斑。譬如，19世纪上半叶后期，哈里亚特·纽厄尔的回忆录在美国和英国都十分畅销，仅1840一年市面上就有15个版本，甚至于当时出生的大量女婴都起名叫哈里亚特，以示敬仰效仿之意。康罗伊-克鲁兹特别指出，在早期的海外传教活动中，英美两国的宗教团体之间关系密切，相互影响。英国伦敦传道会曾在殖民地时期主导了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上的印第安人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传教活动，美国革命的发生迫使英国传教士到美国之外的其他英属殖民地开展传教；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则借新获取的国家身份开启了自己的传教活动，传教地图展示出早在1803年康涅狄格传道会就已经规划了美国基督徒传播福音的地理范围，即在北美大陆上由东向西推进。尽管如此，美国传教士并没有因为美国独立而与英国伦敦传道会分道扬镳，相反，他们视传播基督教精神为英美教会的共同职责，鼓励两国传教士在各自的范围内传播福音。

“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中文简译为“美部会”）在1810年的创立，开启了美国传教士的海外事业，而讲述这一段历史正是康罗伊-克鲁兹讲座的重点。早期共和时代的美国离世界大国的位置还很遥远，但美国传教士已经开始将自己视为美国思想的开路先锋，积极参与全球宣教事业，并将此视为美国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在其中占据合适位置的一个重要步骤。康罗伊-克鲁兹展示的一张1830年代的传教地图表明，美国传教活动在这一时期从以北美大陆为主导转向为以全球为目标。在康罗伊-克鲁兹看来，这种转向反映了以传教士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人开始将宗教、国家身份和未来帝国联系起来思考，福音传播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美国或美洲，而是全世界。换言之，早期共和时代的美国传教士将福音传播与美国塑造新世界秩序的使命感联系了起来。到了1830年代，美国传教士的足迹已经遍布非洲、亚洲、太平洋



群岛、中东、南非乃至欧洲。

接着，康罗伊-克鲁兹使用美部会的官方出版物《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中获得的材料，描述了海外传教士在海外的活动和观察。这本 32 页的杂志利用诸多篇幅介绍了美部会在全球的多种活动，包括在锡兰建立宣教学院(Mission College)以及在印度、利比亚、俄国等地的传教情况。因为杂志具有筹集善款的功能，所以它不时刊登文章，向读者说明海外传教的必要性，帮助树立国内教会成员的“责任感”——即美国基督教徒需要尊崇上帝旨意，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徒的福祉——以获得他们对海外传教工作的持续支持。19 世纪初的美国尚不是一个“正式帝国”，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到世界各地去传教；即便如此，美部会并不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异教徒”地区，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发达程度对它们进行了区分。为了争取海外传教的成功，传教士在确定合适的传教地点之后，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调整传教的方式，创造有利条件，比如组织《圣经》的翻译、建立教会学校和慈善医院、组织各种宣教活动等吸引潜在的皈依者。与此同时，传教士也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造”当地习俗与制度，譬如在印度的美国传教士就将皈依者是否敢于抛弃种姓制度的传统作为衡量其是否有资格被接纳为基督教徒的一项考察标准。

康罗伊-克鲁兹教授总结说，通过考察美国 19 世纪早期海外传教活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将美国帝国主义的起源时期推进到 1898 年之前；美式“帝国主义”的起源不光是以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也带有海外传教性质)为标志，还应将海外传教活动考虑在列，因为海外传教士力图推进的是一种美国式“基督教帝国主义”，这种对宗教价值观的长期、持续的推动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早期共和时代英美宗教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帮助我们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思想和实践中的“传教士动力”的历史渊源。

在评论环节，翟韬认为，康罗伊-克鲁兹的研究将几种史学潮流——宗教史复兴、文化转向、全球史转向和跨国史转向——结合在一起，选取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主题(教会史)，将之与一个经典问题(帝国主义)结合起来，的确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他同时也质疑传教士活动是否可以与“正式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相提并论。康罗伊-克鲁兹回应说，她之所以自创“基督教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早期共和时代的海外传教活动，正是希望说明海外传教士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企图用自己的宗教观影响全球时，带有国民身份的意识自觉，表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与行为。牛可则重点讨论了海外传教士在早期美国人认识外部世界过程中所发挥的“知

识生产”贡献，康罗伊-克鲁兹对这一评论十分赞同，并透露说这一主题是她目前研究的内容之一。

随后，康罗伊-克鲁兹与与会师生展开了极有启发性的互动，讨论的问题包括美国的海外传教与早期美国的海外商业贸易之间的联系、传教士的双重身份问题（基督徒和美国人）、美国海外传教士的中国情结、海外传教的历史遗产，以及教会史史料的全国分布情况和电子化进展程度等。

（王一哲供稿）

## 武汉大学举办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系列讲座

**编者按：**2018 年 6 月 25—28 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举办“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期间，邀请国内四位学者为研习营成员和武大师生做了系列学术讲座。演讲者分别是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南开大学丁见民教授、中国政法大學胡晓进副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刑承吉。讲座内容与研习营互为补充，加深了大家对美国种族政治等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

### （一）梁茂信：《战后美国隔都区的变迁及其含义》

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仿吾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教授，于 6 月 25 日晚在振华楼历史学院 101 报告厅进行长江论坛第六十四讲，讲座题为《战后美国隔都区的变迁及其含义》。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教授出席并进行授牌仪式，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本次讲座。此次讲座也是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系列讲座的第一场，研习营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此次活动。

讲座伊始，梁茂信教授对“贫民区”“破败区”与“隔都”进行了概念性区分。贫民区（slum）以贫困人口众多、人口死亡率高、住房破败与基础设施匮乏为主要特征；破败区（blighted area）则是指由于缺乏开发价值而处于停滞状态的社区，其往往成为贫民区形成的前奏或过渡阶段；相较贫民区与破败区而言，隔都（ghetto）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隔都区并非只局限

于黑人社区，当代美国隔都区居民存在跨种族多样化的情况，其不仅是纯粹的种族问题，而是一个种族和阶级相互交织的问题。

隔都区特殊的环境孕育着与众不同的亚文化。自 1870 年至一战结束，美国城市隔都区以外来移民为主体，其在经济上推动着美国工业化进程，亦在文化上加速了美利坚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亚裔移民于其间虽饱受种族歧视之苦，但他们往往积极参与就业市场，以血缘关系和家庭结构经营商业实体并相互支援，且重视下一代教育问题，由此自力更生的亚裔移民逐渐融入主流社会，进而推动亚裔隔都区人员频繁流动与更替。

美国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变、少数族裔“中心城市化”趋势，以及白人、中产阶级黑人郊区化进程，亦是隔都区化日益加剧的根源所在。社区价值观破碎、社会公德堕落、犯罪率急剧上升、种族骚乱频发，这些“对抗性文化”的表征与活动成为高悬于黑人隔都区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黑人隔都区化日益深重之时，美国各级政府与司法部门的作为与不作为，加剧了隔都区的形成。

最后，梁茂信教授总结道：隔都区经历了由民族文化为特征，向以黑人和民权运动后的跨民族和阶级方向的转变；其中的亚文化，亦经历了由民族文化向黑人贫困文化、对抗文化的转变。它是美国社会经济机制运作与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对生活于其间的底层阶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的探究，将推动研究者更为深入地认知美国社会与经济体制。梁茂信教授强调，“隔都区”与“隔离”等问题，与公民权利行使密切相关。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亦是观察美国不同阶层民众行使公民权利的重要路径和方式。

## （二）胡晓进：《不在场的参与者——奴隶制与 1787 年美国制宪》

2018 年 6 月 25 日晚上七点，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副教授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116 会议室做了题为《不在场的参与者——奴隶制与 1787 年美国制宪》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是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系列讲座的第二场，由历史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研习营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胡晓进副教授指出，美国宪法中虽然没有“奴隶”或者“奴隶制”这样的字眼，制宪者中也没有奴隶，但美国宪法却常常体现出奴隶的影响。总而

言之，奴隶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参与塑造了美国宪法。从制宪过程的辩论和妥协来看，宪法中虽然没有提到奴隶，但是在制宪会议过程中，奴隶制是建国之父们辩论的关键词。在几次关键性的辩论和妥协中，奴隶制实际上发挥着核心作用。他指出，虽然1787年制宪会议进行到6月30日之时才开始对奴隶问题进行辩论，但是对于制宪至关重要的7月份实际上多次讨论了奴隶制，包括美国宪法最为著名的“五分之三妥协”原则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从宪法的条款来看，很多条款也与奴隶制密切相关。其中宪法的第一条第四款和第九款、第四条第二款实际上与奴隶制直接相关。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二条第一款等条款则实际上暗含了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在进一步对《西北法令》进行考察后，胡晓进副教授认为，实际上，在制宪问题上，北方代表做出了巨大让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退让和妥协。总之，胡晓进副教授提醒大家注意“新进步主义学派”的研究，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美国制宪和立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以避免将美国早期史过度理想化。

讲座结束之后，参加研习营的学员和旁听的师生，围绕着美国宪法的性质、奴隶制与美国早期政治发展、宪法与美国内战的关系、托马斯·杰斐逊的奴隶制观念等问题，与胡晓进副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

### （三）丁见民：《疾病、医疗与卫生——美国疾病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18年6月27日晚七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丁见民教授在历史学院101报告厅做了题为《疾病、医疗与卫生——美国疾病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术讲座。此次演讲是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系列讲座的第三讲，由历史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研习营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此次活动。

丁教授将美国疾病史的研究区分为“内史”和“外史”两种类型。内史即医学界的医生与医史学家对各种疾病的研究，重视疾病病理与治疗技术的发展过程。外史则是医学界之外的学者对疾病进行的研究，主要关注疾病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以及疾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随着20世纪50—60年代“新史学”的兴起，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等各领域学者开始关注美国疾病史，有关疾病史的研究逐渐由内史向外史转型。

紧接着，丁教授以土著印第安部落为主体，详细分析了“美国疾病史”的发展现状。丁教授认为，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传染病导致患病与死亡，急性传染病对长期与外部隔绝的美洲土著而言是灾难性的；其次，疾病造成的人口锐减导致政治体制无法正常稳定地运转，印第安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其他部落进行重组；最后，疾病对社会文化造成重要影响。在外来疾病的冲击下，土著居民相应地采取各种手段应对死亡的威胁，他们一方面采取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应对传染病，另一方面还将欧洲引入的关于疾病的观念和治疗方法增加到印第安人的文化谱系中，将隔离、疫苗接种等外来治疗方法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内化成新的土著医疗与文化体系。

最后，丁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国学界对疾病史研究的情况，并针对研究现状提出了几点展望。丁教授认为，美国疾病史研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起步晚、成果分散，尽管有一些译介国外环境史和医疗史的作品，以及少量关于“世界疾病史”和“美洲疾病史”的学术论文已经问世，但就历史研究而言，这一领域依然属于“漏网之鱼”。从长远来看，疾病史一方面可以与传统史学相结合，用新的角度看待政治、军事和经济史，另一方面也应当进行社会与文化的转向，开辟种族、阶级与性别等方面的新路径。

#### （四）邢承吉：《“王子”与“贫儿”：“两个汤姆的悖论”》

6月28日晚上七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来我院做了《“王子”与“贫儿”：“两个汤姆的悖论”》（Madman and Sage: The “two Toms paradox” of the Early Republic）主题演讲。此次演讲是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历史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研习营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邢承吉立足于家庭视角，关注两个汤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言行，采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方法，从阶层（class）、性别（gender）和种族（race）三重维度全方位考察他们各自思想意识框架得以构建的社会基础，以二人的对比来挑战著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关于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论断。

首先，阶层维度上，杰斐逊出身上流社会，是美国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

主的儿子，自小生活富足、安逸；潘恩的父亲则是英国塞特福德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自幼家境拮据。如此“生而不平等”的人生起点使得两人在此后成长过程中的社交网络、受教育程度、金钱观念、工作环境以及美国革命前的处境天差地别。杰斐逊仿佛天之骄子，人生一片坦途；潘恩虽历经波折，却仍旧生活困苦。

其次，性别维度上，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杰斐逊要求女性具有整洁、勤劳的品性，善于持家，时刻心系丈夫的利益，并且无条件服从丈夫；潘恩则视上述观念为对女性的暴政，而始终对处于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抱有理解之同情。两人在对待家的态度上也大为不同。杰斐逊非常恋家，时常想念弗吉尼亚和他的庄园；潘恩则是一个四海为家、不知疲倦的战斗者，生活极简，而追求精神上的“天空之城”。

再次，种族维度上，两人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杰斐逊和潘恩都曾有过类似“人人生而平等”的表述，但前者在其有生之年蓄奴 600 多人，从襁褓到棺材，身边没有一天离开过黑奴。杰斐逊喜好任用严酷的白人监工代其管理黑奴，同时他自己也严格管控这些黑奴，对于逃奴绝不姑息。他仅公开支持禁止奴隶贸易，而从未倡导过废除奴隶制。反观潘恩，则是一个坚定的废奴者。他反对将黑人视为商品进行买卖和奴役，完全从人道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奴隶制。

总之，邢承吉认为，杰斐逊始终都未能跳脱出家长制，一直保有家长、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身份，潘恩却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推翻整个旧有体制，反对植根于社会有机体每一个角落的家长制。在此种语境下，伍德对于美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美国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家长制的活力转变为一种“全新的、真正激进的”体制，仍是不清晰的。事实上，“两个汤姆的悖论”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它激发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与人真的是平等的吗？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供稿）

## 首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举行

2018 年 6 月 30 日上午，首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315 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是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

研习营”的系列活动之一，主题为“奴隶制、种族与美国政治演变”。来自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十多名青年老师和博士生参与了此次工作坊，部分研习营的学员旁听了工作坊。

上午 8:30，工作坊准时召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做了主旨说明。他指出，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直到今日，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并在诸多层面影响和塑造着美国政治的演变，因此，我们唯有加深对美国种族政治史的研究，才能深入理解美国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谢国荣教授同时指出，此次工作坊只是“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的开端，希望美国史研究的青年同行们将工作坊继续进行下去，加强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以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上午 8:40 至 11:20，是工作坊的第一单元。与会的研究者围绕“奴隶制、种族与早期政治史”展开讨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李丹副教授论述了 1787 年《西北条例》第六条中的禁奴条款得以通过的原因，并分析了该条款对美国早期奴隶制问题演变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副教授认为，奴隶是 1787 年美国制宪辩论中的关键词，制宪代表中虽然无一人是奴隶，但奴隶的身影却无处不在。在制宪会议的几次关键辩论和妥协过程中，奴隶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奴隶以不在现场的方式，参与塑造了 1787 年美国宪法的众多重要条款。来自福建师范大学郭巧华副教授具体论述了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对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看法，并评价了此看法对美国早期司法体系的影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华以 1938 年邮件运动为例，分析了废奴运动对内战前美国政治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以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在阶层、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悖论为出发点，挑战了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关于美国革命激进性的观点。河北工业大学王海青老师以欧洲化、本土化、多元化的视角，论述了美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在上午的讨论中，工作坊的成员和旁听的研习营营员还就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奴隶制与美国早期政治的关系、托马斯·杰斐逊的种族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下午 2:00 至 5:30，是工作坊的第二单元。与会的研究者围绕“种族问题与二十世纪美国史”展开讨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伍斌论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移民“美国化”观及其影响。他指出，罗斯福或许非移民“美国化”理念的最好诠释者，但由于其特殊身份与罕有其匹的公众影

响力，使他的观念广为流传，进而引领美国大众的移民“美国化”态度，并间接影响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移民限额立法。中山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曹鸿论述了二战后美国的生育政治。他认为，在美国，生育与人口问题虽然关乎私人行为，却总是引发公众争议，与此相关的社会辩论与政治活动贯穿 20 世纪的政治舞台。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人们在战后纷纷组建家庭，生育率显著上升，出现了“婴儿潮”。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政府与公共组织的介入、社会生育道德观念的改变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美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一种声音——限制增长以应对人口危机。考察在此前后的“生育政治”，可以为理解美国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的此消彼长、国家政治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及博弈提供新的视角。太原师范学院讲师王宇翔系统分析了二战以来洛杉矶华人郊区化的过程、特征和原因，并提醒国内学者以种族和族裔的角度来深入研究美国城市史。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梁甲瑞分析了太平洋岛民迁往美国的动因、现状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张守慧论述了 1949 年至 1968 年间，美国的房地产商如何通过干预房屋的选址和设计、广告和销售策略等手段，推动在住房领域的种族隔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巩大松讲述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黑豹党针对都市黑人贫民的生存困境和联邦济贫不足所述实施的“生存计划”及其影响。

最后，工作坊成员和旁听的研习营成员就种族观念的界定、种族与美国现实政治的关系、种族问题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就如何将“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继续下去进行了诸多辩论。参会人员一致认为，此次工作坊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今后可多举办类似的活动，以增加学者之间的交流，帮助年轻学者成长。至此，2018 年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圆满结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供稿）



## 新书推荐



## 《大衰退与美国联邦财政改革》

**作者简介：**李超民，经济学博士，富布莱特研究学者（VRS, 2006—2007），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员，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史学系教授。师从中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教授，研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获博士学位（1998—2001）。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财税思想、政策与制度及中国经济思想史。关于美国研究的学术论著包括：《大衰退与美国联邦财政改革》《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古老的农夫不朽的智慧：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美国财税思想史与制度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大衰退（2007—2009）是八十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它发生的背景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急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变动与力量组合不断深化、美国霸权地位进一步衰弱及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场危机对联邦财政结构的影响极为深远，它造成了长期预算赤字的急剧增加，联邦债务十年内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一番，主权信用评级屡遭下调，强制支出刚性增加，缩减相机支出与临时支出难敌利益集团游说，财政收入结构失衡，个税与社会保障工薪税收占比过高，越来越多大企业跨国避税，致使国际税收急剧减少，财政收支长期失衡成为常态。尽管联邦政府试图用新思路解决美国经济“大衰退”，然而由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财税制度落后于全球化发展，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长期债务本金与债息负担难以消化，为爆发更大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因此“大衰退”是美国国力由盛转衰的重要关节点。全书从大衰退爆发后美国联邦财政结构的变化、联邦财政预算与奥巴马中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强制支出与社会政策改革、相机支出与国防费问题，以及对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收入展望等角度出发分为五个章节，描述了美国联邦财政的结构与大趋势，并指出了大国财政治理的经验与教训，顺应全球化潮流，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将是美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作者简介：**涩泽尚子，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1964 年出生于日本，青年时代移居美国。1998 年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主攻 20 世纪美国史和 1850 年以来的日本现代史。曾出版数部美国与日本史研究专著，《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荣获美国东北部畅销文化协会“彼得·C. 罗林斯图书奖”。

**内容简介：**美国在二战后迅速与日本建立了盟友关系。但是，这种战后对日政策，如何迅速博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从珍珠港事件开始的“死敌”到重要“盟友”，日本佬的形象，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剧烈的逆转？本书从“艺伎”形象入手，揭开一段精心运营的美国外交谋略史的秘密。

## 《美国与 1954 年危地马拉政变》

**作者简介：**舒建中，200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国际关系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政策，在《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与政治》《史学理论研究》《美国研究》《史学月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分别是《多边贸易体系与美国霸权：关贸总协定制度研究》《国际经济新秩序：历史与现实》《克莱顿：从世界棉王到贸易斗士》。

**内容简介：**1953—1954 年间美国密谋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计划”，是冷战渐次展开时期，美国维护后院稳定并遏制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这次行动堪称美国隐蔽行动的经典案例，标志着冷战展开时期，美国对外隐蔽行动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中央情报局甚至将这一颠覆行动视为未来进行隐蔽行动的“可靠样板”。

## 《美国与 1973 年智利政变》

**作者简介：**王爱娟，2017 年于南京大学获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现任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与亚太安全研究。

**内容简介：**随着冷战格局中美苏双方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美苏在拉美地区竞争亦十分激烈。古巴革命爆发后，美国担心智利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为了防止在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加紧了对自己后院的掌控，通过多种隐蔽行动，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颠覆了执政不足三年的阿连德民选政府。由此，智利开始了长期的军人专制统治。

## 《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作者简介：**约翰·马克·法拉格（John Mack Faragher），耶鲁大学亚瑟·尤诺布斯基讲席美国史教授，并担任霍华德·拉马尔边区和边境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有《西部驿道上的女性和男性》《糖溪：伊利诺伊草原上的生活》《丹尼尔·布恩：一位美国先驱的生平和传说》《美国西部：历史新释》。

玛丽·乔·布尔（Mari Jo Buhle），布朗大学小威廉·凯南讲席美国文明和历史荣休教授，专长美国女性史。著作有《女性和美国社会主义，1870-1920 年》《女权主义及其不满：一个世纪的斗争及心理分析》。参与编辑《美国左翼百科全书（第二版）》。曾任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现任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荣誉研究员。

丹尼尔·切特罗姆（Daniel Czitrom），曼荷莲学院历史学教授。著作有《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该书获得过美国历史协会处女作奖，并被译成西班牙文和中文。现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高级讲师。

苏珊·阿米蒂奇（Susan H. Armitage），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和女性研究荣休教授，曾任该校克劳迪乌斯和玛丽·约翰逊讲席荣誉教授。发表过大量关于西部女性历史的作品，参与编辑《女性的西部》《不堪重负：边区矿井和牧场上的女性》《书写荒原：西部女性世界的种族、阶级和文化》。与劳瑞·莫西尔合编《言说历史：1865 年至今的美国口述历史》。

**内容简介：**《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将宏观历史场面与微观历史事件完美结合，重点描述了美国不同区域的不同社群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历史，通过考察个人、社区、国家来展示美国的族群、地理和经济多样性，同时对于这些多样性的展示无不指向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尽管美国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族群，但它们都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也正是这些社群合众存异的结果。

## 《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史、加拿大西部史、世界环境史等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月刊》等报刊发表专题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著《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自然的边疆：北美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动物改变世界：海狸、毛皮贸易与北美开发》；合著《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译著《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与西部的开发 1896-1914》《共存与竞争：北美西北平原人类与环境的历史》；主编《聚焦枫叶国度》等著作。

**内容简介：**《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是我国首部从环境史角度对美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的专著，通过揭示被誉为“现代化样板”的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探讨近代以来美国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加深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建设发展与保护协调的生态文明，对我国和其他正在现代化道路上探索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镜鉴和应用价值。

## 《美国西部牛仔研究》

**作者简介：**周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近代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及研究工作。曾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和顾问。1983—1985 年赴纽约州立大学柯特兰学院做访问学者，主修欧美史，获硕士学位。2009 年赴艾奥瓦州立大学“农业和乡村史研究中心”做美国西部牛仔研究。独自承担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北京市教委项目。著有《牧畜王国的兴衰——美

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合著《近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首卷）等。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求是》《史学月刊》等刊物和《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 40 余篇。参编、参撰著作、教材、教参、工具书和论文集等 10 余种。

**内容简介：**《美国西部牛仔研究》是作者周钢 2006 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的姊妹篇，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支持，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美国西部牛仔研究》在结构上主要由前言、主体四章（马背上的劳工、美国的非裔牛仔、美国的牛仔罢工、牛仔的历史评价与热点论题）和结束语组成。重点研究了美国西部牛仔所处的艰苦工作和生活环境、在牧场里和“赶牛小道”上艰辛的劳作、所经历的各种凶险、长时间的鞍马劳顿、他们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上的限制，以及他们对美国的西部开发和美国现代化所做的巨大贡献。

## 《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 1》

**作者简介：**罗伯特·A.卡洛（Robert A. Caro）（1935— ）美国著名作家，两次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作品成为美国两百多所高等院校必读书。

**内容简介：**《林登·约翰逊传》详实记录了美国第 36 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一生，是了解 20 世纪美国政治、历史的必读书，被誉为“大师级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传记”。《林登·约翰逊传》第一部《权力之路》，内容截至一九四一年。林登·约翰逊出身于美国最偏僻落后的地区之一，穷困潦倒，所受的教育平凡无奇，但年仅三十二岁，就已登上国家权力舞台，不仅在国会占据一席之地，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自己的选区，被视为“洞察人心，具有极强领导力，操纵立法的天才”。三十二岁的约翰逊，其一生的主要套路已基本建立，并清晰地显露出来。他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天赋，以金钱为杠杆来撬动政界，获得权力源泉。他为自己清楚地寻找到一条通往权力的道路，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毁掉这条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与财富帝国……

## 《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

**作者简介：**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毕业于布朗大学，主修生物和环境研究。在耶鲁大学森林和环境研究学院获得环境管理硕士学位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环境政策和规划博士学位。多林曾任美国环保署项目经理，在美国和伦敦从事环境顾问，还担任过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和国会山实习生、国家海渔业服务局渔业政策顾问、《商业周刊》“推动科学大众媒体科学和工程学者”美国学者。多林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他对野生动物、环境和美国历史的兴趣。

**内容简介：**《皮毛、财富和帝国》为“野性北美·多林作品集”系列第一部。在本书中，埃里克·杰·多林记录了旧的皮毛贸易的兴衰。多林以河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讲述了欧洲各国，先是荷兰，后来是英国、法国，如何由于对皮毛的需求而前往美洲大陆，并在这片未“开发”的大陆上角逐、竞争。作者巧妙地用皮毛贸易的兴盛、发展及衰落为线索，将北美洲的发展变迁娓娓道来。

## 《海洋上的美国霸权》

**作者简介：**布鲁斯·卡明思（Bruce Cumings）生于 1943 年 9 月 5 日，美国负有盛名的东亚研究专家之一，曾任教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后成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1999 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研究员。卡明思的主要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国际史、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东亚政治经济和美国国际关系，他尤其对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抱有浓厚兴趣。2007 年 5 月，卡明思因其在民主、人权及和平研究中的杰出成就和做出的学术贡献，成为首位金大中学术奖获得者。

**内容简介：**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强国。它一面越过大西洋，注视着繁衍了美洲文明的欧洲文明，一面将目光投向广阔无垠的太平洋，寻找着新的交流契机。它曾是印第安人的福地，很早到来的白人笃信它是花园，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阿卡迪亚，更是实现梦想的乌托邦。



独立战争中，外来寻梦者决然斩断与欧洲母国的联系，之后便踏上西进之路。这是一项打破各种壁垒的创举，向西极大地扩张了美国国土，加快了奴隶制的瓦解。新增土地带来了农业的蓬勃发展，铁路、公路网络迅速打开，大坝提供了充足的水力与电力，新发现的石油如黑金般提供工业发展的动力，高校不断涌现为科技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保障……然而，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拓荒精神相伴的是剧烈的文明冲突：印第安文明大量消失，印第安人痛失家园；非欧洲移民虽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境遇凄惨，对于“民主自由”的口号像是一种讽刺。“昭昭天命论”悄然出现，并衍生为美国广伸触角的常用辩护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对其他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一战”和“二战”的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反而以军事需求刺激美国政府加大科研投入，更是让美国以正当理由在全球广布军事基地，战争结束后，它们便成了美国控制海洋的前哨。在国际化浪潮中，亚太地区国家的崛起与美国太平洋沿岸坐拥高新技术的各州遥相呼应。

著名历史学家、东亚研究专家布鲁斯·卡明思以开阔的视野和天马行空般的叙事，回溯了美国从欧洲属地发展为超级大国两百余年的历史，重点记录了西进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提出了具有创新性与挑战性的论点：美国与太平洋各国的联系对其未来的塑造作用，将超其与大西洋各国的联系，美国的命运终将与亚太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 《陷入泥淖：美国越南战争政策的演变 (1961—1968)》

**作者简介：**李连广，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南民族大学。主要研究兴趣为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世界民族问题等。

**内容简介：**1961年肯尼迪政府向南越派出特种部队，标志着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开始。约翰逊时期美国通过空袭北越和派出大量地面部队接手越南战争，完成了战争的美国化。但到1968年底，由于美国政府高层的分化、国内反战运动以及南越政权的动荡和战场形势的持续恶化，约翰逊政府被迫选择停战求和，越南战争开始降级。本书即以1961—1968年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演变为中心，以一系列相关的重大决策为主题，揭示美国如何一步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

## 《美国边疆、地域与西部：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史学思想初论》

**作者简介：**王邵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的成果有：《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边疆假说”的理论源起》《“后边疆”时代的“西部民主”传统》《美利坚式的“边疆”：词义源流及历史学家特纳的再阐释》《特纳的社会进化论》《特纳的历史教学与美国西部史研究》等。出版专著《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研究：政治文化史的视角》等。

**内容简介：**《边疆、地域与西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史学思想初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特纳史学思想研究”（13YJC770048）的结项成果。作者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本书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研究。“边疆假说”，是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产物。假说的作者特纳，生于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后的美国中西部。童年时代的白人家庭教育和生活经历，赋予这位史学家以深切的西部意识、边疆情结和爱国情怀。19 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巩固，各种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激励美利坚民族的进一步自立和发展，应对美国式的新的社会危机，需要以美国人自己的视角来重新解释美国历史。

## 《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

**作者简介：**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美国畅销书作家，普利策报道奖和艾美奖获得者。他的书《俄国人》（1976）和《权力游戏》（1988）都是畅销不衰的经典著作，并被选入美国大学课程。作为《纽约时报》的报道者，史密斯与“五角大楼文件”系列的其他报道者共享普利策奖，而后又因其 1971 到 1974 年对俄国的国际报道而独享普利策奖。他为美国公共广播制作的黄金时代特别节目，由于其对当今美国社会体系问题的监察以及他深刻的全面的解决提议而多次获奖。

**内容简介：**该书是史密斯发表于 2012 年的非虚构著作。虽然作者著作颇丰，并且屡获大奖，但他个人却认为《谁偷走了美国梦？》是他最重要的成

就。本书详细地解构了美国财富高度聚集的深层原因和美国中产阶级名存实亡的事实。美国梦，作为美国最显著的象征，它是由一系列富有和成功机遇所组成的理想和自由，以及通过努力可以攀登的社会阶梯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然而，如今美国梦变得遥不可及。本书从二战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开始着手，详细描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这段时期是美国梦的形成和繁荣时期。从这以后，美国梦开始面临挑战，并从九十年代开始解体，到2008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彻底消亡。围绕着美国梦，作者细致入微地透析了美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本书的可读之处就在于，虽然作者通篇都在解读美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但却避开了这些问题的繁冗甚至晦涩容易给读者带来的厌倦，采用了大篇幅的叙事手法，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例子，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洞见美国深刻的社会问题。

## 《美国秩序的根基》

**作者简介：**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1918—1994），美国政治理论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二战期间，曾在美军服役，并与自由主义作家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erson）建立了联系，后者在他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进入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并成为1953年这所学校唯一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柯克以其保守主义思想而闻名美国，其思想甚至影响了尼克松、里根等美国总统的施政方向。1989年，柯克被里根总统授予“总统公民奖章”（仅次于“总统自由勋章”的平民奖）。

**内容简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秩序的根基》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都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柯克却满怀希望地期盼美国秩序的复兴，将其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上下纵横三千多年，不无洞见地指出，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

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柯克念兹在兹的是，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那些永恒之道，而这些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

学术书评



## 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 ——评《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期的中美竞争》

牛 军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期的中美竞争》<sup>①</sup>(以下简称《赢得第三世界》)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中美在冷战时代如何在第三世界全面争斗的著作，其系统性的论述足以证明作者得出的关键结论：中美在第三世界展开的旷日持久和内容复杂的争斗“在塑造冷战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②</sup>这本书开篇那句话令人印象尤为深刻：“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21世纪人类的命运的影响更大”，不少人“担心中国会散播一种会从根本上削弱美国试图维护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sup>③</sup>这引起我猜想，在20世纪冷战爆发的初期，是不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定义美苏关系的？可以确定的是，对当下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定义和想象等，必定会引导研究者更加关注并重新研究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历史。当然，这也给研究者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避免对历史的叙述和解读过于满足“当下”的想象。21世纪毕竟还有80余年，最终谁主沉浮并不是笃定的，例如在20世纪前的30多年里，并没有人断言美利坚将主导20世纪后半叶。

### —

这本书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它反映了这些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趋势，即更加关注美苏对抗的全球性扩展、特别是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南方”发生的各种复杂的争斗。书名就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国际冷战史研究新趋势的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著作、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文安利(Odd Arne Westad)教授的名著：《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那本书前所未有地系统阐述了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争夺，以及那些国家对美苏干涉的回应和后果，从而展示了两个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互动如何

<sup>①</sup>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以下简称为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up>②</sup>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1.

<sup>③</sup>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Introduction, p. 1.

塑造全球冷战的历史及其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sup>①</sup>《赢得第三世界》通过对中美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及其影响冷战进程的叙述，告诉读者除美苏之争之外，中美两个巨型国家也在第三世界展开了持续不断和有时十分激烈的竞争，它们的争斗对冷战向第三世界蔓延、对一些亚非国家的命运，以及对加剧中美对抗的烈度和复杂性的影响，等等，也同样是很深刻的。这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为已经被描绘的色彩异常丰富的全球冷战历史图画，补充了一抹新的色彩。

除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贡献，《赢得第三世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也是一个有标志性的新成果。这本书超越了以往对这段中美关系历史的叙事，它没有再专注于冷战 40 年间中美之间诸如战争、冲突、危机管理、秘密外交、领袖人物如何英明或愚蠢等等高端政治的叙事，尽管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的公开，这种传统的研究也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巨大空间。《赢得第三世界》对中美在第三世界竞争的叙事内容丰富，不仅有战争，还包含了外交、文化、经济援助、游击战、和平队和医疗队、输出不同的企业经营方式，以及背后的动机与经济模式，等等。这样的研究的确丰富了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

此外，这本书将中美之间有关安全、对外决策等高政治之外的一些看上去是具体、繁杂甚至有些碎片化的历史故事，整合到围绕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个核心概念构建的框架之中，从而展示了它们或许同样反映了当年那些历史人物们的远大抱负，以及也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读者也因此更容易体察到，以往一些个案研究还可以在不同的框架中重新解读其重要价值。例如，冷战时代两国尤其是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是如何将不同领域的一些繁杂的对外行动组合在一起，服务于提升或维持本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和在亚非地区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等宏大的目标；以及他们如何确信那些努力将会使第三世界变得符合自己的理想或对本国更有利。当然，这本书也证明了，中美领袖们的很多努力实际上都未能如愿，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在印度支那军事干涉的彻底失败，以及中国在东南亚支持革命运动的努力（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最终未达目的，等等。

《赢得第三世界》的叙事贯穿了整个冷战的 40 年。作者循着历史的演进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逐步描绘了中美在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先是在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之后扩展到对双方都很遥远而广大的非洲——展开争斗的画卷。作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尤其是中国，在如此长时间和

---

<sup>①</sup> Professor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大范围展开竞争的核心动力，就是如何赢得或保住它们各自在第三世界的“地位”，而它们之间这类争斗之所以独特，同作者的这个观点有重大关系：“如果说伟大的权力伴随伟大的责任，那么伟大的地位就伴随伟大的义务。”<sup>①</sup>这的确是一种新的思考和视角，说明在中美对抗中除了权力政治、意识形态，还有更丰富的和值得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这本书不仅利用了很多新发现的美国档案，同时也利用了许多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以及其他一些中方的历史文献，这使得中美双方的资料看上去比较均衡一些，对两国有关政策和外交互动的分析也相对均衡。这有助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中美双方尤其是中方政策的具体指向和实际影响，包括可以立刻通过具体的对比，来验证两国决策者们对对方行为的理解是否准确和应对措施是否合理，以及中美在第三世界争斗的一些特点。这种力求对中美双方做相对均衡的叙述，有助于弥补以往诸多论著对中国政策的论述通常都相对薄弱的缺陷。当然，一本著作尚不能根本改变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形成的这种不合理状态。迄今为止，现代中美关系史研究中，还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对中美双方做出真正均衡的叙述的著作。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档案开放程度很有限，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

## 二

由于我是中国读者，并且正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这本书基于中国历史文献对中国政策和行为的叙述引起我更多的关注。基于同样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中美之间围绕“世界地位”展开的争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定义的冷战对抗有关？或者说在哪个阶段，与冷战的关系更直接、更紧密？特别是考虑到中苏分道扬镳之后，中国在苏联阵营之外的那些特立独行甚至是以苏联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对外行为，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在“冷战”框架里能否解读清楚中美“争斗”的历史含义？换句话说，在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另立门户后的一段时间里（大致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美之间的对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争斗，在本质上是不是冷战的一部分？或者说，中美（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行为各有其内在的历史根源和逻辑，只不过因为发生在美苏对抗所构建的国际体系中，而（在某个阶段上和某些重要的方面）被赋予了一些冷战的含义？这些都还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答案或许有助于厘清：今天越演越烈的中美竞争在多大程度上根植于冷战体

---

<sup>①</sup>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47.

系；或者相反，有没有冷战，中美围绕“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争斗都会发生，并必定要遍布全球，而冷战只不过给中美争斗提供了阶段性的场景和某种外观而已。所以，站在冷战体系和传统的冷战教条之外看冷战中的中美关系，特别是更系统地解读指导中国人对外行为的观念历史，是有重要价值的。例如，中国政治精英即使在冷战时代，其实也很少使用“冷战”这个概念来解释他们眼中的世界。

根据《赢得第三世界》的阐述，追求“国际地位”是中国在第三世界各种对外行为的核心动力，或者至少是核心动力之一。对这个核心概念需要分出两个层次并分别加以阐述。第一个层次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如何定义中国应当在国际上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包括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和由于这种地位在近代受到列强的打击而留给中国精英的所谓“屈辱”意识，<sup>①</sup>以及中国在由斯大林领导的、后来被认为是赫鲁晓夫背叛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这本书叙述的这个阶段，中国人对这种“地位”的那些历史性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合理的？

第一章尤其是第二章的内容，实际上都包含了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恰恰是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斯大林决定性的介入中共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对斯大林赋予中共担当国际共运亚洲领袖使命的欣然接受等，共同导致了在建国伊始，中国领导人就将在亚洲地区拥有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作为一种认同和历史义务，并据此采取行动，包括组织、训练一些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和支持亚洲的革命运动。<sup>②</sup>这种做法后来也扩展到一些非洲国家。包括这本书第二章在内的诸多研究证明，这种义务感和使命感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几乎立即介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也是导致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关键原因之一。结果是“地位”不仅“伴随着义务”，也是一种“负担”，或者说这些都是一个东西的不同说法而已，至少在有些个案中就是如此。例如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向朝鲜提供了巨大援助，而且这种援助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今。反观美国，在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杜鲁门政府决定拖延谈判并将战争继续打下去，其目的之一，也就变成了“阻止中国加强其在亚洲的地位”。<sup>③</sup>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承担着保卫韩国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个层次是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在历史中和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的

①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Introduction, p. 6.

②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p. 40-41.

③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54.

定义等，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他们当时是否认为，为追求所谓“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与美国对抗是必须的？还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损害了他们追求的“国际地位”这个战略目标，才导致他们决心与美国对抗？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的问题。一些历史书写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与美国的对抗、战争和后来在第三世界的争斗等，从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似乎并非如此。就这本书前两章叙述的历史看，朝鲜战争不仅成为事关两国“国际地位”的战争，而且导致了中美在第三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走进了零和游戏的恶性循环，是这场战争“播下了一场无休止的长期争斗的种子”。<sup>①</sup>事实是朝鲜战争最初既非中美两国发动，也不是他们预期的。由此可以设想，如果金日成没能发动那场战争，中美关系至少不会是那么紧张尖锐的长期对抗，甚至更早建交也并非全无可能。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来争取改善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从而揭开了中美在亚非国家展开新一轮争斗的大幕。随着中国的外交努力扩大到第三世界和美国几乎在每个地方和每个领域都试图抵消中国的影响，中国与美国的对抗至少看上去变得更加系统和全面了。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大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解决国家认同这个关系到国际地位的根本性问题。这里顺便说明，我认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国家特性的认识是有连续性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就提出，“承认中国居于四强地位，将足以阻遏那些有关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以及可以限制俄国人的野心和“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sup>②</sup>这种对中国国家特性的认知在当时是相当系统的，只不过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后来所起的作用与美国人的期待恰好相反，这同冷战爆发和美国与中国走上对抗之路有莫大的关系。

这里不打算深入评论美国的认识和政策，这方面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著，《赢得第三世界》的有关论述也是比较系统和成熟的。关于中国方面，既然断定中国领导人谋求提升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关键动力，就需要解释他们的世界观，包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和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历史命运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这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上面提出的问题，以及更好地确定，中国谋求在亚非国家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到底是属于苏联亚洲战略的组成部分，还是更多的反映了

<sup>①</sup>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46.

<sup>②</sup> 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50), p. 186.

中国复杂多样的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在这方面，更系统解读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关键内容。这本书在第一章就已经指出，毛泽东在1946年夏季提出的这个概念会对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以及在那里与美国的竞争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①</sup>实际上，在之后每次中国对外政策发生阶段性变化时，毛泽东都会重提这个概念并赋予新的解释，包括重新界定中国不同于世界上所有各种类型国家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概念最初产生于战后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的时刻，毛泽东试图通过重新描述世界政治图景，从而证明中共应该奋起打败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并进一步夺取全国政权。他当时向中共领袖们解释说，世界分成了三个部分，即美国阵营、苏联阵营和它们两家之间的“广大的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的人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决定世界政治走向的最关键的力量，而中国就站在这里，所以中国革命也就是一种决定世界政治前途的力量；反之，美国为了统治全世界而反对和镇压那里的人民革命，所以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sup>②</sup>“中间地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建国前后那个阶段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和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因为一年之后，1947年秋季，为了与苏共提出的“两大阵营”理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概念在中共话语系统中消失了八年之久。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中国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时期，毛泽东才重新提出了他的“中间地带”概念，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中国即将开始在亚非地区展开的外交攻势提供理论支持。<sup>③</sup>《赢得第三世界》的第三、四章和第五章的一部分等所叙述的内容，正是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思想的重要背景，也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的外交实践。这几章在叙述中国对亚非新兴国家的政策和发动“和平攻势”时，阐述了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sup>④</sup>以及在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sup>⑤</sup>的过程和意义，这反映了作者对这些思想原则的历史含义的理解深度，也更有助于理解“中间地带”思想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①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39.

②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1194页。

③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④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78.

⑤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100.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周恩来之所以在中印谈判开始的前夕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是因为两国关系中同时存在包括西藏、贸易、不同的社会制度、领土争议、如何处理 1949 年以前的有关条约赋予印度在西藏地区的特权等复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印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中是最复杂的，对于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有典型意义的。

1954 年春，中印谈判的成功使两国领导人都相信而且也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也完全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处理亚非各新兴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希望将“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基础”来推动和维持亚非新兴国家的团结，从而有利于亚非构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sup>①</sup>后来的发展证明，既然当初“五项原则”是针对中印关系而提出的，它在亚非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尤其是否具有被实践的意义，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例如在万隆会议上，它就未能被各国接受，因而无法写进会议的宣言，它的一些内容被分别写入文件的不同条款。此外，中印两国在 1962 年秋季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战争，这场战争证明，“五项原则”甚至都不能约束住两个倡议者不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里顺便指出，包括这本书在内的很多论著都将“求同存异”归功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一次著名讲话中首创。<sup>②</sup>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本人在 1954 年 10 月尼赫鲁访华期间，就首次向后者系统阐述了这个原则。<sup>③</sup>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机智地在临时准备的发言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使之得以在更大范围传播，并收到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

第三、四章和第五章一部分内容叙述了中国在亚非新兴国家中展开“和平攻势”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这似乎证明，至少在这个阶段上，更缓和的政策更有助于中国提升在亚非的“国际地位”。反观美国，根据艾森豪威政府的评估，他们在这个阶段上为阻止中国扩大其影响力的“和平攻势”所进行的各种努力，效果要差很多。<sup>④</sup>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这样巨大体量的国家一旦结束内部的争斗，政局保持稳定和经济获得发展，必然会对外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包括其发展模式对新兴国家会产生某种吸引力，而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很难阻止的。这本书也证明了，杜勒斯在这个时期针对中国“和平攻势”采取的各种措施很难奏效，而导致中国后来遭受

①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96, 131.

②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100.

③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 年 10 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61—362 页。

④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131.

重大挫折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其自己的政策失当。例如，第六章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从1958年开始走上“激进化”，其后果给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外交努力带来了更多的困扰，其中包括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流产、中苏同盟破裂，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九·三〇”事变，等等。

随着中国在亚非地区对外行动的大幅扩展和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逐步升级，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益强化。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又一次用他的“中间地带”概念描绘了世界政治地图。在他的新论述中，所谓的“中间地带”被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这一方面为中国同法国等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发展关系提供了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更凸显了中国领导人对亚非国家“革命性”的强调。<sup>①</sup>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的新解释固然是在呼应同苏共中央论战中形成的一套激进的世界革命纲领，同时也是为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方针。

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他们为在亚非地区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与推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这种政策同当时美国的政策一样，都是加剧两国在第三世界争斗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反映在第八章。作者在本章首先叙述了同“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争论和第三世界国家如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等通过武装斗争（这在美国看来是暴动）取得政权等，都极大激励了中国领导人，并大幅提升了他们对革命运动尤其是武装斗争的支持和期待，促使他们下决心更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向第三世界推广中共的武装革命经验，这在中国印度支那政策中的表现尤为典型。对于这类争斗在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中的重要影响，应给予足够的估计。例如，中国对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支持和援助等，严重强化了它将第二次亚非会议视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的倾向。1965年春，当越战紧张升级时，中国甚至提出要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办成一个“审判美帝的讲坛”。<sup>②</sup>

根据《赢得第三世界》的叙述，在支援越南南方武装斗争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亚非国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并针对非洲国家提出了诸如“关于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等具有很高道义水平的经济援助指导方针。<sup>③</sup>这当然同美国在非洲的竞争有直接关系，不过促使中国如此积极和

①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9页。

② 《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5年5月7日，外交部档案馆：编号：106-01319-04，第19—21页。

③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 273.

主动地加入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国际经济援助潮流，并不仅仅是为了建立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在那里面临的竞争者要复杂得多。例如“八项原则”并不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提供不附带政治条件和自认为更符合非洲国家需要的优惠援助，在亚非国家中获得压倒苏联的道义优势。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在非洲还不得不应付来自台湾的竞争，台湾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大陆争取获得更多外交承认和孤立台湾当局的外交战略的成败。此外，不结盟运动也被视为竞争对象，尽管这方面所占比重并没有那么大。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和其他外交活动，同样也是为了达到多重目标。仅就中美在这些国家的争斗而言，中国要应付更多的竞争者这种状态，相对地减轻了美国的压力，这也是合逻辑的。作者如果能进一步界定中国各种宣传和行动所针对的不同的竞争者，肯定有助于厘清中美“争斗”的特点、程度和范围。

### 三

通读了《赢得第三世界》，有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即美国在亚非国家针对中国的争夺和斗争等行为，到底是不是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更别谈是全力以赴的，特别是比较美国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就像《全球冷战》所描述的那样），毕竟苏联才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外交活动，都是由总理周恩来亲自率领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20 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支那的外交活动包括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的几次访问。反观美国，在同时期，较高级别的外交行动从未达到与中国相当的水平，次数更无法相比。1965 年印尼“九·三〇”事变前一段时间，中国高层领导人相当频繁地访问印尼，接待对方的高层访问，而美国人很多时候看上去是在忧心忡忡地分析形势，尽管这一时段出台的那些分析报告富有逻辑，条理清楚。至于中国在 1965 年为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长时间出访亚非国家。美国所做的则是国务院相关部门提交了看上去逻辑尚属严谨的分析报告，以及驻在相关国家的大使们与所在国层级不同的领导人谈话，等等。这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行动至少在级别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的确，中美双方的外交争斗不是在每个时间段上都是对等投入的，在一些地方甚至一直就不是对称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有更多的财力和更多正式的外交渠道，但中国领导人显得比美国领导人更关注亚非地区事态的发展，

有更多的高级别访问。当然这也同当时的境况有关。当时中国有限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实力等限制了他们难以在更大的范围采取行动。尽管并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获得有时看上去比美国更主动的国际地位和更显著的成就，就是因为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参与；也不能证明这种领导人级别很不对等的外交活动一定有助于中国在第三世界战胜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进一步厘清各种变量的相互关系和所起的作用，还是有助于理解“领导地位”的获得和巩固到底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例如越来越受到学界青睐的所谓“软实力”，在何种条件下才是奏效的。

以上只是就本人感兴趣的部分表达了一些看法和评论，实际上这本书的很多论述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对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是有启发的，而关注今天和未来中美关系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本来就是作者展开这项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作者在全书结束时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在回应开篇的历史性判断和担心。他的结论似乎不那么乐观的，即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和争斗”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兑现将（给第三世界）带去稳定与繁荣的承诺”。<sup>①</sup>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中美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左右当事国的事态，那些国家自身的状态起着更关键的作用，最有代表性的如越南战争、导致 1965 年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的阿尔及利亚政变、印度尼西亚的“九·三〇”事件等。今天，当中美共同站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两个国家的政策精英们是否已经和会不会继续从冷战时期的“争斗”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呢？世界在期待他们给出鼓舞人心的回答。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8 年第 1 期

---

<sup>①</sup>Winning the Third World, P.354.



# 阿米塔·阿查亚：构建一个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对《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的思考<sup>①</sup>

罗圣荣 杨飞

肇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学界关于国际体系变迁、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重塑等问题的研究开始呈“井喷之势”，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约瑟夫·奈（Joseph Nye）、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harya，又译阿米塔夫·阿查亚，他也使用中文名安明博）为代表的诸多学者纷纷给出自己的思考与答案。<sup>②</sup>其中，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以历史为主线，试图在历史脉络中探索多极均势的可能性。约瑟夫·奈的《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则立足当下，对“美国衰落论”展开反驳。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侧重未来，对可能出现的世界秩序进行展望。那么，阿查亚在该书中提出的是一种怎样的世界秩序构想？其思想渊源是什么？该书最大的特色和不足又是什么？世界秩序的构成中，变的是什麼，不变的又是什么？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 一、阿查亚的世界秩序构想

一般而言，秩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sup>③</sup>是“无序”的相对面。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国际秩序是追求国际社会

① 本文为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国家安全战略影响及对策研究”（15ZDA064）阶段性研究成果。笔者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郑先武教授及云南大学李晨阳教授给予的指导意见，同时非常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文责一概由笔者自负。

② 详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版；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罔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年版；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秦亚青：《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 年版；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08 等。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1681 页。

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而世界秩序是人类活动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的目标。<sup>①</sup>鉴于此，国际秩序强调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追求国家间基本秩序；世界秩序（抑或全球秩序）则涵盖所有行为体，侧重各行为体的共同规范与结构。<sup>②</sup>冷战后，结构上趋于“美国单极”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观挟全球化之势试图席卷全球。当下，面对世界权力中心新的变迁，世界秩序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尝试对此进行回答：即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不管美国衰落与否）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观走向终结，未来“世界秩序”将是一个由“地区秩序”构成的多元复合式世界。而从秩序结构与秩序观两个维度对此进行分析，对于理解该书裨益颇大。

### （一）理念上：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

就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观而言，经济上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践行宪政、民主，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特点，将其推广到全球则构成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主要内容。这一源自西欧的地区性秩序理念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秩序理念，与西方大国自身实力在近代以来的快速提升紧密相关。囿于此，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观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不是市场、宪政及民主等自由主义秩序理念的彻底消失，而是重回地区性秩序地位。

#### 1. 自由主义霸权的神话

就秩序观而言，阿查亚论述相对较少，态度也不甚明确，对于可能出现的秩序观缺少进一步的思考。阿查亚在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中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三个主要的支柱：相互依存、多边机构和民主”。<sup>③</sup>在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在遏制冲突方面的局限性，大国对多边机构的操控，以及“民主扩散”的失败，致使阿查亚认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只是一个神话。他对此进一步阐述到：其一，“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从未真正地扩展到全球，即使冷战后中国、越南等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对于美国的政治、

① 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的基本、主要和普遍的目标是：第一，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存在；第二，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第三，以和平为目标；第四，满足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详见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2页。

② 笔者认为地区秩序其实指地区性的国际秩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主流。纵览人类历史，秩序其实由结构与理念共同构成。结构是一种权力性的框架，反映主要行为体的能力分配。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共识、理念，或者布尔所说的基本目标，秩序是很难维持的。

③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4), p. 44.

经济理念也未全盘接受；<sup>①</sup>其二，由于美国在现实中的双重标准或是强迫手段，国际社会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质疑声一直存在；其三，美国霸权的“仁慈”，被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完全证伪；其四，美国在世界秩序建立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观点，不仅是对美国行为的夸大，也是对其他行为体作用的忽视。由此，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治理规范，抑或“霸权”式治理方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 2. 新兴大国：新秩序观的塑造者？

纵览全书，阿查亚对“新兴大国”或“崛起大国”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共同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金砖国家”“灵猫六国”（CIVETS）“经济突破型国家”（Breakout Nations）“迷雾国家”（MIST）等概念的提出是商业咨询公司进行自我推销的营销策略。他认为，对新兴国家热烈的讨论忽视了两大问题：一是新兴国家愿望和能力之间的差距，例如，二十国集团一般被认为是新兴大国平等地与传统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的标志，更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标志，但在后续发展中，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治理成效一直饱受诟病；二是新兴国家集团的代表性、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如伊朗、埃及等地区大国即被排除在二十国集团之外。

## （二）结构上：单极世界秩序的终结

在阿查亚的思考中，“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主要是指“单极时刻”的结束，亦即“霸权式治理方式”与“单个大国主宰全球时代”的结束。<sup>②</sup>约瑟夫·奈曾将世界政治的结构比作“复杂的三维棋类游戏”，<sup>③</sup>而阿查亚则将其比喻为“多厅影院（multiplex cinema）”，即在同一个多厅影院里，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剧场可以放映不同的电影。阿查亚认为，一方面，在“复合世界中，秩序的建立和管理更为多样化（diversified）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其他国家、全球和地区实体，以及跨国非国家行为体

① 可以说，基辛格、约瑟夫·奈和阿查亚在“美国从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秩序”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基辛格认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约瑟夫·奈则指出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群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分别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序言第6页；Joseph S. Nye,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2017.

②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 4.

③ 约瑟夫·奈认为，棋盘共分三层，顶层是军事实力，是单极结构；中层为经济权力，是多极结构；底层是由跨国或跨境业务构成，权力是混乱的、分散的。详见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2010, pp. 2-12.

都会参与其中”。<sup>①</sup>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等新兴大国是新世界秩序建设的直接推动力量,但再也达不到美国曾经拥有的统治地位,单极模式的世界秩序在未来世界将难以再现。基于此,本文从复合世界与多极世界、单极稳定与单极幻想、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三个方面对阿查亚的相关论述展开梳理,这将有利于理解作者所提出的“单极时刻终结”这一论断。

### 1. 复合世界与多极世界

“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经常被认为是“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的另一种表述。但在阿查亚看来,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侧重于分析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后者则强调大国权力的分配关系。<sup>②</sup>更深层次而言,前者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演员”与“观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世界,而后者仅是体系层次单向的权力分配结构。基于此,阿查亚从权力、地理范围、领导力和时间四个维度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提出自己的设想。首先,权力维度主要是指国家“硬实力”的重新分配,以新兴国家为例,中印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于权力分配将构成新的挑战;其次,在地理维度,基于文化多元的地区秩序在未来世界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再次,在领导力维度强调秩序的质量、活力与合法性,即未来世界秩序要求秩序自身具备更强的吸引力;最后,在时间维度,伴随时代环境的变迁,任何秩序的存在都是有时间限度的,因此当前不用恐惧于“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概言之,多元复合的世界将由多个关键行动者组成,他们的关系由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所界定。<sup>③</sup>即在“复合世界”中,舞台不只属于大国,同样属于其他各类行为体,也不存在单一的秩序选择,而是多种秩序选择并存。

### 2. 单极稳定与单极幻象

面对关于“单极时刻”的众多争论,阿查亚对其存在的支持与批评两方面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并进一步论证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结构上的“单极”秩序将很难再现。单极稳定论的支持者主要是霸权稳定论者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霸权的存在对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具有重要作用。单极幻象论者则认为“单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力量变迁的必然,由此导致的“某国主导”地位只是暂时的。阿查亚对“单极稳定”与“单极幻象”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后,指出二者存在的相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p. 7-8.

<sup>②</sup>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 9.

<sup>③</sup> Amitav Acharya, “The Post-American Multiplex World”,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17,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mitav-acharya/new-global-order\\_b\\_5582935.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mitav-acharya/new-global-order_b_5582935.html), 2017.11.20.

似性：其一，国际秩序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大国权力的分配）决定；其二，结构是静态的、狭隘地强调“稳定”；其三，世界秩序的认识常常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基于以上三点，阿查亚认为，就体系结构而言，大国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稳定”的破坏。<sup>①</sup>相反，它可以更好地抑制冲突、促进国际合作。与此同时，阿查亚重点突出体系结构的变迁性，以及非西方历史经验对于世界秩序塑造的重要性，为此他尤其重视不同于欧盟的东盟一体化进程。

### 3. 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

当下讨论“单极”，其实质就是讨论美国的兴衰，“单极世界秩序”的终结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实力的衰落（不管这种衰落是绝对衰落还是相对衰落）。在西方学界，对于美国的衰落普遍持有一种担忧甚至恐惧，即害怕国际社会可能陷入对抗不断加剧的无政府状态。关于中国的崛起，阿查亚并不认为随着“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就能够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填补权力空缺。阿查亚指出，这些新兴国家之间缺少团结、远见及地区合法性，使得它们很难提供一种新的方式建构其世界秩序。换言之，崛起的中国虽然对于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其自身只是未来地区性世界秩序中的一种。囿于此，“单极世界秩序”的终结在阿查亚看来是必然的，不管是衰落中的美国还是可能重新崛起的中国，都不可能再现往日的“霸权辉煌”。<sup>②</sup>

## （三）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构想

“复合秩序”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相互联系的文化多样性世界中的一种政治秩序。<sup>③</sup>一个多元复合的世界将拥有多层权威与领导力，而尤其重要的是区域、区域大国和区域机制的作用。<sup>④</sup>在“后美国”时代，阿查亚认为世界秩序可能出现两种秩序路径，一种是地区世界模式，另一种是大国协调模式，二者将共同发挥作用。

### 1. 地区世界模式

阿查亚认为，地区、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将在复合世界中占据中心位置。<sup>⑤</sup>

① 阿查亚本人对结构(权力分配)虽持怀疑、批判态度，但为了理解的便利性仍然使用这一概念。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分析跳不出这一概念的窠臼，很难彻底摆脱其局限性。

②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14—25页。

③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 113.

④ Amitav Acharya, "From the Unipolar Moment to a Multiplex World", *Yale Global Online*, July 3, 2014, available at: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unipolar\\_moment\\_multiplex\\_world](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unipolar_moment_multiplex_world), 2017.10.26.

⑤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第21页。

需要强调的是,阿查亚的“地区”并非固定的地理或文化实体,而是由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动态互动而成。<sup>①</sup>阿查亚之所以用“地区世界”这个词作为隐喻,是为了更好地捕捉世界秩序的多样性、基础及其驱动力。<sup>②</sup>因此,地区主义构成了地区世界模式或者地区秩序的关键。不同于以往由大国主导的地区主义,阿查亚信奉的“新地区主义”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即地区机构的建立与维持由多个大国协商推进,其理念与路径由多个行为体共同推动。阿查亚的“新地区主义”是对西方传统观点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地区秩序往往由大国权力主导建立,是所谓“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地区”。当前而言,地区秩序也是地区国家应对全球化冲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抵抗“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等级固化的有效途径,它能保证边缘国家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 2. 大国协调模式

大国协调主要是指大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协商治理。阿查亚在书中指出大国协调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建立同样重要,但是由于阿查亚更为看重地区世界模式,故对大国协调模式着墨甚少。当前,新兴大国集团的代表性、合法性危机,可能的“霸权地区主义”,以及新兴大国集团内部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协调本质上的大国俱乐部性质,使得阿查亚认为地区世界秩序更加符合“多厅影院”的比喻。而复合世界秩序是大国协调模式和地区世界模式的混合体,既可以缓解全球精英主义风险,又可以避免全球碎片化。这一思想也正是基于“所有的全球政治都是局部的”和“多样性中的统一”这一理论假设。<sup>③</sup>

## 二、阿查亚“复合世界”的思想渊源

无论是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抑或是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阿查亚的研究主线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即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区主义,主张构建基于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复合世界”(地区秩序)。追溯阿查亚“复合世界”(地区秩序)的思想渊源,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构想。

---

①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 80.

② Amitav Acharya, “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lex World”,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 p. 6.

③ Amitav Acharya, “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lex World”, p. 6.

## （一）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

不可否认，建构主义一直是阿查亚“复合世界”研究中最重要理论支撑。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阿查亚极其擅长将理论研究与问题分析结合起来，理论以问题为导向，为问题提供分析框架，而问题又反过来验证理论。“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东南亚研究中只注重描述性的介绍和片言只字的资料堆积不同的是，阿查亚富有说服力地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sup>①</sup>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强调物质以外的文化、规范对于国际行为体的重要影响。作为建构主义的信奉者，阿查亚一直以来将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共同体建设、规范建构及扩散作为其研究的核心主题。<sup>②</sup>阿查亚从提出“本土化”和“辅助性”作为世界政治理念与规范扩散研究的框架，再到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共同提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sup>③</sup>其中的建构主义理论色彩一直十分浓厚。同时，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规范、观念、文化等要素也是其反对国际关系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最为有力的理论武器，更是其地区主义、地区秩序研究的重点所在。基于以上分析，也就不难理解阿查亚为何在“复合世界”中一直强调主体的多元化、身份互动和规范社会化，这与其建构主义理论视角的偏好不无关系。

## （二）地区主义的研究旨趣

地区世界模式源于“地区主义思想”，而这一思考与阿查亚的身世和人生经历紧密相关。首先，阿查亚出生于印度，并在印度和澳大利亚接受教育，最终与一位华人结为伉俪。而印度、中国本身即是宗教文化相对多元的社会，这一点对阿查亚的思想形成影响深远，使其对地区多样性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与感性认知。其次，阿查亚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了12年，被认为是世界上东南亚和亚洲事务的顶尖专家之一，尤其是他对东盟的持续追踪与深入研究，促使他对地区主义思想的认同不断深化。<sup>④</sup>诚如阿查亚自己所言，“地区世界

① 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载（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序第21页。

②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4); *Rethinking Power, Institutions and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Politics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④ Amitav Acharya, Biography, at: <http://www.amitavacharya.com/?q=content/biography>.

思想的实质无疑建立在我早期关于规范扩散和地区秩序研究的工作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通过亚洲和比较地区主义的工作来阐明和鼓励这种新观点。”<sup>①</sup>因此，阿查亚“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构想是对其早期地区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扩充与发展，不管是秩序的主体、还是秩序的内容都更加多元和“非西方”（并非否定西方，而是强调非西方世界的主体作用）。最后，地区主义研究一直是建构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重点领域，约翰·鲁杰（John Ruggie）、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人的早期成果无疑为阿查亚的地区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阿查亚与卡赞斯坦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后美国时代”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性秩序，后者侧重一种镶嵌于美国霸权之下的地区性秩序。<sup>②</sup>

### 三、《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的特色与不足

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自刊行以来，因其独特的视角、新颖的结论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认为阿查亚的观点发人深省，对于世界秩序的一些关键要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sup>③</sup>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同样指出，“本书用批判的眼光、平实的语言，描绘了美国衰落之后世界秩序的可能图景”。<sup>④</sup>巴西热图利奥·巴尔加斯基金会（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FGV）的助理教授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强调“阿查亚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他的观点既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例如该学科的绝大多数领先思想家），也不是反美的。”<sup>⑤</sup>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助教伊戈尔·科瓦奇（Igor Kovac）认为，该书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学界关于美国衰落的又一轮辩论，而在辩论中，很少有作品比得上阿查亚的表述清晰，<sup>⑥</sup>其观点将为外交官和政治家提供很好的参考。<sup>⑦</sup>然而，任何的研究或都难以尽善尽美，《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自然也存在一些不足。美国普林斯顿大

① Amitav Acharya, “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lex World”, p. 6.

② 详见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4页。

④ 王缉思：《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名人推荐，参见网页：[https://www.amazon.cn/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阿米塔·阿查亚/dp/B01NAN6823/ref=sr\\_1\\_2?ie=UTF8&qid=1509359866&sr=8-2&keywords=美国世界秩序](https://www.amazon.cn/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阿米塔·阿查亚/dp/B01NAN6823/ref=sr_1_2?ie=UTF8&qid=1509359866&sr=8-2&keywords=美国世界秩序)。

⑤ Review by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Jun 2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postwesternworld.com/2014/06/20/review-american-acharya/>.

⑥ Review by Igor Kovac,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1 (2016), p. 78.

⑦ Review by Igor Kovac, p. 79.



学知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教授就指出，“该书没有认识到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在国际治理机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不适感，以及它们对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理想的支持，这种秩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国’，而是数十年来多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和议程中角力所形成的。”<sup>①</sup>

## （一）本书的最大特色

阿查亚的观点对于长期思考或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或许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震撼，但其以简洁的语言、深刻的论证、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复合多元”的世界秩序图景。首先，论证深刻。阿查亚论证了在权力多元化、分散化时代，“单极世界秩序”以及“霸权”式治理方式彻底的终结。不管美国衰落与否，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衰落是必然的，而伴随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恢复单极格局在全球化时代更是不现实的。其次，反西方中心主义。阿查亚批判了当下世界秩序中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指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从来没有涵盖所有国家，这一秩序主要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组合，而在“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研究中将更加重视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最后，契合现实。关于未来的世界秩序，阿查亚基于文明的多样性，提出地区性世界秩序的可能，这一设想亦与现实最为契合，有助于化解“文明冲突”的预言。美国乔治敦大学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教授认为，“对于在深刻变革的时代中如何维系国际秩序的辩论而言，本书做出了重要贡献。阿查亚预见到的是一种更加地区化和多元化的秩序——一个去中心的世界，但却由网络 and 制度联系在一起。他的观点不仅富有创造性，而且也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预测。”<sup>②</sup>

## （二）本书的不足之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世界秩序与国际秩序、秩序结构与秩序观的混用。阿查亚在全书中一再强调并使用“世界秩序”这一术语，并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更应该被看作是有限的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

---

① Review by G.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2014-12-15/end-american-world-order>.

②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文版封底推荐语。

而不是一个包容性的全球秩序(global order)。<sup>①</sup>但他分析的核心单位依然是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新兴大国的比较分析,对非国家行为体论述不多,可以说阿查亚的思考是“披着世界秩序外衣的国际秩序”研究。<sup>②</sup>在秩序结构与秩序观的使用上,混用更是十分明显,比如“如果自由主义秩序衰弱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很多专家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是回归到多极。”<sup>③</sup>“多极”是国际格局的常用术语,属于秩序结构范畴,“自由主义”则是一种理念、规范,属于秩序观范畴,这一论断即反映出作者没有区分秩序结构与秩序观的内涵差异,类似的论断在全书还有很多。二是恰如约瑟夫·奈所言,阿查亚的批判无疑比其方案更具说服力。<sup>④</sup>就“秩序观”而言,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揭示的基于不同“文明”的秩序观,基辛格关于围绕不同国家形成的秩序观都是对未来秩序的设想,而阿查亚就未来地区秩序缺少具体的分析,在秩序观的研究上略显薄弱。<sup>⑤</sup>三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其实质依然是国际格局的变化,阿查亚进而认为自由主义秩序观也将终结,其结论过于仓促,毕竟自由主义秩序观的拥护者并不局限于美国一国,甚至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也是其受益者。在理解全书时,我们要认识到“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在结构上是指“单极格局”的结束、消失,但在秩序观上并非指“自由主义”秩序观的消失,更有可能是“霸权”式的治理方式走向终结。因为美国仍是地区性世界秩序与全球性协调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在未来世界秩序中仍将占据重要的地位。<sup>⑥</sup>因此,美国“单极世界秩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观的终结,其秩序观是否终结,仍有待观察。

①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September 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ethicsandinternationalaffairs.org/2017/multiplex-world-order/>.

② 关于“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学界一直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概言之,国际秩序是国家间的秩序,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世界秩序(抑或是全球秩序)则以个人为根本单位,涵盖所有的行为体。

③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第16页。

④ Review by Joseph S. Ny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0, No. 5 (September 2014), p. 1247.

⑤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所以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基于多极与多文化的地区性秩序而建立的。亨廷顿与阿查亚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地区秩序的冲突性,后者则更为重视地区秩序的合作性。

⑥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的“终结”,其实质含义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不变”与“持之以恒”,并不是说历史结束了、消失了。详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四、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思考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等问题凸显了美国的治理理念(民主、人权)频频受挫,“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饱受诟病。关于未来的世界秩序,阿查亚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然而,未来的世界究竟会形成一种怎样的秩序?理解世界秩序,无疑要先理解国际体系的“变”与“不变”,由此得出的世界秩序预测才更加客观、科学。基于对国际社会的现实考察,同时结合阿查亚的相关观点,本文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在理念上“主权平等”依然是其核心原则,民族国家则是其主要单位,为“不变”;结构上“复合多元”将成为其主要特征,“地区秩序”则是其重要构成,为“变”。

### (一) 理念层面:“主权平等”依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

进入21世纪,虽然有关“主权终结”“主权弱化”的思想甚嚣尘上,但是,即使主权观念面对诸多挑战,在民粹主义泛滥、全球化负面效应不断凸显的态势之下,民族国家仍然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sup>①</sup>主权平等仍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是秩序观的核心理念。诚如阿查亚自己所言,新的全球化可能会变得更加尊重国家主权。<sup>②</sup>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突出地位,全球化更加尊重主权、更加经济、更少政治或意识形态。<sup>③</sup>不可否认,现在的世界秩序转型,不能以否定主权为前提,虽然世界上存在许多动乱和冲突,并不意味着主权失去意义,相反,很多动乱和冲突恰恰是由于主权没有得到遵守造成的。<sup>④</sup>即“对个别社会和全球社会来说,国家消亡不是乌托邦的序曲,而是灾难的前奏。”<sup>⑤</sup>

因此,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秩序的主要行为体单位,并继续保持一种任何国际角色无法取代的关键职能:它仍然是能够实施法律统治的唯一权力渊源。<sup>⑥</sup>即国家依然是维护人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最为重要的力量,也是国际

①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62-363.

②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第21页。

③ Amitav Acharya, “Donald Trump as President: Does It Mark a Rise of Illiberal Globalism?”, *YaleGlobal Online*, January 19, 2017, available at: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donald-trump-president-does-it-mark-rise-illiberal-globalism>.

④ 陈志敏、苏长和:《做国际规则的共同塑造者》,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2页。

⑤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⑥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交往行为的保障。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国家仍然会坚持自身主权,否则它将难以独立自主地管理国家的对内对外事务,也难以维持正常生存。<sup>①</sup>最近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权的回归。此外,即使各种跨国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展迅速,但国家依然是其不可跨越的界限,可以完全取代国家的主体单位并未出现。而“国家之所以把地区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原因还在于地区是能够促进民族利益的舞台,是国家选择地区,而不是国家受地区支配。”<sup>②</sup>

## (二) 结构层面:“复合多元”将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

大国关系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大问题,<sup>③</sup>权力分配构成世界秩序的结构。虽然阿查亚不喜欢“结构”这一现实主义概念,但他在对世界秩序的分析中,“结构”依然是分析秩序不可回避的概念,甚至与秩序观共同形成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约瑟夫·奈认为,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结构层面的权力分配将在不同领域形成不同的格局,也就是单极、两极、多极甚至无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能的。<sup>④</sup>他的预测不一定准确,但其对结构的分领域分析却更具借鉴意义。例如,在军事领域,美国可能仍然是主导大国,构成单极格局;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囿于经济体量,可能形成两极格局;在政治领域,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泛滥,以及全球治理的兴起,更有可能形成多极格局;在文化领域,则是明显的无极格局,非国家行为体将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多元复合”正是对世界秩序多领域、多层次的生动概括,是未来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

与此同时,“地区秩序”将是世界秩序的重要构成。恰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世界秩序”的图景归根到底是若干地区性秩序的总和。<sup>⑤</sup>地区化的世界是世界的一个事实和趋势。在国际关系变化的意义上,“地区化的世界”下的国际关系必然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sup>⑥</sup>而纵览历史,地区秩序的时间远远长于世界秩序的时间,除此之外,世界秩序是否形成也是存疑的。毕竟截

① 宋伟:《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核心概念的比较及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14页。

②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第42页。

③ 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37页。

④ 详见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pp. 2-12; 约瑟夫·奈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⑤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0页。

⑥ 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53页。

至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涵盖全球所有国家的秩序，秩序之外的行为体始终存在。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不一定实现，但其论述揭示了世界上文明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任何将自己的文明强推到全球的行为（其实就是“霸权”式治理方式）都会遭到激烈的抵抗。可以想象，未来的世界将由一个全球联系的世界与地区联系的世界共同构成。

## 五、结 语

概言之，阿查亚在其《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首先对美国单极主导的霸权秩序开展了批判，其次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进行了展望，最后提出了多元复合的世界秩序。通过对未来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分析视角，阿查亚的研究为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学术研究以及世界政治的区域视角做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阿查亚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分析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厅影院”式的世界秩序图景，对于思考与展望未来世界秩序大有裨益。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基于科技、人才诸多方面的优势，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即“当代世界秩序并不意味着离开美国，而是需要它与其他国家更多的合作与协作。”<sup>②</sup>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单极”秩序结构、“霸权”式治理方式必将走向终结，“自由主义”的秩序观更有可能成为地区性秩序观的一种。就中国而言，从建国时美国世界秩序的革命者，到改革开放后的参与者，再到如今“多元复合”式世界秩序的重要塑造者。中国在世界秩序重塑中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处理与美国、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阿查亚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关于新兴大国诸多问题的分析，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塑提供了重要参考。

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飞，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

<sup>①</sup> Review by Marija Popovic, *Journal of Reg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2 (2015), p. 201.

<sup>②</sup> Review by Marija Popovic, p. 200.

## 工具理性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冷战决策模式的批判——《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评介

葛腾飞

伴随着冷战档案的解密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冷战史研究正进入新的研究阶段,研究领域更加拓展,研究手段更加丰富,研究主题也更加深入。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战略设计者”丛书,<sup>①</sup>聚焦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对外战略设计者,充分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进程,展现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变化。其中的一本代表性作品是《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石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该书以保罗·尼采(Paul Nitze)这位美国冷战元老参与美国决策的亲身历程为线索,叙事历经半个世纪,囊括整个冷战进程。尼采1946年进入国务院,1950年接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主持制定著名的“NSC-68号文件”,参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马歇尔计划、氢弹研发、朝鲜停战谈判及对伊朗的政策。肯尼迪时期,他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直接参与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1969年作为尼克松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美苏军控谈判,是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主要谈判者之一。里根时期,担任总统和国务卿的军控事务特别顾问,深得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的信任。整个冷战进程中,他担任过除卡特政府外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顾问或政府成员。“作为东西方冷战全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尼采在美国外交和世界事务方面的丰富经历,在20世纪几乎无人可比。”<sup>②</sup>在这一进程中,尼采也从一位冷战军事化的政策设计者逐步转

① 该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八本,分别是: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2017年12月出版;吕磊:《艾奇逊: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2017年12月出版;舒建中:《克莱顿:从“世界棉王”到贸易斗士》,2014年2月出版;葛腾飞:《麦克纳马拉:美国防务战略的理性设计者》,2014年5月出版;龚洪烈、高金虎:《基辛格:美国的“外交魔术师”》,2014年10月出版;赵学功:《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2015年9月出版;杨冬燕:《罗斯托:越南战争的幕后推手》,2014年2月出版;胡莹:《布热津斯基:美国的地缘战略大师》,2014年2月出版。

② 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变为谋求战略稳定并推动冷战结束的人。

该书以尼采这位决策参与者的战略决策作用为线索，将具体的决策人物置于宏大的冷战结构中，在展现个人战略思想的同时又展现了整个冷战的美国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在国内冷战史创作中独具一格。在聚焦尼采的同时，该书展现了美国冷战进程中的决策讨论、思想交锋以及重大事件决策形成的过程，几乎是全景式地呈现了美国冷战决策进程，揭示了美国冷战战略演变的思想谱系。因此该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美国冷战战略的思想史。如作者所言，该书“是从尼采这位见证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介入了冷战全过程的美国战略家和政策设计者入手，集中探讨核时代条件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其演进历程、基本特征、成败得失及其国际背景与国内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根源”。<sup>①</sup>

# 一

以冷战的主要进程为时间轴，该书展现了尼采作为美国冷战决策参与者的政策思考逻辑和政策认识进程。尼采在冷战一开始的认识基础，缘于其自身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参与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工作的亲眼见历。他亲眼见证了盟军对德国后方（达姆施塔特）战略轰炸以及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放核炸弹之后的残垣废墟，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死亡、残酷、毁坏和彻底的无望。战略轰炸调查工作给尼采带来两点重要的感受，一是对核武器的认识，他认为核武器只是战争中的另外一种武器，只不过杀伤力更大，因为他深感当时对德国后方的常规轰炸甚至比日本广岛和长崎“更令人震撼”；二是美国必须在平时保持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随时遏阻可能的进攻者。<sup>②</sup>究其根本，尼采希望避免这种战争的残酷和战火的灾难在自身的国土上重演。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以及基于尼采 20 世纪前半叶亲身经历的不断爆发的冲突与战争的事实，因此在冷战一开始，尼采更看重美苏“军事对抗”甚于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恐惧。“随着大量可怕的破坏性武器的发展，如果冲突进入全面战争阶段，那么，世界将面临被毁灭的危险”。<sup>③</sup>“一方面，世界人民渴望免除因核战争危险而引起的忧虑。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地区只要有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将造成这样的可能性：

第 22 页。

① 石斌：《保罗·尼采》，第 26—27 页。

② 石斌：《保罗·尼采》，第 35—37 页。

③ 石斌：《保罗·尼采》，第 480 页。

克里姆林宫的力量已大到再也无法集结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来抵抗它的程度。”

①这里尼采担心的，是作为对手的苏联掌握了更大量破坏性武器和拥有更具优势的军事力量，从而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便会发生的战争中对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损伤毁坏和战败代价；面临这种可能性，所以“美国绝不能处于战略弱势”。②对尼采而言，军事对抗，在冷战一开始，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理解，“如何从目前所处的位置出发”避免在军事对抗中“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是一个必须予以优先对待的核心国家安全问题。③谋求美国对苏联实力优势，此后也一直是尼采的基本战略思想。由此，尼采提出了一个“不容有丝毫迟疑的”军事化选项来应对美苏冷战的到来，他主持制定的“NSC-68号文件”便体现了对冷战对抗的这种绝对式的理解。这一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调，美国和西方必须建立“更加全面、平衡和灵活的防御体系”，必须建立起全面的军事实力和军事优势。

冷战作为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段，尽管有其种种导致冷战对抗的特殊因素并呈现出两极化对抗的特殊国际关系形态，但总是内含着走向国际关系常态的内在因素。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说明，国际关系终归会回到一种较为和平的状态，尽管这种和平并非意味着没有冲突，而只是意味着国家间的某种竞争性共处。但冷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表现出来的一种过度军事化的僵化对抗状态，却与这种国家间的竞争性共处的常态模式有着一种悖离的逻辑。即使是尼采这样的优势论者，也很快认识到这样一种态势演变的非正常逻辑。从20世纪60年代后，尼采实际上已经逐渐开始了自我反思、自我纠偏的历程。当然，作为一个决策参与者，作为一个局中人，尼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冷战决策者的主导思想，但他试图从内部发挥影响，并逐渐产生实际的效用，推动了冷战中后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和战略谈判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尼采是精明的，也会根据不同的政府调整自己的观点倾向，这使他在冷战时期长期保持着某个政府重要位置（包括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几届政府，在福特、卡特时期则多以批评者角色出现），但尼采的原则似乎也越来越坚定，以至于往往会得罪他的顶头上司。④其实，尼采的反思，代表了不正是一种具有更宏观意义的人类反思进程吗？该书作者实际上又在借尼采这个特定研究对象，表达了作者自己对冷战史的一种理解。

① 石斌：《保罗·尼采》，第480页。

② 石斌：《保罗·尼采》，第53页。

③ 石斌：《保罗·尼采》，第69页。

④ 石斌：《保罗·尼采》，第454页。



## 二

作者在该书中还将尼采战略思想的评述放到了一个战略路径比较分析的框架之中，阐述了美国冷战决策中的两种不同战略路径，即尼采所代表的行为主义的工具理性分析路径与凯南代表的传统战略分析路径。

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战略分析家，尼采是一个工具理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它与凯南等注重历史文化分析的传统战略分析路径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方式。在凯南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分析者眼中，战略分析是一种侧重于定性的、思辨的、解构式的路径，是对具体而又相互联系的各维度的动态考察，重在揭示各种历史因果之间精致而密切的逻辑联系。在这些联系中寻找到的关键的要津所在，确定那个被称为紧要利益之所在，并区分紧要利益和边缘利益，这可能涉及国际、国家和个人等多层次因素，不仅要分析自身，也要分析对手的实力、意图和可能存在的弱点，涉及决策者对动态变化环境中一系列实质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判断路径本身极其复杂和精妙，不同的人很可能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战略决断者本身的战略素养和战略判断技艺。如凯南自己后来所说：“我不相信，人有能力以任何有用的方式、使用笼统的和法律的词句为手段，假设性地界定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想象或展望的未来形势。”在凯南看来，国际关系问题太微妙，变化太快，以至于无法归纳为书面形式而不过分简单化。<sup>①</sup>在冷战开启之时，这种复杂性精妙性要求决策者有极高的战略素养，它显然不符合美国这个日益庞大的“国家安全国家”的需要，这种战略判断路径也无法快速及时应对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因此，凯南这种路径在冷战之初的颓势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华尔街出身的尼采不认为需要区分紧要利益和边缘利益，主张利益不可分割，也不认为需要去揣摩对手的弱点和意图。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安全的量化界定，他强调风险评估、成本—收益核算，崇尚数理逻辑和量化分析，遵循“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思维模式，认为从“最坏假设”出发来制定安全战略，是一种真正的理性选择。<sup>②</sup>显然，这种决策模式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正好也契合了这部庞大的国家冷战机器的需要。杜鲁门总统1950年初授权起草一份关于利益、威胁和可行反应的全面阐述，文件的目的在于将遏制系统化，并且找到使之行之有效的手段。<sup>③</sup>据称“NSC—68

①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② 石斌：《保罗·尼采》，第421页。

③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95页。

号文件”起草时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的指示是，文件的结论应该表述得简单，明了，并且用……“海明威的语句”。<sup>①</sup>毫无疑问，凯南肯定反对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但尼采式的工具理性路径正好可以提供答案。在尼采眼里，不必先行确定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仅凭一项苏联威胁的简单存在本身，就足够有理由将受到威胁的利益视为至关重要。<sup>②</sup>为了确保击败苏联的威胁意图，需要明确的军事胜利，和为了确保军事胜利的明确军事优势，以及为了确保军事胜利和军事优势的军事力量建设与使用方式。“NSC—68号文件”的直接目的，其实也是根本目的，就是在与苏联的军事较量中，确保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军事优势和最终军事胜利。显然，这是一种直接的、纯粹的战略。

然而，这种直接、纯粹的战略在冷战对抗的复杂国际关系中，它的效用可能难以经得起国家大战略平衡的检验。这里面涉及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国家资源经久性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核武器的军事效用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国家的大战略主旨问题。

从国家资源经久性来说，工具主义者强调通过工具本身来直接实现目的的意义，但是结果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困境，即更关注的常常不在于自身的工具效能如何，而在于对对手可能在工具上超越自身的一种极度恐慌，导致恐慌主导了战略进程。尼采在“NSC—68号文件”中反映出来的一种对战争很快将要发生的恐慌感，极大地塑造了冷战的进程。尼采在盖瑟报告和当前危险委员会时期，仍然体现了这种对美国实力落后的极大担心。由于他习惯于以数字化的方式来界定美苏力量相互关系——这是他理解冷战的关键，他也特别在意经比较而得出的优势和劣势。在他心中，“任何苏联的优势将导致苏联方面的侵略和美国方面的退让。美国的领先意味着稳定。”<sup>③</sup>这种工具主义者的政策心态，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安全困境和现实政策上的资源困境，正如尼采外孙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所写：“如果苏联领先，美国必须用双倍的努力赶超，如果美国领先，还应该用双倍努力扩大这种领先地位。”<sup>④</sup>

在核武器效用问题上，尼采从冷战一开始就并不看重，认为核武器只是

①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12页。

②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03页。

③ Nicholas Thompson, *The Hawk and the Dove: Paul Nitze, George Kenn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09), p. 140.

④ Nicholas Thompson, *The Hawk and the Dove: Paul Nitze, George Kenn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另外一种武器。但是随着美苏双方核武器的升级换代及其威力的巨大增长，尼采也不得不越来越重视核武器。但是，在工具理性主义者看来，越来越具有大规模毁灭性后果的核武器显然不是可以作为直接的战争工具来进行衡量的力量。一个简单的观点是，在核僵持状态下，美苏各自的威力无比的核武库倾向于彼此抵消。<sup>①</sup>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的“彼此恐惧突袭”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界定的“相互确保摧毁”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战略，都反映了核武竞争下的一种极其不稳定战略态势和战略困境。<sup>②</sup>盖瑟报告中指出了由航空时代到导弹时代的这种核武竞赛后果：“美国和苏联双方都会继续制造大量的裂变材料和远距离弹道导弹。……双方都会提升用来侦测和防卫导弹攻击的手段。为了避免打击，更先进的导弹又被生产出来；由此会在攻防两方之间形成无休止的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这样技术措施和反措施会永无止境。”<sup>③</sup>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以麦克纳马拉、尼采等工具理性主义者主导的防务战略家们达成共识，即有必要鼓励形成一种稳定的核均势，而不是明显的美国核优势。<sup>④</sup>尼采也因此强调要设法保持危机稳定和动态稳定，强调维持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sup>⑤</sup>在尼采看来，核武器也只能是当成平衡和抵消对手核力量优势的一种手段，而真正需要制胜的还是常规武器。“如果要取胜，或者实现正义的和平，必须通过非核武器手段并且遏制核战争。”<sup>⑥</sup>尽管这并非意味着不重视核武器。但在他的军事制胜定式中，常规武器具有更可使用的效能。因此，不难想见，在整个冷战进程中，尼采最终成为极力主张对核武器进行战略管控的人；并且，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去亲自推动美苏之间的战略核裁军和战略稳定。在这里，他的理解更多是着眼于核武的工具性含义的变化，不同于凯南或基辛格那种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路。

在国家的大战略主旨方面，尼采的理解是，国家的军事安全毫无疑问是

① 劳伦斯·弗里德曼：《头两代核战略家》，载《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20页。

② 劳伦斯·弗里德曼：《头两代核战略家》，载《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第716—758页。

③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 5724,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ODM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Deterrence and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 Washington, November 7, 19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5-1957,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ume XIX, Document 158, p. 652.

④ 劳伦斯·弗里德曼：《头两代核战略家》，载《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第735页。

⑤ 石斌：《保罗·尼采》，第160、174—175页。

⑥ 石斌：《保罗·尼采》，第147页。

国家战略安全中最为核心、首要的追求，他强调的是一种手段安全，由此他极力赞成民主党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主张将构建明确的、可以运用的军事优势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内涵。而在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和审慎的战略分析者看来，国家安全的含义不仅仅是军事手段的安全，还包括国家的财政平衡、经济健康和自由开放的生活方式等基本要义。为此，共和党更倾向于追求一种防务与经济平衡的大战略，因此主张避免战争，主张限制军事开支而求得大战略平衡，更多奉行某种不强调实际军事对抗的威慑战略或外交战略技艺。

作为经济技术分析路径代表，或称工具理性主义者，尼采显得冷酷、精明而实际，被称为冷战鹰派；作为历史文化分析路径的代表，凯南心中还坚守着某种道义的层面（基于这一点也可在某种程度上称为价值理性主义者），对现实军事化冷战政策表现出某种批判性，强调的是共处型的对外政策观，被称为冷战鸽派。就尼采与凯南这两位经历冷战始终的战略设计者来说，哪一种战略设计路径对于国家大战略更具有经久性价值呢？相对于凯南的战略审慎来说，尼采主持的“NSC—68号文件”却导致了一种战略激进，加速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膨胀并必然导致了应对手段的膨胀，这点对国家长远战略来说必定会造成一种经久性的损害。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答案似乎是明显的。但是，当回归到决策者所处的特定时空和场景，每一种最后形成的决策确实都有其形成的理由，这就是该书所呈现的决策的复杂性。正是基于这种即时即地的合理性与作为历史长时段评价之间的矛盾性，该书作者实际上把尼采的战略思想放到了一个发展变化的时间轴上，让尼采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演变来回答上述两种战略路径价值的比较问题。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尼采，还是凯南，他们又都是国家理性主义者，都是现实主义者，最终这两种不同的战略路径殊途同归。

### 三

作者还试图通过对冷战进程的反思式理解，来思考和探讨一个迄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全球“霸权”或世界性“帝国”）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之间具有何种联系。<sup>①</sup>作者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世界地位，

<sup>①</sup> 石斌：《保罗·尼采》，第27页。

总的来说主要是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同时，与后冷战时期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反应方式有关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大多也是在冷战时期孕育或形成。<sup>①</sup>

很大程度上，作者正是通过对尼采战略思想的评述，阐明了美国当代对外政策中的黠武主义、实力地位与优势政策思想的由来。尼采主持制订的“NSC—68 号文件”开启了冷战的军事化，在决策层面凝聚了强化军备建设的共识，成倍数地提升了美国的军费开支水平，促进了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发展，被认为是当代美国黠武主义政策的开端，甚至可以说定型了冷战时期以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尼采与他的上司艾奇逊国务卿等人一起，推动实现了冷战初期的美国政策军事化，加强核力量建设（例如在研制氢弹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力推动常规军备建设，推动了与苏联对抗的前沿力量建设水平，致力于确保对苏联的全面军事力量优势。美国当代政策中的实力地位、优势政策思想，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联。

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是由于尼采等倡导者动辄会以慕尼黑绥靖、珍珠港突袭等历史启示以及对对手苏联的妖魔化作为某种隐喻式的强力支撑，突出其合乎现实需要的逻辑，以说明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二是由于美国战略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包括对强大国家的追求、白人至上以及反共主义（反对激进革命）等方面，<sup>②</sup>追求美国使命的普世性，而尼采等倡导者们将军事化的国家安全政策视为应对苏联军事挑战的必要，并进而与保卫西方世界联系起来，高扬美国的使命和世界地位，从而赢得了美国社会政治主流思潮强力呼应。不同于凯南，尼采在冷战时期能够长期在政府高层担任要职，参与决策，也正说明了尼采的政策思想切合了美国社会政治主流思潮，迎合了大多数政府主导者的政策需要。

实际上，尼采本人不仅仅促成了这样一种政策流向的形成，而且他还通过自身的影响，促进了这样一种亲军事化政治力量在美国政府决策层面的长期成长。工具理性主义政策思维本身在冷战历史上就曾大行其道。肯尼迪政府时期，同为哈佛大学商学院出身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及在麦克纳马拉手下任职助理国防部长的尼采（负责国际安全事务）显然都同样信奉工具理性主义的政策逻辑。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净评估办公室及其主任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还有长期发挥重要智库作用的机构兰德公司，以及这些官方和民间机构资助的大量研究项目，很多都

① 石斌：《保罗·尼采》，第 28 页。

②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1987), pp. 17-18, 153-154.

遵循着类似的工具理性主义政策研究范式。他们通过学理研究成果,或者通过项目资助和培育,抑或通过“旋转门”机制,深刻而持续地影响着美国当代的国家安全政策决策。该书中提到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后来的新保守派著名代表人物,就是深受尼采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思想传承者。当然,尼采还通过他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现改名保罗·尼采国际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

诚然,尼采毕竟只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参与者,虽然他曾经通过主持制订“NSC—68号文件”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他同样也受到冷战这部巨大的政治军事机器轮带的驱动。在这种意义上说,尼采的政策理念也是冷战环境的产物。他一开始主持制订“NSC—68号文件”,无疑也深受当时反共共识环境,受到麦卡锡主义体现的反共歇斯底里的影响,这使当时的国务院在反共方面比国防部表现得要强硬得多,国务院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等都是冷战强硬派,奇怪的是当时国务院力主增加军费,而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Luis Johnson)则竭力支持控制国防预算。<sup>①</sup>尼采之所以被选中接替凯南来担任政策计划室主任,既是因为他明确地判断出了当时的时势走向而敢于挑战他的顶头上司凯南的温和遏制思想,也是因为他得到了当时国务院以艾奇逊国务卿为代表的主流力量的支持。时势使然,尼采得以走到历史的前台。

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背景来看,尼采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一代专业知识精英。新一代专业知识精英之所以能走上前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扮演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角色,外交政策决策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支撑。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美国外交政策领导层的结构发生了一种变革,权力悄悄地从老的东部权势精英转移到了新的职业精英阶层。华尔街出身的尼采无疑是战后进入决策界的新专业知识阶层的先锋。这些新的知识精英阶层专业来源多样而广泛,接受过专门的经济学、法学、外交学、地区研究等各种专业的训练,也被期望着为美国这个全球霸权做出最合理的科学决策,最大程度减少决策的失误。<sup>②</sup>外交决策成了一种专业行为,工具理性主义决策模式因此大行其道。战后麦卡锡主义时期政治恐怖主导的冷战共识让位给了新的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政策共识和一致性。在最高层面的群体性决策模式的背后,其实也会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往往在大多数的主流声音中沦为沉默。这种似乎具有极大权威性的专业知识精英决策群体,带给人们一种

① 石斌:《保罗·尼采》,第64-65页。

② See Stephen M. Walt, "America's IR Schools Are Broken,"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 2018, available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2/20/americans-ir-schools-are-broken-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eign-policy/>.

能够借由专业知识和高超智力正确决策的假象，其实是以这种专业知识的权威掩盖了国际事务、对外战略和外交决策所需要的真正复杂性技艺需求为代价。外交政策的运行实施是一项具有复杂性、政治性、战略性和艺术性并重的工作，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在这点上却未必能够成功。专业性知识才华毕竟不完全等于战略性技艺。

尼采为代表的冷战决策者们驱动着并置身于美国国内冷战机器运动之中，也见证着高速转动的国际冷战机器的巨大碰撞危险。他们也必然地心生忧惧，然而却无法停止。正是在这一冷战的进程中，尼采逐渐地强调核控制、避免战略误判，强调核武器方面的战略稳定，并作为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在尼克松政府、里根政府时期的战略武器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是一种环境使然。但尽管尼采心生畏惧，他却再也无法扭转他亲手推动的军备扩张进程。不断追求更强的军事实力地位，“以实力求安全”，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地成为美国主流战略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影响至今。

就此而言，该书更多突出了尼采在一系列冷战重大事件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了尼采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实践本身，但在尼采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如何促成他这样一种态度以及态度的变化上，以及尼采的态度和态度变化在冷战运行环境中的作用限度，还可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从更广泛的角度说，这样一部庞大的美国冷战军事机器的运转，呈现出一种影响至今、虽然冷战结束已逾四分之一世纪似乎仍难以实质性减速的运行惯性，其背后肯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不断承继的群体性驱动力，这里不仅有其值得探讨的冷战驱动力形成强化以及冷战运作机制模式化的问题，还有为何导致这种群体性驱动力和运作模式长久性存在的机理性问题。

葛腾飞，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 评康罗伊-克鲁兹《基督教帝国主义》

孙宏哲

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基督教帝国主义：美国早期共和国时期转变世界信仰的努力》，康奈尔：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5 年（“世界中的美国”系列）。

Emily Conroy-Krutz, *Christian Imperialism: Converting the World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

虽然有关“全球视野的美国史”或“世界中的美国”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 20 世纪史学者的创举，但关注早前时段的历史学家没有落伍。2006 年，《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的一个题为“大西洋之外”的“论坛”刊登了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菲利普·J. 斯特恩(Philip J. Stern)、保罗·W. 麦普(Paul W. Mapp)、彼得·A. 科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 和朱莉·西弗斯(Julie Sievers) 的评论，开启了全球化殖民地时期与革命时期的集体努力。

此后，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2007 年)、乔治·亚森·比利亚斯(George Athan Billias) 的《闻名世界的美国宪法：1776 至 1989 年》(*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Heard Round the World, 1776-1989*) (2009 年)、卡罗琳·弗兰克(Caroline Frank) 的《物化中国、想象美洲：早期美洲的中国商品》(*Objectifying China, Imagining America: Chinese Commodities in Early America*) (2011 年) 和乔纳森·易考特(Jonathan Eacott) 的《售卖帝国：印度与不列颠和美国的形成》(*Selling Empire: India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 and America, 1600-1830*) (2016 年) 等一系列著作将这一潮流具体化。

2011 年，罗斯玛丽·扎戈里(Rosemarie Zagarri) 在《早期共和国杂志》(*Journal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上发表了《早期共和国史的“全球转向”的意义》。她认为“研究早期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对参与全球转向没那么热情”，敦促他们挑战美国例外论，并将目光投向大西洋之外。2016 年，



在《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个题为“美国革命和内战之间的全球化及其局限”的“对话”之中,九位学者试图以新的案例研究将这一探讨引向深入。康罗伊-克鲁兹的《基督教帝国主义:早期美利坚共和国时期改变世界信仰的努力》正是其中之一,它关注了“美国海外差会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美部会”,ABCFM)的最初三十年。

康罗伊-克鲁兹表示,她希望挑战将早期共和国视作“大陆的”和“共和的”的传统看法。作者指出,后两者也许是南方人的态度,但北方人是全球的和帝国的。至少“美部会”如此。“美部会”受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启发而成立于1810年,致力于使世界“文明化”和“基督教化”。然而,因为美国缺乏一个正式的海外帝国,“美部会”不得不依赖英帝国,并与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建立联盟。(这使人想起詹姆斯·菲克特(James Fichter)的专著《“利润如此之大”:东印度贸易如何改变了英美资本主义》(*So Great A Proffit: How the East Indies Trade Transformed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2010年),该书探讨了美国和英国商人如何协力结束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在印度,出于其反对异见派传教士的长期传统,东印度公司对美国传教士不予支持。在“1812年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囚禁了美国传教士,将他们送回。战争结束后,东印度公司担心美国传教士会引起婆罗门种姓的愤怒,继而损害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也因为当地民众缺乏兴趣,美国传教士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并不成功。虽然英帝国为“美部会”提供了工作框架,但康罗伊-克鲁兹相信,它也妨碍了“美部会”的成长。

“美部会”在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今夏威夷群岛)和切罗基人中间的工作更有成效,但并非一帆风顺。在三明治群岛,他们受到了当地精英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很多人迅速皈依,并将孩子送往传教士和美国的差会学校。但传教士们担心,缺乏文明开化的皈依不是真正的皈依。在19世纪20年代,受到“美部会”差会(在康罗伊-克鲁兹看来,它们都是“定居者殖民地”)的启发,切罗基人采用了一套书写系统和一部以美国宪法为范本的成文宪法,表明他们愿意“文明开化”。然而,虽然传教士们成功帮助切罗基人获得后者在佐治亚州的土地的所有权,但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迁移政策和“撤销联邦法令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期间,他们无法迫使美国政府和佐治亚政府尊重切罗基人的权利。

为了对大西洋黑奴贸易做出补偿,“美部会”决定在利比里亚传播福音。

传教士们起初同差会所在地帕姆斯角殖民地（Cape Palmas）和睦相处，但在黑人总督约翰·布朗·拉斯沃姆（John Brown Russwurm）抵达之后，二者关系开始恶化。传教士们谴责拉斯沃姆镇压当地人民，强征黑人助理，帮助黑奴贩子。传教士们被迫离开，前往加蓬。在那里，他们又与法国殖民者发生冲突。在新加坡，美国传教士希望在英国殖民地内建立一个既尊重英国主权、又享有美国自由的美国殖民地。这个想法因引起“美部会”恐慌而流产。美国传教士只能运营差会学校和印刷小册子，但这两个活动没有什么成效。在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他们放弃了新加坡差会。

《基督教帝国主义》是对美国海外传教士研究的突出贡献。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知道他们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很多活动，对开端的研究仍旧匮乏。此前，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的《异教徒学校：早期共和国时代一则关于希望和背叛的故事》（*The Heathen School: A Story of Hope and Betrayal in the Age of the Early Republic*）（2014 年）描绘了康涅狄格州康沃尔（Cornwall）的“外国差会学校”（1817—1826）从世界各地（包括三明治群岛、中国和切罗基族）带回美国的外国异教徒学生的生活和困境。通过研究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美国传教士在海外做了什么，康罗伊-克鲁兹对迪莫斯的工作进行了补充。此外，她指出，虽然美国传教士们相信人人平等，但他们因怀有“异教徒等级”之观念（第 19 页）、优先帮助居于顶端的民族而强化了业已存在的不平等。他们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然而，他们的“基督教帝国主义”与“武力帝国主义”（physical imperialism）（我们也许可以这么叫它）不同，二者难以和谐相处。

这本优秀著作提出的问题多于它解决的问题。那些不附属于“美部会”的传教士有哪些主要活动？在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做了什么？几乎采用同样航路的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商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何利用当地语言的文献？考虑到全球化美国内战史的趋势（参见杰伊·塞克斯顿（Jay Sexton）、唐·H.多亚尔（Don H. Doyle）、约尔格·纳格勒（Jörg Nagler）、斯凡·贝克特（Sven Beckert）、徐国琦与大卫·阿米蒂奇等学者著作），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内战有什么关联？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

孙宏哲，哈佛大学美国研究项目博士候选人

本文原载于美国《殖民主义与殖民史杂志》（*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2017 年第 2 期

会议信息



## 第二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征稿启事

会议日期：2018 年 9 月下旬

主办单位：《世界历史》编辑部、上海大学历史系

由《世界历史》编辑部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合作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将于 2018 年 9 月下旬在上海举办。现面向学界征稿，竭诚欢迎广大中青年学者踊跃投稿。《世界历史》编辑部将组织专家对参会论文进行评选，根据论文学术质量确定参会人选。入选论文将择优在《世界历史》期刊刊发。

### 一、征稿对象

全国高校、研究机构 50 周岁以下（1968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包括在读博士生）。

### 二、投稿要求

1. 论文应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成果，并未投他刊。
2. 论文篇幅一般在 2 万字以内为宜，注释体例参照《世界历史》编辑技术规范。同时请附上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学历）及联系方式。
3. 所提交论文经评审并入选后，《世界历史》编辑部将通过公众微信号正式发布入选名单，并向入选者发送正式邀请函。
4. 论文一经入选，《世界历史》期刊将享有优先采用权。编辑部将选择比较成熟的高质量稿件，先进入审稿流程，再邀请作者参会。
5. 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8 月 15 日
6. 报名日期：有意参会者请在 2018 年 4 月 1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至《世界历史》编辑部邮箱 [sjlsbjb@163.com](mailto:sjlsbjb@163.com)。

### 三、会议地点

上海

### 四、会议时间

9 月 21 日会议报到，22—23 日学术研讨，9 月 24 日离会（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 五、参会费用

会务费和餐费由会议主办方负责，住宿费和往返交通费自理。

### 六、投稿邮箱

sjlsbjb@163.com

请将论文以附件形式发送至上述邮箱。邮件主题请注明“作者姓名+中青年论坛论文”，附件标题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章题目”。

编辑部电话：010-65275907

联系人：仙慧

《世界历史》编辑部

上海大学历史系

2018 年 3 月 2 日

# 第八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下旬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写入了党章和宪法，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这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我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彰显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宽阔胸怀，体现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为了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深入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下旬在南昌联合举办“第八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诚邀各方学者拨冗与会。现将相关事宜敬告如下：

## 一、会议主题

总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世界

分议题：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现实

2. 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3. 世界大湖流域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4. 稻作文化、青铜文化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之比较

## 二、会议规模：

约 100 人

## 三、会议日程

（待定）

## 四、论文要求

1. 论文字数控制在 10000 字以内，格式要求：一级标题用宋体 2 号字、二级标题用楷体 3 号字，征文用仿宋 3 号，页边距上 2.5cm、下 2.2cm、左 2.4cm、右 2.4cm，行间距 30；引文标准无误，注释统一采用脚注。

2. 请将会议论文和参会回执发送到 skykyc@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关键词“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

3. 欢迎参会学者携个人著作、所在单位宣传页以及现阶段正在做的研究课题等信息，在会议期间与同仁交流、分享。

### 五、其他事项

1. 按照有关规定，与会学者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会议期间其他费用由主办机构承担。

2. 联系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联系人：陈宁

联系电话：0791-88592752 18679100918

邮箱：Skykyc@126.com

第八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系研讨会会务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018 年 4 月 16 日



# 第一届京津冀世界史青年学者论坛会议 (第 1 号通知)

会议日期: 2018 年 10 月

主办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为了契合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战略, 加强京津冀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世界史青年同仁们之间的交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拟于 2018 年 10 月, 在北京市举办第一届京津冀世界史青年学者论坛, 特邀您拨冗出席。现将相关事项告知诸位专家学者。

## 一、会议分论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个方向

1. 古代文明与国家的产生与演变
2. 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现代史
3. 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
4. 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互动与交流
5. 世界史专业教学以及其他世界史相关方向

## 二、参会对象

京津冀高校和科研院所青年研究人员(50 岁以下)。

## 三、会议时间

2018 年 10 月

## 四、会议地点

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

## 五、会议费用

会议交通(动车二等座或硬卧)、食宿、会议和资料等费用均由主办方承担。

六、请参会代表填写会议回执, 并于 6 月 30 日前发送到会务组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另请参会代表于 9 月 10 日前将会议论文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所提交论文经审核入选后会务组将发送正式邀请函。

### 七、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晏绍祥：15811038951

崔金柱：13811210687

蒋家瑜：15652201474

会务组电子邮箱：jjjluntan@163.com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8 年 5 月 8 日

# “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 学术研讨会征文公告

会议日期：2018 年 11 月 3 日—4 日

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20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一战不仅是改写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事件，也是改写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动参与的世界性事件，一战开启了近代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争取国际认同的艰难历程，为中国调整和重塑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契机；同时，一战带来的东西文化、民主专制、文明野蛮、公理强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论争与检讨，一战期间及其前后在中国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成为中国重新规划和构建新的国家身份的契机，对后来中国发展的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一战给中国内外带来的复合性影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美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编辑部，拟联合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4 日在上海大学召开“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学术研讨会，试图以此为契机，打破中国史、世界史的畛域界限，兼顾全球史、国际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以“大一战史”为视角，既聚焦一战本身，也关注整个一战时代特别是一战前后中国的各个方面，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及一战在中国留下的印记呈现出来，为各方学者的对话提供学术的平台。真诚期待海内外学人拨冗参会，惠赐大作，共襄盛举。

## 一、会议论文参考选题如下：

1. 全球史视域中的一战；
2. 一战与欧洲及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德、俄、奥匈）；
3. 一战与美国及美洲；
4. 一战与殖民地国家；
5. 一战与亚洲；
6. 一战与中国；
7. 一战时期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人物及军事战略与技术。
8. 战后和会与遗留问题及其他相关的主题。

**二、会议具体信息如下：**

1. 会议回执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7 日；

2. 论文篇幅敬请控制在 3 万字以内，并按《世界历史》技术规范处理。

3. 所有征文将经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理，学术水平为唯一取舍标准。

4. 会议主办方将承担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往返交通费敬请自理。

5. 联系人：

杨卫华：yangweihua1237@126.com

侯庆斌：houqingbin2014@163.com

“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2018 年 1 月 20 日

## “美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暨纪念历史学家丁则民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会议日期：2019 年 7 月 22—25 日

主办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

2019 年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和美国史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丁则民先生诞辰百年，同时也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创立 30 周年。因此，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拟于 2019 年 7 月 22—25 日在长春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其构成分为两部分。

会议第一部分于 7 月 22 日举办，主要以中国学者参加“美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暨纪念历史学家丁则民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为主。

会议议题：

1. 丁先生与中国的美国史和世界史学科发展
2. 丁先生的教书育人与道德文章
3. 丁先生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的人才培养
4. 丁先生与美国史教学

会议第二部分于 7 月 23—24 日举行，是有美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名称拟定为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and the U.S. Civilization”。

会议议题：

1.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合作
2. 移民与美利坚文明发展
3. 华人移民的美国化进程
4. 移民与美国族裔问题研究
5. 其他美国史专题研究

会议地点：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

联系人：梁茂信 15843088255

联系人邮箱：liangmx295@nenu.edu.cn

敬请关注后续更新，欢迎国内外美国史研究专家莅临指导！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2018 年 1 月 10 日

## 编后记





## 编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2018年第1期《美国史研究通讯》。本期通讯的刊载内容包括2018年1—6月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信息、活动及成果，分为研究会工作、美国纪行、学界动态、新书推介、学术书评、会议信息六个专栏。各专栏内容大致依照时间先后排序，以便读者历时把握研究会的工作和学术动向。

2018年上半年，中国美国史学界开展了多项重要学术活动。6月8—10日，“穿越全球变局：不确定性年代与变化中的美国史研究”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在上海师范大学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应邀参会。大会总结了过去两年来理事会的工作成果，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以主题报告和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交流。此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也开展了各项学术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对于增强学界交流与协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除国内学界的交流活动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暑期研习营也在国内三所高校顺利开营。其中，浙江大学承办了“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四川大学承办了“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武汉大学承办了“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研习营的成功举办对于国内美国史学界师生了解国外研究动态、开拓学术视野、增强学术交流、提升学术能力颇有助益。本期通讯汇总了研习营的讲授内容，与诸位读者共享。

过去半年，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势头良好，多位学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恭喜梁茂信教授入选2017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祝贺22位学者成功申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此外，多名学者还有专题论著与译著面世，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学术成果，而且有助于学界的繁荣与进步。通讯中择录介绍了部分新作，以供读者参详。

另外，还有三位青年学人给我们带来了他们参加美国历史学会第132届年会的精彩见闻。西南大学李晶老师概述了年会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美国学界关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与研究特点；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佳欣

以“移民”为视阈分享了美国学界关于移民史的最新研究动向；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研究生徐天介绍了社会环境变迁对美国史学界产生的影响。

根据秘书处的分工安排，本期通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负责完成。其中，梁春艳、陈冰琪、王万里、骆元生、韩虎强、杨竣媛、陈颖等同学参与了素材整理、内容校对及排版编辑方面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中国美国史学界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大家的努力，感谢各单位和同仁的支持，让我们和衷共济，一起创造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美好未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2018年8月